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022年第1期
总第9期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本期焦点：

推进“两个结合”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访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

姜逸

关于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的几点思考
韩永进 肖庆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密码解析
张燕妮 李春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思政课整合路径研究
李立男

文化迭代与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重建
王虹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2022年第1期

总第9期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济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22 年. 第 1 期 ; 总第 9 期 /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 济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2. 5

ISBN 978-7-5607-7451-0

I. ①马… II. ①张… ②程… III. ①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A811.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71352 号

策划编辑 刘森文
责任编辑 楚洋洋
文案编辑 肖世伟
封面设计 王秋忆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发行热线 (0531) 88363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5.5 印张 312 千字
版 次 202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访 谈

- 推进“两个结合”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访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 姜 逸/3

论 文

- 关于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的几点思考 韩永进 肖 庆/23
- 论马克思的爱国主义思想
——兼驳诸种反爱国思潮 查正权 朱进东/41
-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考察 郭 瑞/56
-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密码解析 张燕妮 李春华/70
- 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探究 姚 红 邓红彬/85
- 论习近平文化观的理论要义和重要创新 张红岭/95
- 毛泽东教育思想内涵新探 石 然 王菲菲/108
- “源头”红色文化的孕育及治理 王 振 高福进/122
- 从家书看邓恩铭的家国情怀 胡安徽/133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思政课
整合路径研究 李立男/143
- 国学为根，综合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岳德常/159
- 论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天人合一” 隋云鹏/178
-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简论 郝玉萍 谢元恣/189

文化迭代与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重建	王 虹/201
饭圈文化低龄化的症候分析及应对之道	付安玲 孙艺菡/213
“名”与中国当代文化观建设的“介入”话语转向	李 云/224

动 态

论点摘编	/237
------------	------



访 谈

推进“两个结合”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访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

姜逸*

【何中华简介】男，1962年生，山东莒南人。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等。2006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2009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15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入选中组部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几十年来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天津社会科学》《文史哲》等杂志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等著作。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译）载，有关论点收入《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儒学年鉴》等工具书，并被一些学术专著和论文援引。在元哲学领域进行探索，曾提出建立“哲学学”体系的构想，并对哲学的形上学本性、哲学视野之独特性、哲学比较的方法论原则等问题做了较深入考察；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注重对“发展”和“现代化”范畴的形上学前提的追问，探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命运，重思社会发展的存在论含义。近年来，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会通的研究，试图从学理上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近期出版《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一书，引发国内学界的关注。

* 姜逸，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这个重大观点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全新认识，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对于这一重大论断，从哲学-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围绕这一主题，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何中华教授。

访问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贡献。我看到您在阐释如何看待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时提出超越“体用论”限囿的观点。对于“两个结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一种生命观的态度而非外在的态度去理解和把握其内在逻辑关系？

何中华：谢谢你。我尝试着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文化本身的确是一种有机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人的生命在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上的表征。记得庞朴先生曾经区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化传统”，一个是“传统文化”。这一区分，实际上意味着对于被我们所分享的文化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看待。所谓“文化传统”，是指文化不能被视作一种工具性或手段性的规定，相反，作为我们存在的塑造者和建构者，文化构成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拿传统术语来说，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属于“体”而不是“用”。这是作为本体论概念的“文化”含义。就此而言，文化是无法被我们对象化的，也就是说它不能充当被我们外在地加以审视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对文化作生命观。它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是一种有机的生命现象。这其实也是当年现代新儒家曾明确提出的观点。梁漱溟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说过：“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趋往的活东西，不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②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上来就申明“凡读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中之一即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③1958年，张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说：“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④他们反对以那种“只是凭吊古迹”的态度去审视中国文化。因此，他们强调应该对本土文化持一种“同情与敬意的了解”，这种态度就内蕴着对文化传统作生命观的视野。“照我们的意思，如果任何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实肯定中国之历史文化，乃系无数代的中国人，以其生命心血

①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3页。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4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④ 张君勱：《新儒家思想史》，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627页。

所写成，而为一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因而多少寄以同情与敬意，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①从这个角度说，传统文化只有渗透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变成无意识的东西，而不是那种摆放在博物馆里供人们旁观式地去欣赏的“老古董”，才是真正有生命的。梁漱溟先生就说：“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②文化倘若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样法”，那么它也就沦为“死”的东西了。所谓“传统文化”则不然，它意味着被我们所分享的文化是能够当作身外之物予以外在审视和把握的对象化的规定，加以剥离、分类和挑拣等，譬如采取一种通常所谓的“精华-糟粕”截然二分的态度。这种对待本土文化的对象化姿态，固然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要提防知性思维的局限，以免在文化问题的处理上失之机械。

晚清以降，随着古今中外文化的相遇和碰撞，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中西体用之争。应该说，诱发这个问题的特定语境和原因都是真实的，但也不可否认，这一争论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却带有知性逻辑的局限，因为它过于机械地看待文化现象了。我认为，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实质时，应该超越这种中西体用之争的模式，从而打破知性逻辑的限囿，否则的话，就难以恰当地给出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强调文化及其现象的有机性质。在看待有机的生命现象时，知性逻辑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它需要让位于辩证的思维。应该承认，作为一种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完全超越了中西体用之争的范畴。对这样一种有机的历史-文化现象，我们必须从辩证法的高度去加以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性的相遇，正是这种“辩证运动”的一种历史-文化表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特定语境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采取的激进的反传统立场建构而成的，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是一个直观的现象和不争的事实，这无论从文化的时代性还是从文化的民族性维度看都是如此。但是，问题的辩证法恰恰在于，两者经历了冲突、碰撞、激荡之后，反而实现了深层次的会通和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全新的文化形态。

如果不是形式化、表面化地看问题，而是着眼于问题的实质，我们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并不具有外在性。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单位”，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域或某个民族，而

① 张君勱：《新儒家思想史》，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629页。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是整个“世界历史”。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史观”。东方社会包括俄国和中国在内并不构成唯物史观的“盲区”，相反，它被唯物史观的视野所内在地涵摄和覆盖了。所以，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未曾超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范畴和理论预期。就此而言，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把它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外在地“楔入”的结果。其次，当时中国首要的历史任务是革命而非改良。近代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沉重打击，这使得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严重受挫，从而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信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使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显露出致命的缺陷，成为中国人拒绝西方化的一个重要理由。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节点上，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获得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实践能力的明证”，它表明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东方国家变成一种真实的物质力量。应该说，这构成中国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历史契机。最后，中国人以实践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使其变成了中国人自己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如此一来，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诠释就变成广义的了，因为它不再局限于一种狭隘的“理解”活动，而是由认识范畴扩展到了实践领域。按照哲学解释学的观点，实践上的“应用”本身就是广义的“理解”。

从学理上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经内在地蕴含着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因为中国的具体实际，也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国情，它归根到底是由传统文化塑造而成的，从而无法剔除传统文化的规定。也可以说，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际，不过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客体化形态而已。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其根本标志不是别的什么，它只能是文化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原本就已经包含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访问者：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以来，其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面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从文化内涵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提出的历史脉络呢？

何中华：的确，马克思主义自从在中国传播伊始，就实际地发生了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前提。别的暂且不说，单就“让马克思说汉语”这一点来看，就已经是在中国化了，而且是经过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言说方式的“中介”。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就不单是手段的规定，它直接触及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这就同深邃的文化背景无法剥离开来了。不同语言之间“翻译”，实质上乃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翻译问题，更深刻的在于它还是一种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会通。表

^①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8页。

面上看,这种转换所体现的似乎是单向的、线性的关系,其实不然,毋宁说它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关系建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生成。而且,广义的“翻译”还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中的具体应用。我们前面说过,实践的“应用”也属于解释学所谓的“理解”。早在20世纪50年代,贺麟先生就曾谈到翻译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特别意义。他说:“它(指翻译工作——引者注)的特殊意义尤其在于使思想家特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中国话,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外国学问成为中国化,在中国生根。”^①贺麟先生的这个观点的价值在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来定位和理解翻译工作的意义。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即使他完全操纯正的德语来理解和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无法避免其“内翻译”过程。他的理解和释读,依旧不能等价于一个德国人所做的理解和释读。这正是作为“理解”前提的文化“前见”所在,它是一个无法完全被剔除的重要变量。

今天,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一个主题而自觉地提出来呢?我认为,其中的缘由,大体上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这是中华民族获得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客观需要。晚清以降,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中华民族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我们在世界舞台上被边缘化了,沦为被宰割、被支配、被奴役的对象,变成一种客体的规定、一种宾格的存在。中国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开放,使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趋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意味着中国的历史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身的客体角色,实现了由客体到主体、由宾格的存在到主格的存在转变,亦即不再是作为受动的、被凝视的客体规定,而是变成能动的主体性角色。也正因此,我们才越来越能够平视这个世界。正是这一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才使我们获得了文化自信。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自觉地凸显“中国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我们在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具体实际时,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就格外需要突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主体性地位。这样一来,就需要我们从学理上正视并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

其次,这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逐步深化和拓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建构,它只有作为中国所特有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中介了的产物才

^① 贺麟:《学习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体会》,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附录,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是可能的。刘少奇当年在延安接受采访时,就曾说过:“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亚洲形式。”^①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也就是被中国文化选择的结果,它被赋予了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民族形式”。今天提出“第二个结合”,意味着我们自觉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升到了文化的层面和高度来加以领会。值得深思的是,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为什么唯有文化自信才是最具有长久意义的自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文化起到的是“底色”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中国具体实际也就是具体国情的准确而深刻的把握,只有达到文化的层面才算到位。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来看,大致经历了语言的、理论的、实践的不同层面的步步深入,但最终又回到了文化。这既是一个展开,又是一种复归。

最后,这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达到自为性的客观需要。从历史上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特别是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但是,这种结合一开始主要是通过实践上的不断尝试,通过实际的反复摸索而无意识地实现的。如何在新时代实现这种结合过程由自发到自觉、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把这样一个过程作为一种反思的对象,对它的内在机制、具体实现路径、方法论原则、历史约束条件,以及深刻的文化基础等规律性的内涵,做出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只有从学理上把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这个实际结合的过程才能变成被我们自觉地把握住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当年曾经要求人们“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②。他认为,这是成为一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条件。我们今天所做的这种理论上的总结,也就是把“两个结合”所取得的丰富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加以“反刍”并“消化”,使之升华为一种自觉的形式。它将有助于这种结合的实际进程达到一种能动的高度,因而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深化和拓展,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这就无法回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主题自觉地提出来。

访问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文化自觉的实践历程和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有着文化自觉的历史语境的。能否请您谈谈,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又是建立在何种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新时代的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的转化又依赖什么条件呢?

^① 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何中华：坦率地说，我对费孝通先生的这个提法缺乏必要的研究和思考，这里仅就自己朴素的理解，谈一点浅见。我以为，对这个说法既可以从时间上来理解，也可以从逻辑上来理解。从时间顺序上说，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到天下大同，可以将其看作一个逐步递进和不断深化的过程。由人的自我中心化的确立和解除开始，然后通过普遍交往与他人建构其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关系，从而实现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的过渡，以便达到相互成就、相互尊重、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趋向大同世界。从逻辑脉络上说，各美其美归根到底是作为达成天下大同的原初基础。在此基础上，先实现美人之美，进而达到美美与共，最后走向世界大同。这是一个从原初基础开始，通过不断地建构和升华，最后达成马克思意义上的“真实的共同体”的逻辑进程。

一个民族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也存在某种顺序。我认为，这种文化自觉的过程，是需要一个外在的他者作为参照的。一个人要看清自己的面目，只有借助于一面镜子才是可能的。英国有一个说法：“如果你不曾离开英国，就不能真正地理解英国。”因为你未曾见到过一个与英国不同的国度，就无从在比较中把握英国本身的特点。因此，文化的自觉是需要条件和中介的。它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遇到一个“他者”作为一面折射自我形象的“镜子”，这样才能使一个民族看清自己的文化面目及其特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同样离不开这样一个条件。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历史性相遇，特别是“西学东渐”，我们有了这样一面“镜子”。比如，我们的不少措辞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像“国学”“中医”“中国画”之类，这些称谓在中国的古代原本是没有的。因为有了“西学”的传入，我们才把本土所特有的学问、学术、学说叫作“国学”；因为“西洋画”进来了，我们才把本土所特有的绘画叫作“中国画”；因为“西医”传入了，我们才把本土所特有的医学叫作“中医”。这些称谓的出现本身，就折射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相遇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这些措辞的所指，固然是古已有之，但把这些东西赋予这类称谓，却是近代才有的事。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的。

当然，从历史上看，我们的这种文化自觉一开始是以文化自卑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近代以来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打败了我们，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受挫心理，由此决定了文化自卑。它主要表现为两种典型的心态。一是“全盘西化”，即我们在文化上什么都不行，所谓“百事不如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背景下，“全盘西化”的说法很盛行。到后来，我们又出现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心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这都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在当时那样一个历史语境下，出现这类心态诚然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步来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性崛起的逐步实现，我们的文化自觉必须由文

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未曾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因此,中华民族真正开始由一个被动的客体角色转变为一个能动的主体角色。今天,我们中国人越来越有了文化自信的底气,这构成文化自觉的基本形式。

访问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我理解,正是坚持“两个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中国人民的理论、中国社会的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②。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守正创新”呢?怎样才能做到“守正创新”呢?

何中华:说到“中国特色”,就不能不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在这里,马克思是从作为主体存在的一个国家的需要的角度,来理解理论的“实现”的。而特定国家对理论的需要,必然蕴含着这个国家的特质作为它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它必然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特定“国情”。恩格斯在致查苏利奇的一封信(1885年4月23日)中也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④而恩格斯所谓的“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就是具体的国情,它归根结底植根于一种更为深邃的文化传统。当然,这样说似乎是一种冒险,因为它有着文化决定论的嫌疑。其实,这里的文化不是狭义的文化,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

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在“挑战-应战”的过程中就一直孜孜以求地追寻着自身的自主性地位的确立。“革命”和“解放”这些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键词,就蕴含着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意蕴。我们一方面追求现代化,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被现代性同化,自觉地与西方化保持着必要的张力。我们始终在意和纠结的问题是:究竟是“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应该承认,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问题才有了一个得到答案的历史基础。但之后对于苏联模式的借鉴和依赖,尽管有其客观上的必要性,但也存在妨碍自主性的风险。对此,毛泽东从理论 and 实践层面都做了大量的探索。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过去搞民主

① 转引自余新华:《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指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21年11月8日。

②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2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 后来，他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又更明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中国特色” 如何才有着落？只有追溯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存在，才能真正把这种“特色” 具体化，变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非抽象的规定。

应该说，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必将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我认为，在实现“两创” 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恰当地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完全不变肯定是不行的，任何文化都必须与时俱进。所谓“文化”，无非人类应对环境的一种策略。时代主题变了，环境条件变了，历史语境变了，我们所选择的策略自然也应该与之相适应，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 and 改变，以因应这种变迁，如此这般才能真正发挥文化的正面功能和积极作用，而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保持变中之不变的那个灵魂。不变肯定不行，但全变同样有害。这正是所谓的“过犹不及”。开新需要返本。所谓“守正” 也就是返本，创新则需要开风气之先。我们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很容易失去文化的本色。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现代化” 也就是告别传统。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传统的东西往往沦为一种消极的保守的形象。我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格外强调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用心。

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神似” 而非“形似”，今天的人们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拘泥于传统的繁文缛节，否则又怎么能够适应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特点呢？关于对传统文化的遗产所应采取的恰当态度，当年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过所谓的“抽象继承法”。我认为，它在一定意义上还是有着启示价值的。举个例子来说，传统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那一套，但是到了今天早就没有什么君臣关系了，谈何“君君臣臣”？所以，我们今天恐怕只能讲“工人工人，农民农民”。其实，儒家的这个说法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指旧有的伦理秩序，一个是指每个人都要做他职分内应该做的事。前者是具体的，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和历史形式的，后者则是抽象的，是有其超越时代性局限的一般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以被理解为“理一分殊” 在时间维度上的一种体现。其实，儒家的这个说法，究其实质，仅仅在于一个人必须做他“应该做” 的事，这也正是道德的诉求。道德说到底不过是做“应该做” 的事罢了。即使到了今天，这个道理依旧有效，我们必须继承这个意义上的儒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2页。

精神。就此而言，可以说是道德无古今、道德无新旧。所以，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说：“我以为道德无所谓新旧。”^①

在借鉴传统文化来应对当代实践的挑战中，传统文化本身自然就会出新。不必去刻意地求新求变，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出新。这有点类似于练习书法，譬如学颜真卿，一开始临帖自然是要临得越像越好，但能不能就因此会变成颜真卿第二呢？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即使临得再像，也必定会融入习帖者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在应对当代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挑战中，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那些适合当下需要的因子必然会被“激活”，从而被选择下来，而那些不适应者必将遭到淘汰。这就是实践和时代对于既有文化的选择作用，由此而造成的文化上的“损益”，恰恰构成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演进。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本身正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体现和实际表征。

应该说，“守正”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离开了“守正”的“创新”，将偏离正道；离开了“创新”的“守正”，也将变得僵化、陷入保守。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看，我们自古就是讲究“经权互补”的。“经”就是变中之不变的恒常之道，而“权”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做出的必要调整 and 适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主张的是辩证否定即所谓“扬弃”，它是通过否定之否定，也就是两次否定、三个环节来实现并完成的。否定之否定中的每一次否定都意味着“变”，拿中国话来说即所谓“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但是，否定之否定却是通过“变”而不断地向其出发点的复归，当然是在更高的基础上（经过了否定的环节）的复归，此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汉儒董仲舒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说法。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可谓一语中的。万事万物总是在变动不居地演变，但又总是有一条亘古不变的线索贯穿其中，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我想，所谓“守正创新”，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意义上领会。

访问者：文艺作为记录和表达民族文化的生动载体，其传播对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②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向世界宣传中国优秀文艺可以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强大的文化感召力。能否请您从文化学的角度谈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展现出的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该如何提升这种感召力，更好地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何中华：的确，在人类的文化交往中，文学艺术有其独特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作品是没有国界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最容易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通过文学艺术作品获得审美通感，理解彼此的心灵。文学艺术是以情动人的，尽管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诗言志”的文化传统，拒绝唯美主义的那种为审美而审美的偏好。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魏晋文学了，但那也不过是为了矫正或平衡一下文学艺术所承载的过于沉重的道德负荷罢了。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它也未曾中断悠久的诗教传统和乐教传统。

中国故事的叙事方式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自己的讲叙，另一种是作为他者的外国人的讲叙。这是两种迥然有别的叙事方式，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差异。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友好人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到中国，以记者的身份亲临八路军抗战前线，但她依然有着一种强烈而自觉的角色意识。有一次，在采访了一名矿工出身的抵抗战士之后，她自省道：“我离开这些矿工时又一次感觉到，我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个作家，是个旁观者。”因此，“我知道我永远不能有机会去了解他们，和他们同甘共苦，我依旧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写那些我未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的作家”。其结果只能是“我写出的并不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实质，只是一个观察员的记录”罢了。在这里，显然有一种旁观者的焦虑。类似的焦虑，也典型地存在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在史沫特莱看来，“真正的中国故事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讲”^①。

中国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不仅有一种“认识论特权”，即“在场性”的优势，更有一种亲历者的“此在性”优势。这是其他人所无法取代的。毋庸讳言，这里也潜存着一种局限，即在文化心态失衡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陷入自卑和自大的偏颇。它带来的不是敞显而是遮蔽。然而，文化自信使得我们能够客观地正视自己的一切，从而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叙述出来，传达给世人。这无疑是一种文化心理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当然，这一点是需要历史前提的。它有赖于中华民族在历史性的崛起中与他者之间平视关系的达成。只有具备文化自信的心态，才有可能使我们客观地看待自己，也客观地审视世界，也才能使我们有足够的底气来叙说自己，避免自卑和自大的偏颇。自卑和自大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因为“物极必反”，“两极相通”。自卑到了极致，往往就有可能走向虚浮和盲目的自大；而极度的自大，也往往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唯有具备了文化上的自信，才能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正视自身的不足，并以审美的方式把一个鲜活的中国形象化地呈现给世人。

有一句话说得好：“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建构中国符号，体现中国元素，彰显中国魅力，乃是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叙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这一切背后的深邃内涵，因为中华民族的个性特征，归根到底是由文化传统塑造而成的，它植根于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样法”（梁漱溟语）。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又

^① [美]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在反击》，江枫译，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

是什么呢？就我的肤浅了解，这种魅力无疑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略加说明。譬如，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追求“道法自然”，反对人为性，拒绝对本然之性、固然之理、当然之则的扭曲和遮蔽，以便让人本身以及万事万物都如其所是地展现，按照各自本真的状态得以开显。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这一特点，针对现代性的逼迫及其带来的危机，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就是人为性。所谓的“造势”“搞笑”“做爱”之类的偏好，正是现代社会相当突出的文化特征。从历史后果看，人为性带来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紧张与乖戾。我们今天的环境何以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人与人的交往何以越来越陷入敌对性的矛盾和冲突？人与自我之间何以越来越彼此疏离甚至陌生化？我认为，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应该到人的文化存在那里去寻找。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中庸之道，对于恰当地看待人的欲望，缓解人的需要的无限可能性同满足需要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紧张，也有某种启示价值。中庸之道认为“过犹不及”。按照这个原则，既不能人为地压抑和剥夺人的欲望，也不能人为地诱发和放大人的欲望，前者带来的是禁欲主义，后者则导致纵欲主义，它们都偏离了自然而然的状态。这两种偏执，在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却有着明显的表现。在几乎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主张禁欲主义，把人的肉体欲望视作邪恶，从而走向了伪善。这也正是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而文艺复兴作为对中世纪的反拨，又趋向于另一个极端。有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个时代称作“肉欲的时代”。一直到20世纪，随着现代化的世俗化趋势的不断扩张，纵欲主义的文化表现越来越趋向极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两极之间的大幅度摆动，造成了西方社会和文化的震荡，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的确有其深刻的昭示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其要求无疑是多方面的。譬如，有表现形式上的选择，有内容上的考量，也有审美趣味上的甄别，还有题材和体裁上的权衡，如此等等。但我想，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真实”二字。真实就是力量。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包括其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民风民情，当然也包括历史上的辉煌、现实中的成就等，原汁原味地展现给世人，就能够打动人们的心灵，并赢得他们的尊重和敬畏。追求真实本身，也是有文化自信的表现和要求。此外，我们向作为他者的受众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魅力，当然应当充分地考虑到他们的文化欣赏和接受习惯。无视这一点，不仅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而且传播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但是，无论如何强调适应受众的接受习惯和偏好，都不能以牺牲中国文化的完整性、真实性、固有的内涵和本真的意蕴为代价，否则的话，就将从根本上丧失这种传播的意义和价值。说到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是在一种全新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并实现的。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启，是以西方的“坚船利炮”和“西学东渐”为标志的。这一特定的历史语

境，是以东西方文明之间不对等的交往为前提的。今天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了，因为中华民族已经摆脱了受奴役、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屈辱历史命运，实现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主体性的能动建构。因此，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不应忘记我们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访问者：毛泽东同志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①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②是否可以说，中国人民精神主动性的增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成就之一？我们又是否可以将精神主动程度作为我们衡量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指标？

何中华：在我看来，这种主动性应该包括落后民族选择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首创精神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也包括我们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由自发到自觉的过渡和转变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

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观点，人类历史是一个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曾经提出人的“两次提升”的观点，他说：“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③第一次“提升”，仅仅意味着人类把自身从自然过程中提升出来，变成一种自觉的存在。换言之，人类在自然过程中不断地把握并利用自然规律，从而开始获得自由。这意味着人类从自然界中把自己从一般动物那里“提升”出来，从而使人类区别于一切狭义的动物，其标志就是人类的诞生。但这时，人类在历史领域尚处于自在状态，未能达到自为状态，因为对人来说，历史规律尚属必然王国，它作为一种异己的、盲目的力量外在地支配和统治着人。只有实现了第二次“提升”，人类才能够在历史过程中把自己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从而变成一种自觉和自为的存在。只有实现了这样两次“提升”或曰“解放”，人类才真正摆脱自己的“史前状态”，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历史。对此，马克思也是这么看的。他在致卡洛卡菲埃罗的信（1879年7月29日）中被删去的一段话说：“我认为，把批判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其先驱者区别开来的东西，正是这个物质基础（指‘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引者注）。它表明，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②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动物必然要变成人……”^① 在这里，马克思显然区分了人作为“动物”的历史和真正的“人”的历史，前者即马克思所谓的人类的“史前期”。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要自发的社会尚未结束，自觉的社会尚未来临，就只能是一切前共产主义的状态，皆属于人类的“史前史”。这其实也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② 的原因。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的似自然性特点。但必须注意，这种状态并不是伴随人类历史始终的，它仅仅是伴随人类社会历史某个阶段（尽管在时间上十分漫长）的一种历史性的规定。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发展的“一切自发性”的消除，人类历史过程的这种似自然性也就终结了。这种“自然史的过程”只是在人类的第一次自我提升发生之后而第二次提升尚未来临时所固有的特点。正因如此，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③ 于是，“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④。由此可见，人类只有实现了双重解放，即一方面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历史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进入“自由王国”。这才是彻底摆脱动物状态，从而开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充分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精神主动性的确可以充当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一个标尺。

访问者：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前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很多。请问何老师，我们该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呢？“两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何中华：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走出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乃是我们百年探索所取得的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这条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恰当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昭示了一种可能的前景。在这个意义上，这条道路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创了一种新形态。

众所周知，马克思晚年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曾经提出“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⑤ 的设想。着眼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和“亚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亚生产方式”思想，乃至整个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也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个“设想”，不仅仅对俄国革命道路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对于中国革命道路同样具有启示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不过是执行了马克思晚年的这一“政治遗嘱”的结果。因此，只有从马克思晚年的设想着眼来看待中国道路的历史性选择，才能真正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两个30年”何以不能相互否定。我认为，“中国道路”的选择本质上未曾超出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发展道路所做的实践上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也不曾超出马克思原本已经确立的唯物史观的解释范围。可以说，马克思晚年的这个“设想”，其根据早已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前提中潜在地隐含着，只是在后来遇到某种机缘时被激活并展现出来。当然，这种机缘是多方面的，譬如它至少包括俄国革命被实际地提上日程，也包括马克思在同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的交往中可能受到其某种影响，以及马克思通过阅读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果以及西方旅行家对东方的报道而发现了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东方社会”等。应该承认，马克思晚年的“设想”本身，就是其完整的唯物史观的一个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道路要取得彻底的成功，有赖于三大问题的恰当解决。一是作为东方的经济落后的大国，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和财富的快速增长同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之间的兼容和“双赢”，在建构生态文明这一新型文明形态中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博弈中，如何在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强化的钳制下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崛起和伟大复兴？这些问题的解决，相应地需要彻底实现“三个结合”：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先看第一个结合。如果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还是理论建构，那么，到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个历史阶段，列宁和毛泽东遇到的首要任务则是把这一理论诉诸实践。这种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使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者面临全新的使命。列宁当年就曾说过：“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①这种“经验”来自哪里？当然来自俄国的具体实际，来自俄国的革命实践，它不能不决定于俄国所特有的国情。当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都不过是实践经验“逼迫”的结果。倘若以今天的眼光做一种回溯性的看待，就不难发现，它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看作马克思晚年的那个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设想的一种实践表达。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按照马克思“从后思索”的方法，我们今天回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过头来看,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背后的实质。可否这样来理解:如果说之后的前30年所完成的主要是“跨越”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30年完成的则主要是“移植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①。离开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只是抽象地套用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内涵的。

再看第二个结合。从历史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告诉我们,试图抛开市场经济这一环节而直接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马克思当年就曾说过:“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是间接地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②关键在于这种“取消”究竟是人为的产物,还是历史本身成熟的结果?倘若是前者,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陷入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再一次显示出马克思历史观的睿智和历史穿透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否属于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④既然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商品经济的另一个说法),就离不开“经济人”假设,而这一假设内在地包含着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理性计算能力的要件。因此,市场经济无法避免人的欲望的制度性诱发和放大,这种被人为释放出来的欲望就表现为贪婪。它所带来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导致敌对性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问题”,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就存在某种相关性。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它以格外显豁的方式暴露了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悖论。如何克服这一悖论,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它的独特优势。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成功地实现了有机结合,解决了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一个伟大创举。美国学者奥肯说:“市场需要有它的地位;但市场也必须被界定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5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它的必要范围之内。”^① 市场是有用的，但又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唯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中才有可能获得真实性。如何遏制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从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之间的关系，以缓解生态环境的压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从目前已有的实践经验看，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的确显示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明显优势。

还有一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崛起，不可能一帆风顺，恰恰相反，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遏制。物理学上有一条定律，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其实，这个道理在文化问题上也同样适用。一个民族崛起的力度越大，那么它所受到的压力也就会越大。所以，中华民族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历程中，需要格外凸显自身的主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使我们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使我们凸显了“中国性”，给出了“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的答案，从而避免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自我迷失。这种自我迷失的发生，在一些后发展国家那里是不乏其例的。这种主体意识的自我确认，无疑有助于我们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断抵御外来压力，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应该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意义极为深远。它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历史性博弈，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背景下，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它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激活的优秀因子彰显出来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它还为当代人类应对生存危机、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在这里，我想还是需要特别强调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运思方式中所固有的真实的“历史感”。我们必须仔细地体会，马克思何以反复地讲“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何以强调“我们仅仅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③。其实，抽象规定离开了历史不仅没有意义，甚至是非常有害的。从历史上看，教条主义者正是犯了这个致命的毛病。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完美和自洽，并不能必然地带来实践上的正面后果。一个“不合时宜”的论断，尽管它在学理上可以是无懈可击的，但由于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也极易沦为抽象的教条，甚至会带来十分消极的实践后果。这在历史上是不乏沉痛教训的。从某个角度说，马克思在哲学上做出的独特贡献，就在于用“历史地思”取代了旧哲学的“抽象地思”，从而避免了后者所固有的致命缺陷。中国道路的实际选择和展开，乃是唯物史观指导我们一步一步地回到历史语境的结果。中国的特殊

① [美]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黄清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 页。

国情，以及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特定位置，都不作为不能无视的重要变量规定着我们的这种选择。当然，我们并不是历史宿命论者，但即使强调人能动地存在的马克思，恰恰比任何人都更加正视并承认历史前提本身的不可选择性。确认这一点，正是承认历史本身具有内在逻辑的基础，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



论 文

关于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的几点思考

韩永进 肖 庆*

【摘要】202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时代文艺评论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为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指明了方向。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的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是我们坚持文艺评论正确方向导向，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根本遵循。

【关键词】文艺评论；马克思主义；新时代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新时代文艺评论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是新时代开展文艺评论的指导性纲领，为文艺评论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意见》指出，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文艺评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荣发展。《意见》强调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坚持正确方向导向，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本文拟着重从“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方面谈一点学习体会。

* 韩永进，国家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理论、图书馆学；肖庆，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艺术理论。

一、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

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意见》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导向,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关于文化的理论,是指导文艺和文艺评论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明确了文化的性质、功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出发,讲明了文化的性质,强调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完整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这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强调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又指出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发展规律。一是具有历史继承性,二是具有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②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揭示了“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再生产的独特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研究文化,揭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共性与个性,揭示了精神生产的独特规律。马克思提出了精神生产概念,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些特殊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对于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马克思认为，一方面，精神生产本身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从物质生产当中分离出来的，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产物，因此它始终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内部又存在具体的、精细的生产分工，在艺术生产领域，艺术创作本身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分工水平的制约和影响。精神生产的技术化会导致精神生产形式的变迁，某些古典的艺术形式会随着现代技术的运用和传播而消失。

最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强调艺术属于人民。艺术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基础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② 马克思、恩格斯要求革命文学要努力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表现“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的生活和命运。“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③ 恩格斯主张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④。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能仅仅靠物质生产领域进步来实现，还必须以精神生产作为其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条件。

(二)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文艺发展规律，对文艺的功能、文艺创作、文艺鉴赏评论等提出了重要论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⑤ 在这里，马克思把艺术的同宗教的、实践精神掌握方式并列提出来，看成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文艺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是审美性、审美作用。文学艺术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感受、分析、研究，运用小说、报告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电视等手段展现现实生活的图景，再现人们的性格面貌，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社会生活发展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形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8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0 页。

的。马克思还专门论述了文艺作品的认识作用,认为现代英国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莎士比亚化”的创作原则。“莎士比亚化”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强调从现实生活而不是从抽象观念出发,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描绘和鲜明的人物性格刻画深刻反映社会生活。马克思在评论拉萨尔写的剧本时强调:“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①恩格斯进一步提出“莎士比亚化”就需要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刻画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

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典型化问题,强调“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结合分析作品,提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②。他还指出如何塑造典型人物,“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③。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他也提出了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文艺评论最高标准。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即“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④这里的美学标准,就是从美学角度分析作品的审美表现,历史标准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考察作品反映的历史内容。

二、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必须坚持以毛泽东思想关于文化和文艺评论工作的思想为指导

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必须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他关于文化和文艺评论工作的思想为指导。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关于文艺和文艺评论的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文化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时代条件与任务，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纲领与目标。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文化问题，提出了关于人民文化的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整套文化属于人民、文化源于人民、文化为了人民、文化表现人民、文化服务人民、文化教育人民的理论体系。他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服务人民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强调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评论的思想是他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明确了文艺批评有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突出强调了文艺批评的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文艺批评作为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同时又指出，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强调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如何开展文艺批评，要实现多个统一。首先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强调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其次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最后是历史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强调应当把衡量文艺作品的历史标准与人文标准统一起来，既要考察文艺作品的历史作用，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有无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与动力，又要考察文化作品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关系，作品是不是充分展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不是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是不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赞赏，是不是凸显了文艺的人文精神与关

怀。他还明确了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终标准。如何评价作品?“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把文艺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即社会效果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终标准。最好的社会效果就是“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①这种真正的社会效果的实现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

他强调要塑造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塑造人物形象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要求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与此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要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正确理解和处理人物塑造问题上的多样性和主导的关系。新的人物是上升时期历史阶段的代表,是大势所趋的引导形象,是人心所向的集中体现,是先进思想的文化载体。他反对“标语口号式倾向”,强调艺术作品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

他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现实主义要求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否则人们也不爱看,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些重要思想。他强调,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中心工作发生转移,由革命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建设的任务也发生转变。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将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72页。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文艺批评，强调了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首先从思想方法上研究文艺批评，强调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做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①他还对中国文艺批评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②他深入分析了当时文艺批评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③他特别强调尊重文艺批评规律，要求“批评要说理”。

他强调艺术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④他特别强调应该标新立异，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

三、把好评论方向盘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文化和文艺评论工作的思想为指导

把好评论方向盘，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特别是以其中关于文化和文艺评论工作的思想为指导。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关于文化文艺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3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6 页。

化的性质、地位、作用、方向、方针、原则、人才、领导等进行了论述，特别是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文艺评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任务和目标：“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②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双百”方针做出了全面阐释，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双百”方针的内容，强调：“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③根据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文化艺术领域，他强调不要把“双百”方针看成是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手段，而是艺术家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途径。他强调，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为前提。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明确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定位，使文艺工作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期，他根据文艺工作环境和任务的新变化，明确提出了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④。与此同时，他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特点，强调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⑤

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尊重文艺规律，反对行政命令。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⑥邓小平同志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深切体会到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因此，他特别强调：“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①

（二）

积极开展文艺批评是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同志指出了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强调“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② 1992年，他又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 在文艺作品的具体标准上，他提出“最好的精神食粮”标准，要求实现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统一，作品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塑造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敢于创新，丰富多彩，要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作品的最终评价应由人民来评定。同时，他还强调开展批评要注意方法，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但也绝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

他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④ 应当“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⑤。

他强调：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坚持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⑥

他强调：我们的文艺要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⑦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0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

他强调：要防止概念化，勇于创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①他特别强调，在文艺领域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强调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

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求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他指明了文艺人才的成长之路——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

(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关于文化建设和文艺评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②他还突出强调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即“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③。

他强调：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马克思列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1页。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他强调：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他强调：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他强调：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他强调：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他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要把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统一起来，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他强调：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在思想文化教育部门和所有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或传播的企事业单位，都必须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讲求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正确结合，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而绝不允许“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冲击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不允许这种错误倾向泛滥而不受

到批评和制止。

他强调：时代需要伟大的文艺作品。作家、艺术家应该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反对‘一切向钱看’，旗帜鲜明地鼓舞人们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发进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对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要求”^①。

他强调：文艺是一个需要极大地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要坚持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尊重文艺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支持文艺工作者施展聪明才智，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实现体裁、题材、主题的极大丰富。

他强调：文艺评论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优秀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的文艺评论，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和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仿佛孪生兄弟。”^②文艺评论的任务是要在探索文艺规律和促进文艺繁荣、推荐优秀作品、批评错误的文艺倾向方面，在帮助人们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胡锦涛同志多次对文化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世纪新阶段文化建设提出了要求，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明确回答了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方向、任务、方针、原则、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3页。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他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他强调：坚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坚决防范和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要始终高扬引导中国社会前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旗帜，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有力地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对我国社会的渗透和侵蚀。要继承传统，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借鉴国外经验。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要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在文化观念上绝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的侵蚀，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

他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媒体传播之中，落实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融会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体现到政策法规规定和社会管理之中，使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他强调：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

他强调：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他强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精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贴近实际，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贴近生活，就是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深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反映客观现实，把握社会主流，解决具体矛盾，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生活、引导生活；贴近群众，就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充分体现群众意愿，满足群众需求，把握群众脉搏，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懂的话，为群众提供想看爱看、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意见》强调，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文艺评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深刻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进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它所具有的强大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有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新的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 还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 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他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③ 文化建设被提高到空前的地位。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论述；关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论述；关于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论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关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的论述；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论述；关于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论述；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的论述；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关于文艺评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继承创新了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继承创新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优秀遗产，批判借鉴了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文艺发展现状，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特别是开展文艺评论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是我们坚持文艺评论正确方向导向，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艺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

②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1、228页。

③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

繁荣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他提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①“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②高度重视文艺评论是由当代中国文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当我们将文艺放到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去审视就会发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2021年，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历史昭示我们：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历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先秦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事业需要伟大作品。而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评论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手段。

习近平强调：“衡量一个时代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他提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③这是因为，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创作生产优秀作品是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他还明确提出了“文艺精品”的标准：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④文艺评论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是文艺评论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页。

②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274页。

③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7页。

④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0页。

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①

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当代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他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②

习近平强调：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他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评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③ 文艺评论标准问题，一直是文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强调“美学的历史的”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强调了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提出了文艺批评有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要求“批评要说理”；邓小平同志提出“最好的精神食粮”标准，强调作品最终应由人民来评定；习近平同志在以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文艺批评和鉴赏的四个标准，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文艺评论标准体系。习近平提出的“历史的”标准，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的”观点，更主要的是具有现实性，针对当代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批判了某些文艺作品中存在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现象，批判了“以洋为尊”“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等错误倾向，并强调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第一次明确把“人民的”观点作为独立的文艺评论标准和原则，强调以人民尺度去评判文艺创作的成败和文艺作品的优劣，这是文艺评论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他第一次把“艺术的”观点从“美学的”观点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具有与“美学的”观点同等地位的文艺评论原则，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3页。

②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9页。

③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8页。

强调“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①。他提出的“美学的”标准针对我国文艺评论面临的现实，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评论新标准是马克思文艺评论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实现了历史、人民、艺术和美学四个维度的高度统一，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评论提供了根本遵循。

Put the Steering Wheel of Literary Criticism

Han Yongjin Xiao Qing

Abstract: In August 2021, five departments including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ministration,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jointly issued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The Opinions” have clarified the guiding ideology, overall requirements and objective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steering wheel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The steering wheel of good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must adhere to the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Mao Zedong Thought,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the guid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given high priority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rade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views, judgments and requirements in hi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which are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us to adhere to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Key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Marxism; New Era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页。

论马克思的爱国主义思想^{*}

——兼驳诸种反爱国思潮

查正权 朱进东^{**}

【摘要】 马克思的爱国主义思想历经了从萌发、形成到成熟的过程，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马克思在中学时的作文中就显露了英雄主义特点的爱国情感；刚走出大学校门时，表现出对国家忠诚奉献的强烈爱国情感；退出《莱茵报》后，钻研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让其爱国思想有了理性的提升；新唯物主义的确立，使马克思的爱国主义走向成熟，特别是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表现为辩证的爱国主义。在方法上，马克思甄别各种非爱国主义从而树立起自己的爱国主义旗帜；在学理上，基于唯物史观，摆脱狭隘的爱国主义，把爱国主义推向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回应时代要求，坚持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伦理与价值相结合，坚持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统一，系统弘扬爱国主义，倡导立足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

【关键词】 马克思；爱国主义；国际主义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总体要求指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① 然而，却有人从源头上否定爱国主义，即马克思本人不爱国，其言之凿凿在于马克思没有说过要爱国。处在世界百年未有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资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性研究”（19JD710059）的阶段性成果。

** 查正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朱进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政教研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3日。

之大变局中的中国，尤其需要以敢于亮剑的勇气和善于亮剑的智慧来抵制、反驳这样的谬论，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而这首先就需要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梳理，发见马克思的爱国思想。已有学者为此做出了一些理论贡献，如《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时代挑战与回应》一文从恩格斯论说的国家起源，引用《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给世界带来的变化，从理论源头回应当下爱国主义的挑战；又如，《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一文从马克思论述人的社会性入手，阐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上述文章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来阐释爱国主义，是对马克思没有爱国思想之言论的直接反驳，同时为当下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与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学理基础。但是由于上述文章侧重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而对马克思本人的爱国思想的研究还不够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基于此，本文将从马克思的文本入手，探析马克思有怎样的爱国主义思想，驳斥当下诸种反爱国主义的思潮。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①现实的人一定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和国家之中，无论是作为爱国主义的思想还是作为爱国的实践，离不开当事人所处的时代、国度以及个人的修为，脱离具体条件说马克思不爱国是极其武断的。了解马克思的爱国思想，必须首先要了解马克思生活的国度与时代。马克思生活的世界处于一个极大的、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时期。在他的生活中，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如长期分裂的意大利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很多宗教和政治不同的说德语的地方被锻造成一个统一的德国。他成长于非常复杂矛盾的时代环境中，他的出生地特里尔，那时还是一些小的分散的诸侯国的聚集地，后来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普鲁士又是和沙皇俄国结盟的一个军国主义、保守的国家；同时，特里尔又深受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的洗礼，因而铸就了马克思复杂的爱国思想。马克思的爱国思想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

一、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爱国思想的探索

中学时马克思的爱国思想有着英雄主义的情结。马克思的爱国思想在中学时期就显露出来，中学时期的马克思非常关注历史，看到一些国家的四分五裂与内乱动荡，就渴望有英雄人物来治理国家，为人民谋福利。他在中学拉丁语考试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把美好时代和国家治理相结合，认为治理得不错的国家的时代是一个好时代，而治理的人则是值得尊敬的，从而彰显一种英雄主义的爱国情怀，“那位尽管有条件为所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为,但在获得权力之后却一心只想拯救国家的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尊敬的”^①。那时的马克思笔力显得有些稚嫩,其爱国家的标准就是没有派别纷争和技艺科学的繁荣昌盛,从统治层面来说为人民造福就是爱国者。马克思中学时期的爱国思想是简单且直白的,这主要受限于他的年龄和学识,因而他的爱国思想有着英雄主义情结也无可厚非。依靠英雄治理国家,国家的繁荣富强又让英雄值得尊敬,这是青少年时期表达爱国情感的一般方式。

马克思刚出大学校门时的爱国思想是带着激情的对国家负责的忠诚。当马克思走进社会,面对国家治理的种种不合理之处,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彰显了自己的爱国情感。其中,《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的一篇集中表达自己爱国情怀的檄文,针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只因发表作品的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的倾向而要受到检查且罔顾内容与本质时,马克思发出了自己爱国的呼声:“爱国者的激烈就是一种神圣的热情,他们的感情冲动就是一种恋人的激情,他们的狂妄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忠诚,这种忠诚是无限的,因而不可能是温和的。”^②此时马克思的爱国情感还是非常感性的,有着青年人的热血沸腾,他用比喻的方式把爱国情感幻化为自然感情的冲动,是一种对国家负责的深深感情,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正是这种爱国情感使然。当然,对国家忠诚不是愚忠,愚忠其实是不忠诚、不爱国的表现,遭到马克思的强烈批评,马克思认为普鲁士政府官员在书报检查中的行为就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对国家的不忠诚,“在组织完善的、以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豪的普鲁士国家里,政府高级官员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一贯的不忠诚的行为,难道可能发生吗?”^③普鲁士政府官员针对书报检查的行为,表面上看是维护普鲁士的统治,但是这种限制自由的行为,可能会点燃革命的怒火,导致国家的灭亡,所以是不爱国的。马克思以自己充满热情的忠诚比对普鲁士政府官员敷衍塞责的不忠诚,从而表达爱国的要义就是忠诚,即爱国就要对祖国忠诚,对祖国负责,但是不能愚忠,否则不讲原则的忠诚就类似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低级红”。

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等原因而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对普鲁士的制度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此时他进行了反思:“它至少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空洞和国家制度的畸形。”^④马克思在1843年3月给卢格的信中显示出他对国家的担忧,因为普鲁士已经深深陷入泥潭,这让马克思感到一种民族耻辱,此时是做一名维护旧制度的保守的爱国者,还是做一名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的爱国主义者,这种选择要从爱之对象即“国家”来决定,马克思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4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①而此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制度是可笑的，和国家的理念是不相称的，所以此时的爱国就应该是做一个革命的爱国者。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因而马克思在《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中，认为自己对于诏书的分析是“出自爱国热忱的分析”^②。马克思已经在思考国家的存在和时代的发展之关系，以至于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自然地提出“工人没有祖国”^③的命题。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之后，正是出于对国家的关怀，专注于研究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国家部分，这时他的爱国思想慢慢呈现唯物主义倾向的反思状态。在马克思的眼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他先褒扬黑格尔的爱国主义的阐述，接下来就批判其爱国主义的唯心的基础。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认为，黑格尔“对政治信念即爱国主义作了很好的阐述”^④，这种“很好的阐述”表现为一般爱国主义“作为以真理为依据的确定性和作为已经成为习惯的意向”^⑤。这是马克思承认很好阐述的地方，说明了爱国主义的根基是真理，根植于内心、外化于行动而成为习惯，而这种“很好的阐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这种阐述与逻辑的阐发毫无共同之处”^⑥。

然而，从根本上说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黑格尔把研究纯粹思维的逻辑当作是国家的神秘基础”^⑦。所以，马克思不是停留于褒扬黑格尔，而是进一步以批判的态度看黑格尔的爱国主义，因为黑格尔把爱国主义看作国家制度规定的结果，实际上制度应该是爱国主义的对象化，也就是说出于爱国主义而生发这些制度，而不是制度生发爱国主义，从逻辑上揭示了国家制度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把黑格尔的爱国主义进行了倒置，可以说此时马克思的爱国思想接近了新唯物主义。然而，马克思没有详述，而是让人参看黑格尔的附释，在附释的补充部分，黑格尔明确说道：“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是唯一维护国家的东西，而这种感情乃是每个人都有的。”^⑧这就揭示了是基本感情呼唤秩序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⑨，爱国主义要求有制度来保障，而非制度规定爱国主义，这充分彰显了“我要爱国”和“要我爱国”的两种不同境界，所以马克思要求参看《法哲学原理》第268节的附释。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爱国主义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可惜《黑格尔法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⑦ 姜丕之：《马克思与黑格尔》，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⑧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8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学批判》是一部没完成的手稿，也就没能对黑格尔爱国思想做进一步探索。

当马克思确立新唯物主义时，他站在人类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国家的消亡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但是有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国家消亡观点否认他们的爱国观。首先，这种观点割裂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用将来的理想否定当下的现实。马克思的爱国观是辩证的爱国观，其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而要消灭现存状况，“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②可见，在现实中要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存在，毫无疑问，当然就要爱自己的国家。其次，马克思的爱国观也表现在国家是否具有现实性的看法上，因而形成其辩证的爱国主义，诚如恩格斯在评述黑格尔关于现实与必然的命题时所说：“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③如果现存的国家不合乎理性，没有现实性，那么爱国就要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④所以，如果无视马克思辩证的唯物史观，往往会得出“马克思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结论。最后，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眼里国家的功能，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成为阶级统治的机器，同时“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⑤，而马克思要打破的是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而不是承担生产管理功能的国家，不能把这两种功能混为一谈，共产主义国家的消亡是阶级统治国家的消亡，所以国家的消亡学说并不能说明没有爱国思想；相反，在朝向共产主义的路上要建立强大的国家，其在德国的具体表现就是“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⑥。既然建立国家，当然是要爱国的，在当时的情境下，马克思渴望有着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正如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仁人志士以各种方式探索救国道路，这都是深深的爱国情感的支配使然。所以，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里，马克思对爱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表现出历史的、发展的爱国情感，并且这种爱国情感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经超越自己的国家，具有了国际主义性质，正如《共产党宣言》最后发出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综上所述，青年时期马克思的爱国着重是感情的抒发，从青少年时期纯真、简单、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爱憎，到刚接触社会时满腔热忱、意气风发的爱国激情，再到进一步反思爱国，怎么样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马克思从国家及其制度的合理性来反思爱国，反对保守的爱国主义，主张革命的爱国主义。马克思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本里不缺乏爱国思想,不能因为他批判普鲁士以及国家消亡的观点就否定他的爱国思想,他成熟的爱国思想不是简单的表白,而是对祖国深深的关怀。

二、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的形成

从马克思的爱国思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以上述马克思的实践历程为基础,把方法和理论相结合,得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

(一) 方法上:在甄别各种非爱国形态中彰显爱国主义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爱国主义,其中不乏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虚伪爱国者,马克思以其辩证的思维和历史的眼光,审视和批判这些似是而非的爱国主义,从而彰显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第一,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发国家财的人。他发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奥地利的破产》一文,就鄙弃那种国难当头却退缩不前的虚伪的爱国主义者。“可是这些资本家仍然无动于衷,仍然抱着一种慎重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习惯于损害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利益,从国家那里取得最大的好处。”^①文中提到法国财政大臣招待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贝列拉兄弟在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庇护下从事投机活动赚钱的股份银行)的领导人,他们虽然享受着政府给他们的好处,但是在国家有难时却不回馈政府。马克思讽刺他们的爱国主义是“慎重的”,在和平时时期大肆赚钱,而在面临战争的威胁,要他们承担国债的风险时却慎重起来,缺少奉献精神,进而揭露其爱国主义的本质和利益联系在一起,有利益就爱国,没有利益就“慎重”爱国,这种功利主义的爱国说到底虚假的爱国主义。

第二,相比于发国家财的“慎重”的爱国主义,马克思倡导理性爱国,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工具性的爱国主义。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系列文章中谈到了西班牙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因为其激烈的情感因素,往往激情大于理性,所以要有正确的引导,马克思引用了霍赛的话警醒当时西班牙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火焰因加上迷信的圣油而燃烧得更旺了”^②。爱国主义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就怕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为一己私利服务,此时爱国主义可能会沦为别人手中的工具,和爱国主义本身的崇高相分离,进而马克思指出了不同的派别利用爱国主义的不同目的和后果,“革命的少数派竭力支持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毫不动摇地求助于旧的人民的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偏见。如果说这种策略对于民族反抗的直接目的是适当的,那末到了旧社会的保守派开始利用这种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7页。

见和人民热情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反对革命者的真正的、最终的计划的时候，这种策略终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少数派的致命伤”^①。革命派和保守派都想要利用爱国主义为达至自己的目的服务，各自以爱国的名义来对付另一方，因此爱国主义成为帮凶的工具。沦为工具的爱国主义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因为一旦失去了使用价值，爱国主义也就被扔进了垃圾堆。

第三，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揭露了资产阶级爱自己国家的欺骗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系列文章中对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有着精当的分析：“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爱国主义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② 马克思无情揭露了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隐藏的自私自利的目的，那些打着“纯正爱国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占有着国内的财富，此时国内任何的动乱（无论这种动乱是内部还是外部激起的），都可能导致他们财产的丧失，所以极力凸显自己爱国的面目以保障自己的财产。但是，诚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此时外敌的入侵对于本国资产阶级来说只是政权的转换，反而对其资本投机流向世界提供了很大便利，所以马克思说法国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就是“骗人的幌子”。而此时的巴黎公社运动“破坏那种人为的中央集权制”^④，反而被资产阶级以自己爱国的名义来大加鞭挞。这种自私自利的爱国主义一切以维护自己的财产为中心，无论是对于国内的革命，还是外敌的入侵，资产阶级都从私有财产的角度，要么痛斥要么迎合。针对资产阶级以自己财产为目的的爱国主义，马克思揭露了其包藏的祸心，揭去了其虚伪的面具。

第四，马克思反对殖民主义，歌颂被殖民地区的爱国主义。现今还有一种“侵略有功论”，说正是西方列强的侵略让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割裂行为与结果、动机与目的之间联系的谬论。我们以马克思论说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影响为例来澄清这个问题。首先，从结果来说，“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⑤，并且英国殖民主义摧毁了印度文明。其次，从目的上说，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造成的社会革命“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⑥而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其目的就是为自己谋利,“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通工具”^①,最终的结果是英国资产阶级“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②。面对殖民主义,我们不能任人宰割,此时的爱国主义就是对抗殖民主义,而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③。恩格斯的这个评论说明爱国就要保卫国土、维护尊严、传承文明。

在《革命的西班牙》和《法兰西内战》以及针对西方列强侵略亚洲的系列文章中,马克思虽未明确界定爱国主义,但是区分了各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揭露了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反对狭隘和虚伪的爱国主义,在方法论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大旗。

(二) 学理上: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

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甄别各种爱国主义时,不是单纯的比较,而是有着极其严密的学理支撑,才得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

第一,以世界史的视野看待爱国主义。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期间就对世界史有了深入的研究,这从创立《德法年鉴》这个刊物可以看出,其“摆脱民族的局限性,从新的立场和高度来认识和评价任何国家发生的事情”^④。同样,爱国主义也要摆脱民族的局限性,要从新的立场和高度来认识爱国主义,否则就成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再到理论上的成熟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⑤。这样的世界史观表现在爱国上,由于国与国之间由封闭走向开放,联系日益密切,因而爱国主义必须从对自己祖国之爱上升到国际主义之爱。

第二,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爱国就是要国家复兴、劳动解放。普法战争中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但是这个临时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⑥,这样的国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工人得不到解放,此时的爱国就是拯救国家,所以拯救法国就“需要为法国造就新的辩护人。看来,你和劳拉正在认真地和卓有成效地从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页。

④ 靳辉明:《思想巨人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54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这项爱国活动”^①。这句话来自马克思 1871 年 2 月 4 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普法战争刚结束，此时“为法国制造新的辩护人”显得非常有必要，任务就落到保尔·拉法格他们头上，所以保尔·拉法格积极开展恢复国际支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②。可见，马克思的典型爱国主张是国家复兴、解放劳动，这和中国梦的内涵何其相似！

第三，狭隘的爱国主义和人的社会性相冲突。马克思讽刺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把个人的欲望假以整个民族的要求，从而把侵犯他国当作爱国行为，“这个在 1846—1870 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表现得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之狮的角色，当然是欣喜若狂”^③。马克思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普鲁士的侵略行径表面上看是保护和平的行为，但是不考虑受害国的人民。这些“爱国勇士”只是站在胜利的普鲁士一方面“肢解法国”，反而要惩罚法国的真正的“爱国情感”甚至普鲁士“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要求占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理由是，此乃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④。狭隘爱国主义的罪恶嘴脸日益暴露。当马克思把德法历史进行对比时，这时“条顿族的爱国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⑤。这种爱国者总是站在自私的立场上为自己说话，忽视人的社会性，人为造成人的等级差别。他们对法国和俄国军事要塞的不同态度，也彰显了他们狭隘的爱国主义，“这帮德国爱国志士一看到法国的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修筑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⑥。上述爱国明显呈现出双重标准，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自身有利就是爱国的行为；而把他人同样的立场和行为判为不爱国。狭隘的爱国主义只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破坏了人的社会性，是对人的本质的侵害。

第四，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国者。马克思正是基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以往历史的考察，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大形态，最终走向自由王国，在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辩证地认识本国和他国的关系，必须具有超出本国利益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才有自由的王国。“国际总委员会已在为受普鲁士政府迫害的德国爱国者（名副其实的爱国者）的家属募捐”。^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8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4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4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73 页。

真正的爱国者就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尽管身为德国人，但是他们反对俾斯麦对法国的入侵，从而受到普鲁士的迫害。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不仅是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这种爱当然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但是这样的强大不能建立在侵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之上，更何况俾斯麦政府针对普法战争的军事拨款也是消耗国力的行为，当然会激起真正爱国者的反对，可以说真正的爱国者从来都是爱自己的国家的，从而会对损害国家的统治者行为进行反对，希望自己的国家正当、合法地强大。如果不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审视爱国主义，那么侵略他国反而成为爱国的行为。从现实来看，某些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非爱国的行为，只会激起民族仇恨，可能引发战争；当今有人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因为他本可以安享晚年，却要去竞选美国总统，说明他有一颗爱美国之心，但是他上台之后，特别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退群”等一系列自私自利的行为，以自己所谓的爱国心做出损害他国的行为，终究是损人不利己，谈何爱国？所以马克思所说的名副其实的爱国者，反对普法战争，支持巴黎公社，其实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理想的共同体。可见，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时，只是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工人无关，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虚幻的共同体”。而“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①，是追求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祖国，推而广之，是需要有一个不分民族的国际主义的联合体，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②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会上升到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否则就会成为毛泽东所反对的狭隘爱国主义。

人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特别是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阶段，在彰显科技无国界的同时，也需要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合作，不但要举国同心，而且还需要全世界命运与共，才能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两大问题。把爱国主义上升到国际主义并使二者相结合，才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不二法门。

三、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当下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削弱那些不爱国的声音。例如，有的人“梦回唐朝”，“热捧民国”，无视爱国的历史性；有的人“我爱祖国，但不爱政府或者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党”，打着爱国的旗号反党、反社会主义；更有人直接否定革命先烈，赤裸裸地反爱国；等等。总之，他们硬生生地割裂爱国主义是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统一。邓小平说：“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① 爱国就是以现实的国家为载体，而国家的形态和政府则决定了如何爱国，救亡图存是爱国，为盛世而歌也是爱国。

（一）爱国不能割裂历史

讲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爱国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② 习近平则以五四爱国运动为例阐释了大历史观，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③ 这说明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历史性就体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爱国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⑤ 所以不能把封建社会的爱国英雄拿到当代社会来评价，任何滞后于时代或者超越历史的所谓爱国都是不切实际的，岳飞、文天祥的时代，传统文化的忠君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他们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土符合当时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

爱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同时，历史总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爱国就要把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结合，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所以当下爱国主义表现为每一个活在现实中的人对自己的国家以及立于国家经济基础上的治理方式与意识形态的热爱。

（二）爱国讲求政治正确

首先，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承认国家和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马克思在《黑格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9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③ 《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光明日报》2019 年 4 月 21 日。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54 页。

⑤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 页。

尔法哲学批判》中认为黑格尔“对政治信念即爱国主义作了很好的阐述”^①，可见马克思也认可政治和爱国之间的联系。按照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说法，国家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②，这揭示了政治和国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来说，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政治上也必然要占统治地位，否则无法为自己的经济开辟道路，国家和政治不可分割。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③ 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就要靠政治的参与，一个契合国家的政治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政治方向决定了国家的方向，同时也决定了国家要做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国家说到底就是政治国家，爱国讲求政治正确是不言而喻的。当今世界，由于各国之间依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爱国更要讲政治，否则就会重蹈苏联覆辙。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弱化甚至虚无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其实弱化本国的意识形态就是为西方意识形态站台，而这也是俄罗斯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所以普京执政后痛定思痛，为爱国制定具体的政策，通过爱国推动国家的强大。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要求爱国讲政治。“经济全球化冲击和削弱着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④ 的确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实体形态存在的资本全球流动，哪里赚钱就流到哪里；同时，以智力形态的知识也在全球驻足，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往往让步于金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爱国主义。但是，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一系列反应，印证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⑤ 这一论断，同时政治对于经济又有反作用，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自己的祖国才是最坚强的后盾，而这种坚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爱国的政治性油然而生。

最后，爱国主义法治化是讲政治的正当体现。习近平指出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并且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⑥ 那么爱国主义则是法律推动的重中之重。当下，正向地弘扬爱国主义成果显著，各行各业都涌现出爱国主义的典范。而困难在于抵制反爱国主义思潮，学理上的反驳和道德上的规劝根本不能让那些居心叵测的反爱国者放弃他们的言行，如果任其发展则会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危及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此时就必须诉诸法治来规范爱国主义。从实践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施行，将那些诋毁革命英烈的反爱国者绳之以法，无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④ 刘建军：《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

⑤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

体现了法治对爱国主义的规范和保障作用，这正是爱国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正当体现。

（三）爱国尊崇伦理价值

如何理解人的价值问题是伦理学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而爱国作为公民层面的价值观，毫无疑问要纳入伦理学的范畴。蔡元培在其《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把“爱国”作为单独一节来论述，阐释了爱国心的起源，说明了爱国心对一个国家之重要，爱国“实国民最大之义务”^①。

第一，爱国是一种道德义务，是不以道德权利为前提的奉献。从道德的权利和义务方面来说，蔡元培强调爱国是义务，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而这种责任不能以获得某种权利为目的，也就是上文马克思批判的把爱国主义当作工具，那么爱国主义就不能称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崇高的，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道德义务。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南开师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所说，“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②。正是由于爱国主义的崇高性，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马克思也是放弃本来优渥的生活，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劳动者的解放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践行爱国的美德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习近平也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③的铿锵之言宣示了爱国的责任担当。

第二，爱国既爱自己的祖国，也要尊重他国。从价值评价来说，怎样爱国才是正当的，亦即爱国行为对自己、对他人、对国家来说是有价值的，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这就要反对两种爱国主义，一是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以自己的国家为最高，以高人一等的姿态看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这样的爱国行为会造成民族之间的仇视和国家的分裂，这在世界历史上有前车之鉴。二是小民族主义，自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最好的，不能兼容并包他国，对他国采取无视或者敌视的态度，特别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小民族主义终将自我毁灭。从价值评价来分析，这两种爱国主义都是不正当的，大民族主义对别人造成损害，也不一定有利于自己，亦即损人不利己；小民族主义不利于自己国家的发展，尤其在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小民族主义只会让自己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④。

第三，反对价值虚无主义，弘扬崇高爱国精神。价值虚无主义在一定意义上

①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

② 《习近平寄语南开师生：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2019年1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1/18/c_1124006791.htm。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4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00页。

是由对价值的误读引起的，有人引用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话作为价值的定义，即“‘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①。其实，这个定义是瓦格纳关于价值的定义，马克思只不过把它抽出来当作靶子而已，限于本文的主旨，在此不做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经济学的价值毫无原则地运用到伦理学上，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资本论》有关价值的整整一章中没有一点迹象表明，马克思是否认为他的商品价值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形式，或者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②如果无原则地套用，则会造成价值虚无主义，因为主体不同以及同一主体的不同需求都会产生对同一客体的不同价值判断，从而使价值充满不确定性，实质上就是对价值的消解，最终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在当下中国，就爱国主义来说，价值虚无主义表现为民族虚无主义，对自己的祖国不认同，一切以西方为圭臬，诚如张允熠教授所批驳的，“民族虚无主义已成为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主要精神障碍，克服这一障碍是当下每一位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③。价值虚无主义不是不讲价值，而是排除其他价值，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以能否实现自我价值为标准，从而消解崇高，嘲讽远大理想，是对当下爱国主义的严重戕害。所以，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价值虚无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不仅是对祖国的虔敬和认同，更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是个人完善自身与奉献社会的统一；在现实中，弘扬爱国主义要把历史、现实、政治、伦理等多维度、系统性、整体性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到爱国主义是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立足国家，同时奏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③ 张允熠：《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精神障碍》，《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On Marx's Patriotism Thought

——Concurrently Refute All Kinds of Anti-patriotic Thoughts

Zha Zhengquan Zhu Jindong

Abstract: Marx's patriotic thought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germination, formation to maturity, and finally becomes Marxist patriotism. Marx's patriotism with heroism was revealed in his essays when he was in middle school; he showed strong patriotism for his country's loyalty and dedication when he first walked out of university; after quitting the "Rheinland", he studied the patriotism of Hegel's philosophy, which has given a rational promotion to his patriotism;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materialism, Marx's patriotism has also matured, especially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which has manifested itself as dialectical patriotism.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Marx distinguished various non-patriotisms and establish the banner of Marxist patriotism. In academic theory,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got rid of narrow patriotism and pushed patriotism to international patriotism. Marxist patriotism respond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dheres to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politics and economy, ethics and value, adheres to the unity of patriotism, loving the party and socialism, systematically promotes patriotism, and advocates internationalist patriotism based on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acing the world.

Keywords: Marx; Patriotism; Internationalism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考察^{*}

郭 瑞^{**}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之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受时代背景、政治路线与社会思潮的制约和影响，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中国化的先决条件。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既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成功之处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受时代背景、政治路线、社会思潮的制约与影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回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科学把握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立场、路线方针和理论成果，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富内涵，总结规律，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 本文为2019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学者重点培养计划研究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研究”（19CQXJ18）阶段性成果。

^{**} 郭瑞，济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一、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步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是为救亡图存而被引入中国并且迅速传播与被接受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在书斋里进行的学术探究，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范畴的理论推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理应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发挥最大的效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上屡遭挫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历经坎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开创性地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借鉴吸收，实现具体化、时代化、中国化，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及民族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与文化的国家，曾经是世界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明清之后，曾经灿烂的文化也随着封建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衰败而僵化，失去活力。近代更是遭受西方殖民者入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文化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人民迫切希望通过革命改变国家面貌和民族命运，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前，这种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的情况，靠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国外的经验，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代表了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中国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要在一个文化基础、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迥异的国度里被广泛接受并发挥效用，首先就必须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实现民族化。对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学习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现实需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深入学习中国历史与文化，是领导中国革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现实却是“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

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①。许多共产党员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只会机械背诵马列主义教条，毛泽东指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文化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和方法就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就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毛泽东认为，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③。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范，按照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去应用它，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突出任务。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从意识形态独尊的位置跌落下来，失去主流文化的影响力，退回到民间，暂存于书斋与学术界。然而，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不可能完全与传统文化彻底割裂，如何矫正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过激的批判，正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成为20世纪30年代悄然兴起的现代化思潮的文化主题与思想重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日益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激发强烈的民族意识，形成持续高涨的文化救亡运动。从传统文化中探寻凝聚人心、团结抗战的思想资源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文化使命。当时，中国思想界开展的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已经涉及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核心命题，围绕现代化的参与人数之多，涉及议题之广，都是空前的。这场波及面颇广的思想运动对矫正五四运动在传统文化的片面立场，总结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在延安，艾思奇等文化工作者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讨论对摆脱“左”倾和右倾错误羁绊、冲破马克思主义教条束缚、推动全党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是总结并吸收了思想界关于现代化与中国化的积极成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号召全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④。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指导现实斗争、反对文化“围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还要在文化上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近代中国各种反动势力结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这种斗争是“生死斗争”。^① 面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尊孔读经”运动，以孔子与儒学为招牌的文化“围剿”，毛泽东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② 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③。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批判继承又不断借鉴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层面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二）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方针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提供文化滋养，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封建社会文化，自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以来，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被马克思主义取代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由以下两个因素造成，一是随着封建经济瓦解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封建传统文化失去制度的依托，逐渐没落。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独尊”的地位和文化主流位置已经丧失。然而传统文化非意识形态的影响仍在，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发挥功效。传统文化出路就是适应社会转型，不断吸收其他先进思想实现现代转化。二是传统中的消极因素是造成中国人惰性、奴性、个性泯灭的文化原因。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与宿命论、落后的封建宗法意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剥削思想、形而上学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保守观念等，长期束缚人的思想，并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和服务，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这些消极因素必须引入先进的、现代思想予以批判改造，否则无法适应社会需要。

批判继承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方针，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④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的继承者与弘扬者，也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① 在批判继承文化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注意借鉴传统文化合理形式，吸收其中积极成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贯通。正如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②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功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3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险遭受灭顶之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地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和近代基本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中国实际，并对革命实践的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运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③ 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采用的是民族形式表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主要贡献。从毛泽东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看，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取是多元的，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讲话之中引证古今中外的人物中，孔子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人，从流派上讲，儒家思想占据主体地位，毛泽东提出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也表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伟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得益于毛泽东同志不仅善于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同时也注意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的成分与精华，如民本思想、大同理想、天人合一、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优良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思想就是基于深厚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富有创造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理论和文化创新的过程。据统计，《毛泽东选集》1～4卷中的成语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典故，来自《左传》有40多处，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录》各有20~30处，来自《大学》《中庸》等著作有10处左右。^①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人类创造的一切智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除去其中时代性和思想性的局限，挖掘其中蕴含的现代价值，使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很多方面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都是从中华文化典籍中直接化用而来，并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代表。毛泽东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积极吸收先进思想并且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精神，才能补充其不完全性，纠正其不合时宜的因素，才能获得新生，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毛泽东思想“是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精神而显示出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②。

除毛泽东外，刘少奇同志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刘少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与中华传统修身之道有机融合，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共产党人的修养之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加强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这一学说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人进行自我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又一典范。

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对旧文化、旧意识进行清理和批判，既是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断受到党的“左”倾路线的干扰，仍然以革命思维对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断升级，并最终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被完全中断。

（一）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

^① 崔龙水、马振铎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② 崔龙水、马振铎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全的空想。”^①

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都相对落后，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来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赖以确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党的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并逐渐对旧的经济成分进行改造，适当的时候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除此之外，清除旧社会遗留的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乐观地估计：“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②在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领社会意识形态并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学术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全社会掀起了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热情，各种思想先进、立场鲜明、格调清新的文化作品被创作出来。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发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结合的号召，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中国化、继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指明了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被迫中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步伐却因不断升级的文化批判而放慢直至完全停滞。究其原因，从客观上分析，新中国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加之刚刚解放，国内反动势力还未完全肃清，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始终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提防反革命复辟。从主观上分析，这是执政党以革命思维对待传统文化的惯性使然。面对各种复杂的国内与国际问题，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还缺乏经验，尤其是处理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问题，方法和手段还延续了革命年代的一贯思维，未能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以批判为主，否定过多。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思想上、文化上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人民也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也有可能毁于一旦。只有不断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才能巩固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数次发动文化批判的出发点。

概言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是批判为主、继承不足。党内“左”的思想发展，更是将学术政治化，干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1962年11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孔子学术讨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孔子的中心思想问题、孔子代表的阶级及思想的阶级性、孔子世界观，以及孔子地位与作用等。会议上，少数人对传统文化上纲上线的批判使原本较为轻松的会议氛围骤然紧张，与会者噤若寒蝉，打破了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和谐局面。济南会议之后，孔子思想被片面阶级定性，儒家思想被贴上了“旧思想”“旧意识”的标签。6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传统文化就很少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了，正常学术研究已被政治批判严重干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引下，在触及人思想灵魂的革命中孔子被认作落后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儒家文化是维护没落奴隶制度的，是剥削者调和矛盾、消除抗争、麻痹人们思想的武器，因而是落伍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直至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民参与的政治批判，最终完全否定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至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完全中断。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文化方针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向，提出了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指导原则，但还是受主客观因素制约，还没有真正理清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传统文化缺乏清醒的分析，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可以继承的民族性精华认识不足，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持怀疑的态度，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留下惨痛的教训。

三、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清除了教条主义与极“左”思维，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定位，批孔时代也一去不复返。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迷离与彷徨，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密切，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越是现代化，越是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既不会妄自菲薄，全盘西化，也不会自轻自贱，跨越传统追求现代化。面对各种文化方案，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建了一整套涵盖民族意志与文化传统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是众多文化进路中最为理想的一种方式。在复杂的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在各种社会思潮共存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断向前推进。

（一）多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紧张和对立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推动下，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出现，打破了原来简单的社会经济成分与经济利益格局，社会开始出现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阶层。国门敞开，西方各种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迅速传入，急速转型的中国形成了古今中西文化交汇，各种思想意识、价值理念相互交融的多元化格局。在多元化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并存。传

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改革开放年代文化建设首先面对的敏感问题。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现代化的进程总是步履维艰,一次又一次被打断。“‘文革’的出现乃是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冲突朝着背离现代化要求方向恶性发展的高峰却是毫无疑问的。”^①当中国人从十年内乱中走出来,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如梦初醒,发现世界真大,信息化时代科技日新月异,而中国物质匮乏,与世界的差距似乎比想象的还要大,西方成为中国人仰慕的对象,代表着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想象。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反思传统的批判倾向: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传统文化虽然摆脱了意识形态化的窘境,但又面临“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理论界一方面为中国落后寻找观念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为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寻求合法性的依据,“文化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80年代思想启蒙的话语中,无论是哪种目标,都将传统文化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罪魁祸首,传统与现代化是相冲突的,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和现实之中政治、经济的改革阻力都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1985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在《文汇报》发表《论传统文化惰性对中国现代化的三重屏障》一文,认为儒家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80年代初期,内地学者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认识上普遍受马克斯·韦伯观点的影响,即接受传统价值体系的人不可能接受现代价值体系,认为儒家文化价值与现代完全不具备共同性。李泽厚也认为:儒学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剖析此类观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学者们还是延续“新旧”和“古今”相互排斥与对立的文化观,只窥觊到传统文化时代性不足,对民族性的精华则视而不见。80年代,在中国最高学府里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中国深受儒学之苦,儒家是封建遗毒,没有它中国的现代化早就实现了。儒学等传统文化被认定是现代化的障碍而被排斥。^②列文森早已断定儒学已无现代价值,只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供人欣赏的古玩而已。^③纵观整个80年代,受西化自由主义的影响,反传统的西化倾向是主基调。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出现就是这种社会思潮泛滥的表现。80年代末之后,西化受阻,传统主义复苏,传统文化热出现。汤一介指出:“现代化不能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等等。”^④90年代以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退却,人们开始正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中挖掘医治现代

① 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

② 参见杜维明:《体知儒学:儒家当代价值的九次对话》,浙江大学出版2012年版,第5页。

③ 参见[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化之殇的资源，“国学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进入新世纪，在不断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人们思考的重心开始转向寻求现代社会人文价值失落的良方，避免重复西方工业化老路，传统文化又一次得到重视，至今热度不减。

在当代中国复兴传统文化，就不能回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曾经受到各种质疑和挑战：去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继承传统文化、以儒学直接取代马克思主义，有从西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针砭现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遮蔽”，站在新生社会阶层的立场上主张解构、消解和淡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等文化主张。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方向与路径，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新开启

摆脱“左”的束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并提供政治上与制度上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非凡业绩，古老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可喜的成果。在党的理论创新上，邓小平借用中华传统里的“小康”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党领导人民实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既形象又具体，为人们喜闻乐见。江泽民深谙传统文化精髓，将依法治国与中华传统中的“德治”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胡锦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清除对传统文化的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罪名，科学评价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与可继承的民族性精华，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成绩斐然。以儒学为例，国内儒学蓬勃发展：新儒学的实力和影响不断扩大，对儒学现代价值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大众儒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开始建构现代儒学体系，先后有和合学、仁学、生活儒学、体知儒学等理论，显示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与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大力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

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鲜明的特点。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给予明确的论断，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

理论是变革的先导，在世界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需要从理论上做出回应与创新，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理论目标。习近平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实践相结合，提出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指导和批判、补充与改造的关系，应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双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提出的指导原则，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具有启发性作用。经革命、建设与改革，马克思主义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功结合的基础上，二者要实现深度融合，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仅限于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形式层面的内容并加以阐释，不能仅仅以批判传统文化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二者深度融合要具体到内容供给上，要在更为微观的层面实现结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蕴含的深意。努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双创”也必将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进入新的境界。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而且要走进民众，走向民间，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民族化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②。习近平还指出：“没有中华文化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页。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要不断“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②

（三）“双创”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指导原则

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给出的一条现代化新路，是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指导原则。从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功能、属性等重新定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观进行了重大调整，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进一步升华，标志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双创”是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是以文化创新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是开创 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根本保障。

五、结语

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动摇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它既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成功路径，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已成为常识，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长期得不到学术界认可，就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也一度被学界人为冷处理，甚至有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价值观混乱、民族精神失落、道德沦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替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导致的结果。“放弃对终极价值、目标信仰的追求和提供，而是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5 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49、352 页。

关注具体的局部问题的解决。”^①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进一步深化的一个焦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正本清源，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一个正式结论，解决了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对肃清理论界的各种流毒，清除各种错误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动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理论创新推动文化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过程，二者的结合是理论创新推动文化创新的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文化创新取得丰硕的成果：成功建设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了伟大建党精神，构建了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等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这些文化创新硕果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精神财富，成为永远激励人们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更挽救了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为传统文化引入先进思想资源，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动了中华文化向前发展。总结百年文化建设经验，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发展路径，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吸纳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资源，沿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开辟的成功路径，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汤一介指出：“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特别是实现与儒学的有机结合。”^②

^① 方克立：《要注意研究 90 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高校理论战线》1996 年第 2 期。

^② 汤一介：《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中国哲学史》2012 年第 4 期。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Guo Rui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ut also the need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is restrict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political lines and social thoughts. Successful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fter experiencing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rough an extraordinary path.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also the need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Marxism;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ve Ransformation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密码解析^{*}

张燕妮 李春华^{**}

【摘要】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程，也是党领导文化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程。在党领导百年文化建设的历程中，形成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取得了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纵观党的百年文化建设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探索文化建设的规律、健全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和创新文化建设的形式，是我们党取得文化建设伟大成就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伟大成就；密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并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主动担负起文化使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萌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创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时期等几个阶段不断丰富与发展。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史，是领导各族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史，是领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1MYB03）阶段性研究成果。

^{**} 张燕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李春华，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导各族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历史，也是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显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入人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卓有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化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发展，文化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自信日益彰显，中华文化对外交流能力、中华文化影响力稳步提升，文化软实力逐步提高。纵观党的百年文化建设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探索文化建设的规律、健全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和创新文化建设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文化建设伟大成就的根本所在。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经验弥足珍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用党的先进文化激励人、教育人、启迪人，从中汲取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重视党对文化的领导，为文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文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将社会的基本结构理解为由经济、政治、文化构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纵观百年历史，文化建设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国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必然是文化事业的领导力量。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是文化建设坚持先进性方向和文化发展为人民的价值取向的根本保证。

回望党的百年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党的中心任务有所不同，但党从未忽视文化建设。党在成立之初就把文化建设放在应有位置，最早建立的工作机关就包括领导思想文化建设的宣传机构。中共一大决议强调党对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并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对革命文化建设的领导制度，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概念，阐明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进行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的必要性，认为“文艺革命上的领导权的争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取,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严重的任务”^①,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②。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组织机构来领导文化团体,并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领导文化的路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其职责是“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③。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对党外文化进行领导和引导。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1930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人士、文艺界工作者和中间派合作,文化界统一战线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支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浩浩荡荡的革命文化大军。这支文化大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先后创办了《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报》《北斗》《文学》等几十种刊物,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等113余种马克思主义著作^④以及大量文艺作品,如鲁迅的大量杂文抨击了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茅盾的小说《子夜》、歌剧《白毛女》、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使革命文化占领当时中国的文化阵地。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共在“苏维埃区域”的组织丧失了90%以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丧失了几乎100%,而在文化战线上却大获全胜。左翼出版物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完全压制了国民党御用文艺和右派文艺,到1936年,左翼文艺力量投入文化界统一战线,形成了全面左倾的舆论氛围,即毛泽东所说的“大获全胜”。^⑤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⑥他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框架。张闻天在《发展文化运动》中也阐明了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性:“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⑦他还强调“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⑧。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理论成熟的关键时期。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⑨从而明确了党对无产阶

① 文振庭:《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105页。

②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④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8~370页。

⑤ 王锡荣:《客观地评价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地位》,《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页。

⑦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

⑧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级知识分子、文艺工作的直接领导，制定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执政，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在对文化事业的改造中，党中央在政府及其文化部门设立了党组或党委等，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并且积极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投身文化事业建设，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①。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思想文化日益多样，各种不良思潮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严峻的挑战和冲击。中国共产党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牢牢掌握在党手里”^②，“各级党委都要增强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③。21世纪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的文化渗透，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牢牢坚持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权，不断改进和完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讨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将“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进行论述，指出这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健全领导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增强领导文化建设的本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④具体到文化建设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安排部署，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⑤恩格斯指出：“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要确保国家长期稳定、国泰民安，人民团结一心、凝心聚力，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就必须紧紧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确保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保证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的根本保证，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确保文化建设的先进性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

①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4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

产阶级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从而确保了文化建设的先进性。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领导文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所在,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也是今天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文化选择与重构过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精神层次的转型过程。^①相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有其先进性。然而,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后来毛泽东批判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缺乏唯物史观的批判精神。^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新文化运动开始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审视文化问题,从而找到了认识文化的科学方法。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企图通过改造国民文化就能实现国家根本变革的思想无异于是痴心妄想,最终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③他明确地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并科学地阐明了三者的内在联系,这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历程中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前提,从根本上澄清了过去那种“孤立地看待文化”“夸大文化的作用”“将传统文化连根拔起”“全盘西化”等错误观点。他还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④这一文化建设目标的提出,指明了延安时期先进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先进文化的热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启蒙运动,涤荡农村旧思想、旧道德、旧习俗,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1931年,湘鄂赣工农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就提出必须彻底铲除旧社会遗留的一切旧

① 参见孙成武:《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② 参见杨恩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道德、宗教、风俗、封建教育和礼教，建立工农阶级的文化事业，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社會基础；取消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①这是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指导方针。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多次交谈并产生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对文化的认识分歧。梁漱溟提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②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他们关于“文化与政治”的争论与分歧，表面上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不同，而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异。^③正是对文化的地位和本质认识的不同，致使他们对社会改造的思路存在严重的分歧。毛泽东主张用革命、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梁漱溟主张用“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毛泽东强调：“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④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掌握和运用程度和能力的差异，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错误思想，主要表现为“左”倾盲动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部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成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缺乏应有的认识，党内出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伪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在党内蔓延。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党内腐败、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家长制、特殊化、分散主义等不正之风。新时代还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为此，1929年的古田会议，1941～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1983年的整党运动，1998～2000年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党风教育，2005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9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021年的党史学习教育等都是通过整风及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来肃清党员干部的错误思想，进而从根本上树牢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⑤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

① 参见陈元晖、璩鑫圭、邹光威：《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3页。

③ 参见肖建平：《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的六次“交换意见”》，《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4～95页。

的历史实践,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是确保文化先进性的基础和前提,确保文化先进性的方向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文化建设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并社会发展注入不竭精神动力;一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文化建设就势必会遭受巨大挫折和损失。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人民立场的源头。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建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也必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一刻也没有忘记“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党在领导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把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相结合、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前提条件是获取无产阶级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因而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民众思想,唤起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政治觉悟。在旧中国,文化教育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独有的专利和特权,人民大众是被排除在文化教育之外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而开始自觉关注文化大众化问题,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和生力军,中国文化建设的主体从此实现了根本变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开始探索文化大众化的实施路径,通过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办工人夜校向大众传播文化知识,逐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民主意识以及革命觉悟。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指出:“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②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旧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过去的文化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和享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这就体现出鲜明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创造主体,又是文化的享有主体。针对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界还充斥着“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我们不是歌功颂德的”“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①等错误观念。为此，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②“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③延安时期创作的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传播了新知识、新文化，起到了提高人民思想认识水平的作用，而且为繁荣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如秦腔剧《穷人恨》、孙犁的《荷花淀》、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新歌剧《白毛女》等，以文艺特有的审美娱乐性来提升民众斗争意识，增强了党在革命文化工作方面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新中国立之初，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强调，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④。在推动经济上“三大改造”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化改造”，实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通过开办识字班、夜校等形式进行文化的普及教育，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储备了大量人才。1949年，文盲占人口总数的80%。但到1964年7月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文盲半文盲的比例降至38%。这表明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建设了一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产生了一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出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主旋律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⑤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再次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一次深刻调整与宣示。他还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中央强调文化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⑦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⑧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

① 参见孙成武：《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⑤ 参见孙成武：《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2页。

⑦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

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的诉求，文化要做到三贴近，即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其中，贴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落脚点。为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党中央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不断改善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调动和激发他们投身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尤为强调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①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领域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人民为主体，依靠人民力量以及由人民来检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多样，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日益得到丰富和满足；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四、完善体制机制，为文化建设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过程中十分重视建立科学完善高效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从而为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恶劣复杂的军事斗争环境，在这一革命形势下，文化体制的总体特征是政治体制主导。党的一大就在中央局下设置了专门的宣传部并规定了对报纸、书刊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1929年，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对红四军的文化教育提出明确要求：由“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在“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②，强调要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组织红军学校和各式教育机构，对军队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1939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要高度重视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注意对文化团体、文化运动、文化机关的领导和影响，吸收文化工作者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1943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设立了宣传委员会，这是党对宣传文化体制进行的一次大调整。这一决定与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通过的《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31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出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边区文教大会做出的《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等文件共同形成了延安宣传教育的体制、机制，有效地保障了延安文艺运动的开展。^①以政治体制规范文化管理体制、决定革命文化的发展方向都是为了使文化体制服务党的路线，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机制很好地适应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需要，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为文化宣传制度建设创造了基础。首先，形成了党对意识形态直接领导的制度。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②因此，用刚性的制度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十分必要的。1951年，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党内，只承认一种思想是合法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在党外，非无产阶级、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还是合法的。但是要批评，指出它的错误。”^③随后，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批判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等文件，推动了全国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的兴起。对于自觉抵制封建落后思想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完善了宣传文化组织管理机构设置，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化管理体制。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党中央在《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中指出：“必须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④《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必须定出计划，在一两年内逐步充实宣传部的机构与人力，并督促其有步骤地按照不同等级的职务范围进行工作。”^⑤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及地方的宣传部以及下设理论教育、文化艺术、学校教育、书刊出版等部门的主要任务和职责范围，强调了党委的领导职能。1957年，由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毛泽东提出：“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⑥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不断定型的过程。

① 参见杨恩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5～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2页。

程,尽管其间文化体制建设也遭遇了曲折,但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的保障作用是要充分肯定的。

改革开放后,经过文化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1978年,全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文联、作协、音协、剧协、影协、舞协正式恢复工作,这对于我国文化事业的恢复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这一时期逐步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市场经济主导,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提出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创新机制和文化市场管理机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①。这就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2006年,党中央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详细指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以及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企业改革,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等具体措施。同年,还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实力和竞争力。^②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管理突破了过去单一的行政手段,而是转向运用经济、技术、法律与行政等手段综合管理。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并指出:“建立健全……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③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并进行了详细周密的部署,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以及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这标志着党领导的文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

① 《当前政治理论教育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② 参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五、探索文化建设的规律，形成科学的文化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文化建设的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来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逐步提出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及正确的文化建设方针，形成了科学的文化建设理论，指导文化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优秀传统文化不能自然而然成为现代文化，必须经过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坚持“古为今用”，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要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决不能割断历史；必须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又不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要注意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在中央研究院下设了专门研究传统文化的机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与中国历史研究室，还成立了鲁迅研究会、大众读物社等协会和社团，搭建起研究与交流传统文化的平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涌现出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也是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在新时期的表现。进入新时代，党又提出了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针，2014年出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论断为我们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创”的理论基点和正确方向。

文化不是封闭的，要想发展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中国共产党在推翻封建落后文化、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同时，不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文化创新。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时代呼唤进行文化创新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它既借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也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诚信、友善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新出来的科学体系，是对国家意识形态高度的价值凝练。

（二）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文化借鉴与包容的统一

文化的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事实和规律。不同的文化需要交流互鉴。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以及非洲文化传统等都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近代中国在遭到西方的侵略后，文明蒙尘，许多仁人志士抨击传统的封建文化，将目光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益激化，人们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东方文化救世论”风靡欧洲，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关注、向往中国文化，力图以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的危机。中西文化这种相互憧憬的趋向从客观上说明了不同文化需要相互交流借鉴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处理古今中外文化关系问题上，坚持“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和正确方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① 这充分说明我们固然要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但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进行消化吸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地吸收。这既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也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多次讲话和多个场合谈到文明的交流互鉴问题。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发言，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再到在亚洲文明对话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围绕对文明存在状态的阐发和对文明演变规律的揭示，习近平提出了诸多内涵丰富、系统完善的新理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赓续，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

（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的统一

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指出：“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这是“二为”方向的雏形。改革开放后，面对开放多样的经济社会，邓小平强调：“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邓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小平充分总结前期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当前中国文化建设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明确“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

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没有边界、没有原则的信马由缰，而是有原则、立场和价值导向的学术派别或艺术风格的争论与批评。这个原则、立场和价值导向就是“二为”。“二为”方向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不仅为文化建设实践的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在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

The Cipher Analysis on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One Hundred Years

Zhang Yanni Li Chunhua

Abstract: The century-old journe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journey in which the Party has led the people in striving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also a journey in which the Party has le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d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entury-long 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revolutionary cultur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taken shape, and a path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explored,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and rich experience accumulated. Throughout the one hundred year's culture construction process, we can see tha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our Party's great achievements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all-round leadership on culture construction, guide culture construction with developing Marxism,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 value orientation, inheritate and carry forwar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plore the rule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of it.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ultural Construction; Great Achievement; Code

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探究^{*}

姚 红 邓红彬^{**}

【摘 要】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之所以接纳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中国文化两难的选择、中西两种文化发生危机的选择、苦难中国经历的双重挑战的选择和爱国的有识之士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融入了国人的生活、语言和思维的各个层面，已经积淀在民众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中，成为文化基因。从文化基因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在思维方式、价值立场和实践模式上都存在诸多契合和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呼应，后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直接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代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指导和改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浴火重生，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创的形态和模式向现代的形态和模式转化与发展，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入了现代因素，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意蕴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

^{*} 本文系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1—2022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红色精神融入‘课程思政’的育人价值及路径研究”（CQGJ21A047）、2021 年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建党 100 年党史研究专项“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研究”（2021DSYJZX07）前期研究成果。

^{**} 姚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邓红彬，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51 页。

国共产党首先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方面根据中国各时期的具体实际情况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也不可或缺地与中华历史文化不断碰撞、交流、融通、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终落地生根，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最终形成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有实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一、从文化根源探究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个国家选定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是和这个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密切相关的，对近代苦难的中国来说，哪种思想文化能够解决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课题，它就能成为复兴这个国家的行动指南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近代能被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接纳，并被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选定为行动指南，我们首先从文化根源上予以考察。

（一）接纳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文化两难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能被中国接纳和在中国传播是由于中国近代落伍，封建社会遭受了现代化的猛烈冲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为了改变落后的状况，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开始不断学习西方的文化，凡此种种，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当时无论选择的是哪一种主义、哪一种思潮，都没能解决当时社会的具体问题，都没有使旧社会人民摆脱悲苦的境况。中国急需新的思想文化引领国民救亡图存。此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碰撞与交融，先进的中国人经比较确定传统文化落后，传统文化缺乏现代性，缺乏产生民主和创造、聚集科学的环境，因而中国也不可能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进而实现现代化。为此，必须“西学东渐”，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学习中有识之士发现，代表西方文明的“先生们”为什么老是欺负虚心向他们学习的学生呢？这些有识之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产生了矛盾心理，处于两难的选择境地。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珍贵财富，但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能实现现代化的先进的西方文化既是我们的老师，又是霸权和侵略的象征。这时的中国非常矛盾，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抵制西方侵略。怎么办？此时，中国共产党选择既来源于西方又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最当适宜，因为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罪恶，另一方面又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一致，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此时马克思主义正适合中国既需要学习西方又要对反西方的矛盾心理。^①

^① 参见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4日。

（二）接纳马克思主义是应对近代中西两种文化发生危机的选择

近代中国之所以接纳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危机。首先，1905年袁世凯等奏请废除科举制后，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其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退出了政治舞台；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多重危机，多次受到猛烈批判和抨击。总的原因是中国近代落后，爱国的有识之士为了民族复兴，不断抨击否定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认同、精神启迪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在现代化面前都出现了危机，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怀疑，大大地消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权威性。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也发生了从认同、崇拜到怀疑再到失去信心的转变，基于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需要，他们进而转向认同和接纳源于西方又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三）接纳马克思主义是近代苦难中国应对双重挑战的选择

近代中国，一方面，既需要国民不断追赶西方先进的现代化，以此改变国家的旧制和传统，又需要国民抵御来自西方的欺辱和侵略；另一方面，为了拯救国家，为了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也需要国民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面对这两种矛盾和冲突，面对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双重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先驱也接触过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西方理论，经过反复实践比较，毅然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俄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总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先进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比较了西方各种社会流派与思潮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①

（四）接纳马克思主义是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爱国有识之士的选择

为了实现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在中国共产党内荟萃了一大批爱国的有识之士，他们自幼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洗礼，饱读诗书，后来为了寻求救国真理，漂洋过海，学习西方文化，这些爱国的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与结合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突出表现在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等这批杰出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集儒家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一身，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贯通。特别突出的代表就是毛泽东，他博古通今，不仅精通经史子集，对中国历史文化了然于胸，还善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也读两类书，一类是有关马

^① 参见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读》，《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列主义的哲学书籍，另一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毛泽东曾感慨地表示，照搬马列书本的教条主义是行不通的，会害死人的，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

二、从文化基因探究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深深地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语言和思维，积淀在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中，成为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国家的发展形态。那么，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包容来自西方的马克思的思想呢？从文化基因上看，马克思的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立场和实践模式上都存在诸多契合和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呼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契合

马克思创设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及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和道家等学说是基本契合和相通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差甚大或者存在隔阂，那么很难设想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在多种外来的社会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很难想象历经几千年中华文化涵养的中国先进分子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代表的是西方理性精神，但是它跨越了西方文化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它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思辨的辩证法精华，将之改造成为实践的辩证法，并用实践的观点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巨大变革；对立统一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法论，马克思的对立统一思想主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承认世间万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为中华传统哲学崇尚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及思维方式，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法在思维方式上高度契合。据考证，《老子》早就提出了“一生二”观点，随后在《易传》中有了“分而为二”的说法，在《黄帝内经》中也提出了“一分为二”，到宋明“一分为二”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发展，完整地表述为对立统一关系。朱熹认为：“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王夫之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联系起来考察，实际上表达了朴素形态的对立统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遂成为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内核的中国式完整表述。马克思也承认事物内在的矛盾，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和新陈代谢，在中国哲学中表现为五行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物极必反、阴阳二元论等思想，这些学说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是相通的；《道德经》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对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传承，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成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

场也是相契合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逼上梁山”的典故与马克思的阶级压迫引起阶级反抗学说具有一致性。这成为二者融合的内在契机。还有马克思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主张不靠神仙皇帝，依赖现实力量，不借助上帝或鬼神来改造社会。中华传统文化也具有无神论倾向，在信仰上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主张“天人合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神论倾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立足点。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契合，也是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价值立场上的契合

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有识之士接受，一是因为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的“大同社会”理想、提倡的利他思想及追求群体利益、整体的利益等思想存在某些相通和契合之处。对“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表述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倡导利他的思想，追求群体利益。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追寻，发现春秋的“三世”说、孟子的“仁政”说、墨子的“兼爱”说、康有为“大同世界”学说等，都是在不同时代对“天下为公”理想社会追求的不同表述，这种不间断的、利他的、追求群体利益的思想，逐渐内化成为国民意识中的基本伦理意识。这种不切实际的对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有本质区别，因为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两者还是存在着许多相通和契合的地方。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为了实现个体的自由、整个人类的自由且劳动不再作为谋生手段的理想社会，是人类为了彻底解放而获得真正自由的社会。这种社会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接受和认同，从文化上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做了深层次铺垫。

二是因为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重民、利民、裕民、养民、惠民的“以民为本”、“民贵君轻”以及“民为邦本”的思想契合。马克思主张的消灭剥削、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意识和“利用厚生”的民生主义思想相契合。另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都有着集体主义的传统，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与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主张以及“家国一体”思想是契合的。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实践模式上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注重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重视社会现实，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来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实践模式是契合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倡导人的“内圣”，即人的

内在修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倡导“外王”,即人实现个人理想服务社会的抱负,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鼓励学子多投身和参加社会实践。实际上,“内圣”和“外王”应该统一,才能最终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些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基本契合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是高度重视社会实践,赞扬社会实践的作用。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道德实践视为实践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主张的实践则偏重于社会实践,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总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都尊重实践,都承认实践的价值,都认同实践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向度和基础尺度。儒家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担当意识与马克思主张的改造世界的观点是相通和契合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对客观世界采取的都是积极的“入世”态度,儒家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仁”为原则处理人际关系也是注重社会实践的典型。^①

三、从文化价值探究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直接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代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指导和改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浴火重生,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创的形态和模式向现代的形态和模式转化与发展。而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去芜存菁、革故鼎新和凤凰涅槃注入现代性活力,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入现代因素,重新融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从原创样式向现代样式的转型。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物质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封建迷信、歪理邪说中走出来,让封建迷信和歪理邪说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看待世界发展变化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强调人类需要在深入认知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进步,有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就能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如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通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民主”“科学”的精神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创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有了领导力量,中

^① 参见贾丹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与当代价值》,《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年第2期。

华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有了人民主体的意识,摒弃了原有文化的各种弊端,还在实践中诞生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党的领导下,在艰苦的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使中华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①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和创新

理论指导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理论成果不断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新的时代内涵,不断与时代精神结合,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革新和发展,这突出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成果——毛泽东思想是转化的亮点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创新的最初亮点,体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用鲜活的话语表达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有机地融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使二者价值互化,而后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毛泽东强调马克思的“本本”离不开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抽象空洞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解决具体问题的。所以,毛泽东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融入其思想并付诸实践。毛泽东的讲话以及著作中常常采用通俗易懂的、接地气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幽默的、民众能接受的语言形式。毛泽东用了谚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形容民众有无限的智慧和创新思想;用了俗语“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道理;用了成语“愚公移山”来形容和表达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用了俗语“路遥知马力”来形容质和量的辩证关系,并阐明马力就是质,路遥就是量;为了充分彰显和表达新生事物是打不垮、压不灭的,形象地使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外,他还将内因和外因的哲学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融会贯通,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相关的军事理论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还把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的理论 and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民本思想充分融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还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和中华传统哲学中矛盾的观点来注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等等。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系列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转化的亮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断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不断融会贯通的产物。这个成果把中华民族文化的本土基因与当代社会的需求相结

^① 王成、丁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向度》,《理论探讨》2019年第6期。

合、相适应,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表现出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同新时代的先进文化相适应并转化为精神力量,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功实现创造性转化。邓小平同志强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花大功夫,用“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的四段式方法进行研究,但在研究中还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有足够清醒的认知。江泽民同志认为,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不断进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应该不断创新和发展,以发展创新的文化来引领时代新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持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精华进一步挖掘,指出执政党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使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胡锦涛同志抓住我国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提出了融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时代性创新理论成果,提炼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把这些精华转化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源泉。进入新时代,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既要立足本国的实际,又要面向变幻莫测的世界,需要不断借鉴、吸收、总结世界文明成果,形成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先进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前沿,以新的历史起点,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充满激情的政治勇气,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在这些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智慧,是在关键时期应对国内国外重大挑战的重要思想。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和创新,这具体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国家发展战略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的构想,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浓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邓小平善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应用,他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首先使用了“小康”这个生动的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小康状态。“小康”这个词,实际上最早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原意是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国民生活比较宽裕的一种状态,它是比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要低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对小康社会的现代解释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还好过。邓小平还具体规划了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后来胡锦涛同志又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又借鉴了传统社会追求的小康社会理想,把它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文化源泉。

思想路线方面。“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在宋代的儒家典籍中多有出现,但并没有流传开来,后来毛泽东吸收了岳麓书院“实事

求是”匾额里关于“重实”“求真”的“实事求是”思想，并古为今用地重新赋予其新意，成为党求真务实的座右铭，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是驱除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的“利器”。后来邓小平结合时代要求，在“实事求是”前面又增加了“解放思想”这个重要前提。随后江泽民同志依据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借鉴《周易》中“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的理念，把“与时俱进”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执政理念方面。马克思在其理论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和形成了“人民主体”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个由“人本”到“民本”的过渡。儒家提倡“民贵君轻”，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共产党一直把马克思倡导的人民立场作为奋斗的初心和使命。这一执政理念是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政治伦理智慧民本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征不断创新的结果。毛泽东对马克思倡导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的精髓进行融会和贯通，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江泽民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又适时把党的执政理念发展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继续发扬和借鉴传统文化中朴素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适时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社会建设方面。习近平借鉴《尚书》中“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厚生利用”的利民理念，把民生问题提升到更加突出的高度和位置，进一步提出了“人人共享”的发展理念，这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落实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惠民政策，把关心民生上升为国家的大政方针。

对外关系方面。习近平遵循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主张，结合我国遵从“和合”文化的历史背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化解、处理和防范当前复杂国际社会的矛盾、冲突。这是使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落实为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集合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智慧结晶，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应对当今国际事态的最佳选择。

总之，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昭示我们，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双重任务下，一定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断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不断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和繁荣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治国理政提供智慧。

A Probe into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100-year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Yao Hong Deng Hongbin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modern China, with thousands of years of civilization, accepted Foreign Marxism is because of the choice of Chinese culture dilemma, the crisi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double challenge of suffering China and patriotic men of insight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life, language and thinking of all levels, and has been accumulated in the people's ideas, behavior patterns, as a cultural gene. From the cultural source,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inking mode, value standpoint and practice mode. The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ought and the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ethod together with the Naive dialectics thought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achieved the echo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and become the cultural gen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cultural value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is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ose to accept Marxism in modern times and used its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to guide and chang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o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be reborn, transformed and developed from its original to modern form and mode, and be merged into modern factors,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be re-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s modernization trend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ism; Sinicization; Cultural Implications

论习近平文化观的理论要义和重要创新^{*}

张红岭^{**}

【摘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文化观蕴含的理论要义和重要创新，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文化观的内在旨趣和思想努力，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旗帜鲜明地倡导文化综合创新，以文化综合创新引领中国文化发展；二是在文化建设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突出人民史观对于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统领作用；三是坚持中国立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推进重建中国文化道统。这三个方面在理论上层层递进深入，系统解答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时代使命等问题，为深入推进中国文化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观；综合创新；文化道统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可以发现三个层面的理论要义和重要创新：阐发文化综合创新的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倡导以文化综合创新引领中国文化发展；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突出人民史观对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统领作用；坚持中国立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重建。这三个层面的理论要义和重要创新，归结起来构成习近平文化观的理论精髓和精神实质，即以人民史观为核心，推动文化综合创新，进一步推进重建中国文化道统。

一、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新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研究”（19JD710060）阶段性成果。

^{**} 张红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部、浙江省文化发展创新与文化浙江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化发展理论。

从文化论争的基本立场出发,可以分为三种主张。一是,文化激进派,主张彻底反传统,在文化上主张彻底变革。二是,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固守传统文化,尊重历史文化传统。三是,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吸收和综合,主张文化综合创新。面对西方冲击和世界现代化潮流,一味固守中国传统、排斥进步和现代化潮流,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纯粹彻底批判和反对传统,要求彻底变革,对于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华民族而言,也是无法实现的。诚如陈寅恪所言,吾国新思想流派,“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者相反而适相成”^①。因而,近代以来的文化论争背后,其主流无疑就是文化综合创新,^②而对于文化综合创新的立场、方式、路径,各派观点存在诸多差异和分歧。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以唯物史观统领文化综合创新。在诸多文化论争中,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脱颖而出,而且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逐渐掌握了中国文化的主导权和领导权。经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指导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譬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都蕴含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文化综合创新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接续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综合创新观,而且站在新时代高度廓清了新时代文化综合创新的构成要素、实践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路径,推动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新发展。

(一) 文化综合创新的构成要素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③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来源和实践根基,同时“来源”“熔铸”蕴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渊源的分析,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就是立足中国文化发展实践,对中华优秀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② 张岱年、程宜山在总结近代以来文化论争时指出:“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也无论是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都走不通,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参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在笔者看来,这是对近代以来文化论争的准确总结。面临现代化潮流,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是无法彻底实现的。主张“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像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其目的是通过全盘西化,使中国“充分世界化”,因中国文化有惰性,最后求得一种“文化折中”。“文化折中”,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综合。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综合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成要素，其实也是文化综合创新的构成要素。在推动文化发展中，我们应当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资源，而不是片面地突出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实践中进行全面发展和综合创新，而不是只要一点或两点，而忽视其他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既明确主张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明确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弘扬与传承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并多次要求领导干部把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因而，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来源和构成要素的分析可以认识到，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进一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对三者加以融会贯通和综合创新。就此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来源和实践根基的分析，内在地包含文化综合创新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

（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辟未来”的文化综合创新观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①，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包含文化综合创新思想旨趣。“立足本来”就是要立足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根基，这个“本来”就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既包括五千年文化历史传承，又包含近代以来的文化传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精神传承。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立足点。“吸收外来”就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这既包含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又包含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精华；既包含古代文明成果，又包含现代文明成果。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性、包容性，大力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对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古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被中国智慧吸收，转化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开辟未来”就是立足中国，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基础上，对已有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进行文化综合创新，开辟中国文化发展新境界。

（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综合创新发展原则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文化发展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讲话时提到，主要是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例如，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2页。

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①这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专门针对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作为回答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一时代问题的根本方针,超越了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为我们提供了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遵循”^②。但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不仅是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而且是对待西方文明成果乃至人类文明成果的科学态度,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文化发展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般原则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论意义。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必须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原则为根本遵循。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将其与中国当前的时代发展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同时,学习和借鉴任何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也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其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应当秉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扎根并取得伟大的实践成效,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实质上也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原则。要开辟中国文化的未来,就需要对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基于中国实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三者融会贯通、综合创新。

(四) 文化各领域协同推进、融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梳理文化建设的战略作用,系统勾画文化强国战略的总体蓝图,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相继发表系列讲话,进行系统研究部署。譬如,专题召开宣传思想工作会、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座谈会、党校工作会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宗教工作会议等,全面部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同时,推动从文化体制、文化政策等微观层面深化文化改革,激发文化发展活力,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繁荣文化产业、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等方面形成一整套文化发展方略。针对思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宣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页。

^② 陈卫平:《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① 思想文化领域各方面要协同发力、形成合力。总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更加注重文化总体战略格局，更加注重文化建设各方面有机融合和整体推进，更加注重文化软实力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协同提升，增强文化创新发展整体活力。

可以说，在习近平总书记文化建设总体战略部署中，文化综合创新的基本理念贯穿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突出激发全民文化创造活力，增强文化综合创新整体能力，全面推动文旅融合、文教融合、文体融合、文娱融合、内宣外宣融合等，为文化繁荣发展创造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文化强国战略部署贯彻了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融合发展、综合创新的基本精神，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贯彻到文化发展战略和具体文化政策体系构建和实践之中，使文化综合创新观成为引领中国文化发展的思想指南。

概言之，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观其实就是综合创新的文化观，这一文化观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以往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观的批判和超越；既指明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又为推动文化综合创新开辟了新境界。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综合创新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主导文化的综合创新。具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民史观作为推动文化综合创新的主导思想，系统阐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

（一）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把把满足人民文化需要和激发全民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多次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②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和充实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素质，推动人民群众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观。这一文化发展观是唯物史观在文化建设领域的贯彻和落实，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导向和历史观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文化发展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激发全民文化创造活力作为重要内容，也就是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放在首位，把激发全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5页。

民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些思想也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上秉持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观点,体现了其文化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是贯穿人民史观的文化观。

(二) 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①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的人民性属性的观点,其文艺观贯穿人民史观。正如他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②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突出了文艺的根基在于人民,反映人民的所思所想、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只有真正坚持在文艺创作中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③,文艺才能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在谈到当下文艺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产生大量的文艺乱象和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文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脱离人民群众,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要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就需要坚持和重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为此,他指出:“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④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观是贯穿人民史观的文艺观,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文艺”立场的继承和发展。

(三) 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为人民做学问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人民史观出发分析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目标和路径。他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⑤ 这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根本宗旨、基本原则的认识。实质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归根到底是揭示真理,为人民服务,说到底是为人民做学问。新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当立足中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这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的重要前提，也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部署贯穿了人民立场，体现了人民史观对于新时期思想建设、学术发展的指导意义和统领意义。

（四）在宣传思想工作中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建设的论述突出宣传思想、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性、战略性，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强调“坚持党性原则，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①，宣传思想工作要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舆论环境，维护党和国家和谐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②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针对宣传思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坚持人民立场，把坚持党的立场与更全面反映人民意愿统一起来。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巩固和创新意识形态领导权，最为关键的还是做人的工作，要围绕“人”来做工作。现在人民群众都上了网，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也应当搬到网络上，要特别重视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设，不仅要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问题，还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上的困惑和疙瘩。总之，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史观出发分析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并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系统论述和战略部署，彰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贯穿了人民史观对文化思想工作的指导，阐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

（五）以世界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推广到全世界，就是“以世界人民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发展观。“以世界人民为中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也体现了中国“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思想。站在“以世界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就需要反思：我们怎么了？现在处在何处？未来要走向哪里？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世界经济整体向前发展，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科技日新月异,不断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贫富差距、数字鸿沟、局部战争、社会撕裂等问题层出不穷,安全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生态赤字等问题突出,“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临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 and 选择,习近平主席从人类是一个整体出发,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承认人类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需要树立责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理念,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解决世界难题,携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世界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其中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蕴含着“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世界文明发展观。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世界各种文明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已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强大思想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体、动力、目的、宗旨、方向及路径。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观实质上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文化综合创新论实质上就是以人民史观为统领的文化综合创新观。

三、站在道义制高点上重建中国文化道统^②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人民史观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突出了人民史观在未来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阐发了人民史观在未来中国文化道统重建中的统领作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和升华,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论争的系统解答,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史观出发,更加深刻地分析了重建中国文化道统的基本方向和现实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观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提法,那就是“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他用能体现中国智慧的“道义”概念来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根基,彰显了其思想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论述的内在旨趣和思想努力,就是站在道义制高点上重建中国文化道统。重建中国文化道统,就是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② 文化道统是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导原则、核心思想,也是文化建设的“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把握中国文化的“道”、当代中国人的“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这里的“道”就是文化建设最核心的部分,有时习近平总书记以“道”指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其深层次的意涵还指称“人民史观”。重建文化道统,就是要重建中国文化的主导原则。这里的“道统”已不是古代唯我独尊、具有排斥性的“道统”,而是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具有主导性同时又能包容其他思想的开放性的新道统,张岱年先生将其称为“文化新统”。参见张岱年:《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4页。

在新时代继续深入解答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①，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立足中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继续深化重建中国新文化的时代课题。

（一）以中国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道义制高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体现鲜明的中国立场。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立足点，那就是秉持中国立场，体现中国价值，展现中国精神。文化自信，其实也就是要保持自己文化上、精神上、思想上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在本质上也就是以中国为立足点，以中国为中心，而不是机械照搬其他国家的思想观念和基本经验，也不是盲目扩张、妄自尊大或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站在自己的历史根基上，立足自身进行新的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② 这里，“站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就是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其实就是要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十三亿多中国人”，其实就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体；“走自己的路”，其实就是独立自主开创自己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时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标准，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③ 也就是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思想理论建设，一定要从中国出发；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是中国思想创新的真正根基，也是中国文化道统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只有牢牢坚守中国立场，中国文化发展才会有定力，中国文化道统的重建才是可能的和可期待的。

（二）站在道义制高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道义制高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人民史观，就是突出人民的最高地位的历史观和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④，就是一种人的自由解放、人类自由

^① “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并不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就能完全解决的了，不同时期我们都会面临文化发展方向、具体路径、实现形式的选择，因而“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文化往何处去”作为时代课题贯穿重建文化新道统的过程始终。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解放最高的理想。用这个价值的制高点、理想的制高点来统领中国文化道统的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道义制高点”的理论根基来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国文化建设必须顺应“道义”,要基于最高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只有“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引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①唯有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出发,朝着人民全面自由发展的最高理想迈进,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找到真正的理论制高点和正义制高点。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人民谋幸福、世界人民谋大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立党的宣示,也是“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来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世界文明发展。由此观之,习近平总书记使用“道义”一词,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来领会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来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并以此思想为精髓要义,来实现新时代的文化综合创新,重建中国文化道统。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道义制高点”还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道义”一词是中国传统文化词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道义”包含的思想的时候经常引述中国传统经典话语,譬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道莅天下”等。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道义制高点”的思想,在理论上也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并不是对中华文化中关于“道”的思想简单搬用或借用,而是立足于人民史观加以重新阐释,从而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的观念。在传统社会,“道”与“天”结合,就是“天道”,而“天道”就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工具,皇帝和圣贤是天道的唯一拥有者和阐释者,这就是古代的“天道”观变成了为统治阶级维护的理论支撑。而习近平总书记的“道义”概念,就是要肯定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是从人民史观出发加以阐发,这里的“道义”绝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为统治阶级辩护的“道”或“天道”,而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大道”,而是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阐发的“道义制高点”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所阐发的“道义制高点”还包含对西方近代文明成果的继承和超越。“道义”一词,在本质上超出了西方近代学术话语体系,包含对西方近代以来有关公平正义思想的继承和超越。西方近代以来的正义理论肯定了人的价值观,突破了传统神学将人贬低为神的奴仆的思想,高扬人的主体性哲学,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自主价值,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但是存在对人的自由、公平、正义的形式主义的倾向。它们在理论上肯定人的自由平等,在实践中却无情地剥夺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和削弱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使人变成了异化的人，变成资本主义时代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公平正义的理论均有其不彻底性和局限性。马克思在发动思想革命之时，就批判了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和公平正义思想，从而形成了科学的人的自由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制高点”思想，无疑包含着对近代西方文明公正原则的继承和批判超越。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的“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展现了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最高价值理想和价值坐标。“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就是要立足中国，坚持人民史观，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在新的道义制高点、价值制高点、理想制高点上推动中国文化道统的重建。

（三）重建中国文化道统何以可能

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既体现了文化建设的最高追求，又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论述所包含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立足人民史观，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是否可以重建中国文化道统提供可能性呢？要追问这种可能性，就需要回答立足人民史观、“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作为一个统领原则是否能“立得起来”？是否能发挥“统领作用”？是否能被世人所接受？是否能“传得下去”？

第一，立足人民史观的“道义制高点”能否“立得起来”？毫无疑问，立足人民史观，把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发展的主体和目的，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坚持人民是最高价值。这些理论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具有最高的思想境界。因此，从人民出发谋划中国未来文化发展道路和世界文明发展道路，无疑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道义制高点”能够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能够成为重建中国文化道统的核心。

第二，立足人民史观的“道义制高点”能否发挥“统领作用”？“道义制高点”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又是对西方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在未来重建文化道统的过程中，立足人民史观的“道义制高点”的理论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明的有机融合与贯通，能够起到推动文化综合创新，统领多种文明融合发展的作用。

第三，立足人民史观的“道义制高点”能否被世人所接受？习近平总书记的“道义制高点”包含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景和期待，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群众基础。习近平提出的“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世界文明发展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广泛认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也写入联合国的相关文件，得到了世人的接受和认可，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重要思想。

第四,立足人民史观的“道义制高点”能否“传得下去”?既然立足人民史观的“道义制高点”的思想能够继承和超越原来的文明成果,而且能够被世人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可,那么它必定会成为一个继续传承下去的思想原则。随着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优势的凸显,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日益增强,体现中国主张和中国智慧的“道义制高点”思想必然会被更多人理解和接受,并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因此,立足人民史观的“道义制高点”思想,是可以传得开、立得住并能得到世人接受的思想原则,必定能统领中国文化道统的重建,引领世界文明多元融合发展,为中国文化发展和世界文明交流交融贡献中国智慧。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论述在理论层面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了文化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将文化综合创新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在学理深处,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以人民史观为中心的“道义制高点上”,彰显了人民史观在中国未来文化发展中的核心统领作用,集中阐述了中国未来文化发展一定要坚守中国立场,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明进行有机融合与贯通的基本思想。简言之,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史观统领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将中国共产党重建中国文化道统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新境界。

On the Theoretical Essentials and Important Innovations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View

Zhang Hongling

Abstract: Deep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theoretical essentials and important innovations contained in Xi Jinping's cultural view,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The inherent purport and ideological efforts of the Cultural View embodied in Xi Jinping's socialist cultural discourse are 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advocate comprehensive cultural innovation with a clear banner,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it. Second, carry out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stress the central leading role of the People's historical view in the cultural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Third, uphold the Chinese position and work to rebuild China's cultural new-tradition on the moral high ground. These three aspects have gone deeper and deeper in theory, and have solved such problems as the basic path, guiding ideolo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provide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Cultural View of Xi Jinping;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Cultural New-tradition

毛泽东教育思想内涵新探

石 然 王菲菲*

【摘要】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经历了早期教育思想、新民主主义时期教育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育思想三个阶段。他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表现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军队教育全面推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展开,教育主体论与客体论全面并举,教育目的论、方法论、变革论全面协同四个特质。毛泽东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断进步,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思想;理论特质;重要价值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而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囊括了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军队教育各层次,涵盖了德智体美劳各领域,涉及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变革各方面,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教育实践与思想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学习毛泽东教育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在新时代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

毛泽东教育思想源自早期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之后在革命和建设形成、成熟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坚持和发展,是对新民

* 石然,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王菲菲,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为特色的教育思想。

第一阶段: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1919年以前)。

毛泽东早期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与时俱进,积极探索中国教育的规律。毛泽东早期十分重视教育救国的作用,主张把教育实践和改造现实社会紧密相连,希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教育虽不能直接救国、促进社会发展,但救国与促进社会发展却离不开教育。毛泽东最初主办的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其目的之一便是培养工人的爱国心。同时,毛泽东早期教育观又一重要内容是对旧教育的批判,积极倡导先从教育入手来改造中国。他对当时的旧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积极促进中国教育的革新发展,毛泽东批判旧教育有以下弊端:一是教育与社会脱离,不能为社会培养人才,他指出:“学校之人与社会之人,自来不通情愫,不相告语,虽有良校,彼何由知乎?”^①他认为旧教育不能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既不利于社会也不利于学生。二是旧教育设置的课程繁重,束缚学生的自由思维,摧残学生身心。毛泽东指出:“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顾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诳之、厚赏以诱之。”^②毛泽东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要求,对旧教育割裂“德智体”进行批判,主张变革创新,提出“三育并重”的观点。毛泽东针对当时国人体质衰弱的情况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强调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③特别是青年毛泽东还提出平民教育主义、自主学习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并且早期的这些教育思想也成为他之后教育思想不断发展、深化的基础。

第二阶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教育思想(1919~1949年)。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在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其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多方面发展和积极的教育实践。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拓并领导了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教育,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苏区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倡导工农大众的教育普及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教育权利平等,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针对当时旧课程和旧教材为反动独裁统治服务充满封建旧礼教教育、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内容,提出了废除旧课程旧教材,建立为革命战争、土地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服务的新课程新教材,实行文化教育改革;为改变填鸭式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推行新的教育方法,他倡导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强调教育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主张建设教师队伍。另外,为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始终重视军事教育和发展干部教育,他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①他积极创办红军学校,通过开展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文化学习,培养了一大批英勇善战的军事干部。而延安时期被公认为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富有成果和创造性的一个时期,他阐明了文化教育同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指明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肯定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他讲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②并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与实际相结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思想,他说:“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③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他根据过去的教育思想以及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适应抗日救亡的教育思想,如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④坚持改革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广泛发展民众教育,使文化教育事业适应战争的需要;为转变学生思想和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提出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强调对青年的教育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面对干部缺乏和干部文化素质低下的情况,他提出“干部教育是第一”的方针,建立干部教育体制,规定干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通过在职干部教育和高等教育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这些思想不仅对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育思想(1949年以后)。

毛泽东教育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深化和发展。新中国成立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后,毛泽东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点。此外,为了使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他又一次讲道:“学校课程,应参照普通小学、中学的课程予以精简、重编,保持其科学的系统,减去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必要课程的内容。”^①“改进课程和教材,必须坚决贯彻‘少而精’。”^②他不仅主张对课程、教材进行改革,而且对学制、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工作也做了进一步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目标以及实现途径,成为党和国家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还强调要加强培养创新精神。教育事业是一项长期事业,必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他认为:“在教育方面,我们对高等教育、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也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因为我们不是短期内能够完全实现普及教育的,所以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进行职业教育。在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还需要继续提高和发展。”^③这些教育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为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推进提供了根本行动指南。

二、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干部教育、大众教育、军队教育全面推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展开;教育主体论与客体论全面并举;教育目的论、方法论、变革论全面协同。

(一) 干部教育、大众教育、军队教育全面推进

毛泽东教育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他根据中国的民主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将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军队教育全面推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许多教育主张。毛泽东格外注重干部教育,他强调:“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④首先,在干部教育的实践教育层面,他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基本原则运用于干部教育,并将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鲜明地贯穿于他全部的教育实践活动。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他讲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页。

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① 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他指示要求：“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② 毛泽东不仅要求干部要当一个实际的理论家，能够切切实实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希望能够从工人中培养出大批干部，他说：“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③ 他始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干部教育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其次，在干部教育的党性教育层面，鉴于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党内出现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党内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④ 同时，他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⑤ 党性是政党阶级属性的集中表现，必须加以重视，毛泽东提出要教育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要使干部党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讲道：“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⑥ 最后，在干部教育的文化教育层面，毛泽东认为：“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⑦ 因此他要求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他提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⑧ 另外，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干部要多学习：“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⑨ 干部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各方面知识才能更好地领导各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页。

⑥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⑦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项工作。在党的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的这些干部教育思想不仅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的各级干部，而且依靠这些干部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了一次次的革命胜利，也为今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准备了充分的干部条件。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他一贯重视对大众的教育，在早期他就讲道：“国人虽天赋、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并指出：“女子同男子应有同等的受教育权。”^①对于农民，他早已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人口中80%的农民深受剥削和压迫之苦，并且中国革命大多是农民革命，但农民却往往没有机会受教育，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的文化，农民没有文化。”^②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他都十分重视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及政治觉悟，因为只有对广大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唤醒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意识，并使他们掌握革命建设的理论才能充分发挥其巨大力量。对于工人，毛泽东认为他们应把接受教育作为自我解放的事业，建立工人文化教育体系，并通过教育和劳动相联系，使知识和生产相统一，这样才能提高其工作水平和政治水平，进而减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向来尊重他们，中央苏区时期他说：“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③在教育知识分子时，他指出：“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④还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⑤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只读书，还要积极参与实践劳动，将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相结合以解决现实问题。对于青少年，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⑥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应担起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责任，做好中国事业的新一代接班人。

在重视干部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同时，毛泽东也强调军队教育，他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⑦他强调军队要学习政治纪律、科学文化和军事战略，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真正提高全军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素质。在政治纪律教育方面，必须把对军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1页。

④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1页。

⑤ 《毛泽东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⑥ 《毛泽东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页。

放在首位,只有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使军队坚定服务于人民。在三湾改编中他就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后还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全军开展民主教育等。同时,他也不放弃对旧军队的教育,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讲道:“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①各种充满革命政治内容的教育,大大提高了军队思想政治水平,抑制了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了纪律性不强的问题。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毛泽东曾在《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提出:“在连队的教育时间内,暂规定以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以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百分之十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②毛泽东深知一个军队只有强大的力量而没有多少文化头脑是打不赢一场又一场战役的。针对工农红军文化水平低问题,他积极开展识字运动、设立青年士兵学校等,促使军队成为不仅能打胜仗还能做好宣传组织群众工作的队伍。在军事战略教育方面,毛泽东从红军创建时期起就强调对部队官兵的军事技术战略训练。1940年,他明确指出:“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③通过一次次分析战役帮助军队官兵从战争中领会和掌握作战的不同策略。

(二) 德智体美劳全面展开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方针和高等教育目的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新人的本质特征。毛泽东倡导要培养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仅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得到全方位的进步和发展。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④

事实上,毛泽东在德智体美劳教育五大领域都有重要论述。在德育方面,毛泽东在《抗大工作的检查报告》中曾强调:“道德教育问题。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与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⑤社会主义改造后他又指出:“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⑥在智育方面,毛泽东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文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4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⑥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知识的力量,国家的强盛更离不开文化科学知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②等思想。在体育方面,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一重大命题。不仅如此,他还论述了体育与德育、智育是紧密联系的。早期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就讲道:“体者,为知识之载而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③“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④可见德育与智育离不开强健的体质。在美育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美育工作要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审美素养,提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⑤,“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⑥在劳动教育方面,他指出:“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⑦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教育思想。

(三) 教育主体论与客体论全面并举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及教育事业过程中对教育主体和客体进行了思考与实践,做出了诸多开创性论述。

毛泽东针对教育主体,一是对学校提出要求。首先,学校不可与社会脱离,他认为:“可通过夜学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离,使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6页。

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① 其次，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制定方针政策，大力培训教员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教育工作想要做得好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最后，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新一代青年；同时，还提出学校除了教授理论知识还应培养学生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精神，他指出：“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② “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③ “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④ 二是对教师提出要求。发展教育，教师是关键。毛泽东认为：“教员应当在工作中学习，应当向学生学习，向老百姓学习。”^⑤ 另外，还要求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掌握教育理论还应懂得教法。

在教育客体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以下几个要求。一是要学以致用，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在他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教育实践中便要求学员一面学习，一面要从事生产劳动。二是自主学习，自由研究。他称赞青年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主张他们要大胆主动地学，要学会学习。他认为：“第一，当学生。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⑥ 三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革命的新后代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为人民服务。

（四）教育目的论、方法论、变革论全面协同

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开始重视教育工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并且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发表了大量的教育观点和教育主张。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工具，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教育目的。早期毛泽东把教育作为促进社会进化的工具，他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论述道：“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⑦ 之后为了革命取得成功，毛泽东发动工人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247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⑥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⑦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运动、农民运动、干部教育、创办军事学校，教育农民、工人、干部、官兵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与政治水平，在阶级教育问题上他认为：“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① 为了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毛泽东又对资本家进行教育，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②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提出要培养德智体几方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加强教育与经济的联系，还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正确运用各种教育方法对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育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曾讲道：“教育为事，重在互相比较参观，交换其知识，而讨论其方法。”^③ 他的教育方法可大致梳理为劳动教育、理论教育、学校教育、群众教育四个方面。劳动教育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将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联系，促进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他认为：“最容易的是只教学，最难的是教用。要教会人分析问题，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④ 而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利用劳动教育增强知识运用能力。理论教育除了文化知识理论更多的是思想政治内容教育，毛泽东一直强调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⑤ 我们要通过认真学习他们的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尤其是干部，他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⑥ 在学校教育方面，毛泽东也提出了许多教育方法，在主张一师的教育方针时他讲到要“民主和切合实际，方法要注重启发”。^⑦ 在自修大学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上要求“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之以教师的指导；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⑧ 同时，也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在群众教育上，他通过积极开展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等，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求知、办学的需求和愿望。另外，还通过报刊、墙报、戏剧等形式教育群众，使群众积

①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

⑦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⑧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极参与到政治和文化的革命中去,走群众路线,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办好教育。

为使教育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一直重视教育变革。一是对课程、教材、学制提出变革。他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①,“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②,“改进课程和教材,必须坚决贯彻‘少而精’”^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④;等等。二是对教学方法提出变革。在教学方法方面,毛泽东一直主张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教学,强调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创新能力。他还提出著名的“十大教授法”,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等,要求在实践教学中要方法灵活,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接班人。三是对考试方法进行变革。毛泽东对当时的考试方式进行了批判:“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⑤四是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对教育提出变革。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毛泽东又提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⑦不久,在成功改造旧教育体系、调整教育结构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基础差的特点,毛泽东又再次提出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办好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三种类型的学校。毛泽东的教育目的论、方法论、变革论极大地推动了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各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价值

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他的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层面的观点,并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新的创新与发展。新时代,毛泽东教育思想仍具有重要意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一）毛泽东教育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整套理论的创立者，在教育领域也提出了诸多重大而深刻的命题，揭示了教育的社会根源，批判了资本主义教育的局限性；他们深刻阐释了劳动群众接受教育的正当性和重要性，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重要原则；特别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成为以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教育事业一如既往坚持的根本原则。列宁始终把教育事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时期就高度重视党和群众的教育。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出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指引，在实践中确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劳动教育等领域都提出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有着更为充实而又具体的教育文献，亦有更为长期、更为全面的教育工作领导经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亲自从事教育工作，这所有的一切使他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宝库。从纵向上看，毛泽东教育思想不仅在大众教育方面坚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而且填充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军队教育等领域；从横向上看，毛泽东教育思想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还对德智体美劳各领域教育及其联系提出了宝贵的思想创见。不仅如此，他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教育主体论与客体论、教育目的论、方法论、变革论进行了思索，从多个维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正因如此，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毛泽东为人类教育思想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其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行动指南。而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这里所说的“文化”包含教育，这阐明了文化教育同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也指明了政治、经济对文化教育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离不开文化教育，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教育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政治、经济的能动作用。与此同时,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正是代表了先进文化教育发展的方向。另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化与教育的重要思考。其次,毛泽东教育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政策和策略的理论中,通过教育帮助军队官兵掌握政策和策略思想,使他们明白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在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中,教育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把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党的建设理论中,教育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教育党员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等,党的建设工作才能越做越好。最后,毛泽东教育思想处处彰显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教育思想倡导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教育进行改革,以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重视大众教育,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通过教育广大人民来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要根据群众需求锐意推进教育改革;主张在教育上也要坚持独立自主,对待中西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三) 毛泽东教育思想推动党和国家教育事业不断进步

毛泽东教育思想直接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全方位和根本性进步。新民主主义时期,在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了各种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开展整风运动等,提高了全党思想水平,也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广泛开展社会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扫盲班、识字运动、演讲会、义务小学教育、创办各种地方通俗报纸等,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民族觉悟。这一时期的各种教育实践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文化思想和人才保证,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教育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转变。党中央对教育的方针、体系、内容进行了重构,搭建了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架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根本性提高。

不仅如此,毛泽东教育思想是党和国家教育工作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有着长期而又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毛泽东教育思想始终是我们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

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无不彰显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比如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教育工作的生命线；把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让教育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无不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

The New Explortion of Connoation of Mao Zedong's Educational Thought

Shi Ran Wang Feifei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Mao Zedong's educational thought has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 including educational thought in early era,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re are rich connotations in his educational though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four traits: full promotion of cadre, mass and military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sports, aesthetics and labor education; the simultaneous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subject and object theory;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of educational teleology, methodology and reform theor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ought, Mao Zedong educational thought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educational theory of Marxism, which not only guide the educational causes of our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untry in constant progress, but also provide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socialism educational causes.

Keywords: Mao Zedong; Educational Thought; Traits of Theory; Important Value

“源头”红色文化的孕育及治理

王 振 高福进*

【摘要】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源头”特点鲜明，红色资源分布众多。由于历史原因，早期上海红色资源大多分布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内，租界不自觉地成为红色革命的发源地。规划租界内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做好“源头”红色文化的治理，要着力突出红色文化的政治特性，坚持红色旅游的正确方向；着力突出思想特性，搭建起党性教育的特色平台；着力突出文化特性，彰显红色资源的独特价值；着力突出利民特性，带动所在地区的社会发展，让红色文化闪烁新的时代光芒。

【关键词】红色文化；源头；租界；红色资源

租界是资本主义列强殖民中国的特殊产物。旧上海作为中国最早通商开埠的五个口岸之一，逐步沦为资本主义蚕食中国的前沿阵地。欧美列强在上海开辟的租界，主要包括英美租界组合成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亦因其“一市三治四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样态和多元政治格局，客观上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土壤和空间。租界这一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作为列强践踏中国主权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却在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救亡图存变革中，成为革命者最热闹的舞台和避难所，更是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上海红色文化肇始于租界，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发掘租界内的红色资源，加强“源头”红色文化的治理，让红色基因赓续传承、永恒发光，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战略的重要举措。

一、“源头”红色文化的孕育

上海因贸易通商而兴，中西思想、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等在上海碰撞、接触，进而交流、融合，客观成就了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火车头地位，红色从

* 王振，上海市宝山区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高福进，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史论、近现代上海文化专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等。

此成为上海文化最具内涵的城市底色，红色文化在这里孕育，红色基因在这里萌发，而租界则成为红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一）租界之形成为革命活动提供土壤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双方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①，根据这个章程，清政府首次划定南到洋泾浜北到李家场东至黄浦江的大片区域为英国人居住地。到1848年11月，英租界面积已经扩大到2820亩。1854年7月，租界当局修改《上海土地章程》，首设工部局，由此工部局成为租界最高市政机构，按照章程规定本应属于中国政府所有的居住地领土管辖权、行政权、司法权，在列强的巧取豪夺下，反而成为中国政府难以触及的范围，居住地逐渐演变为“国中之国”。按照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的说法，上海租界俨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②。之后，经美国公使蒲安臣策划推动，1863年6月美国驻上海的领事和上海道台划定了美租界的范围，同年9月英、美双方协商对租界进行合并，到1899年，“合并后的英美租界面积达到33503亩，正式定名为‘公共租界’”^③。1849年4月，法国驻上海领事用同样的方式，在上海获准设立了法租界。之后租界当局又通过各种手段越界筑路，进而对道路周边和沿线地区形成事实上的管辖，造成了不是租界的“租界”的既成事实。由此，上海出现了“一市三治四界”的独特政治格局，即一座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由于三方在价值观念、法律等方面存在分歧，“社会控制机制不健全，矛盾横生，漏洞百出”，表现为：如果在公共租界犯了法，躲到法租界也可平安无事，在华界犯了法，跑到租界内便可逍遥法外，这为帮会活动提供了温床，同样也为各种各样的地下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的活动空间。不仅如此，三方交界处往往“还会出现三不管地段”^④，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正好可以巧妙地利用这种政治上的“缝隙”开展活动。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再次修订《上海土地章程》，有关“华洋分处”的条款也被删去，从此“华人可以合法地在租界里面租地、建房、居住”^⑤。这一变化也使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租界内合法购置房产、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可能。从对革命活动的影响来看，公共租界巡捕房可以不经领事批准直接捕人，“而法租界却要经由巡捕房上报领事批准再下达巡捕房执行”^⑥，法租界程序上的烦琐在一定程度上

① 方志：《上海租界是怎样形成的》，《联合时报》2020年3月27日。

② 杨海平：《清末有限政治自由与中国早期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新闻界》2005年第5期。

③ 方志：《上海租界是怎样形成的》，《联合时报》2020年3月27日。

④ 张仲礼、熊月之、潘君祥等：《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⑤ 杨海平：《清末有限政治自由与中国早期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新闻界》2005年第5期。

⑥ 徐逸波、翁祖亮、熊月之主编：《上海卢湾城区史》，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版，第858页。

降低了从事革命活动被逮捕的风险,因此中共地下组织也更愿意选择在法租界从事革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一点”^①。尽管租界当局始终未曾放松对革命活动的监视,但相较于租界外严酷的政治环境,法租界仍不失为“能提供政治避难的区域”^②,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开展革命活动的一方“乐土”,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以及建党早期宣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住在法租界,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机器工会以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其所在地都是法租界,无一例外”^③。凡此种种,具有宽松、自由社会环境的法租界成为党的一大召开的合宜地点,直到1922年底,中共上海组织的活动几乎都在法租界运作。

在红色革命的孕育过程中,租界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④。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汲取经验、奋力走上独立自主之路的开端。租界这种相对自由的形态,“为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具有现代特色的活动空间”^⑤,这种政治空间上的缝隙和混杂的社会阶层,正是酝酿革命的必要因素。

首先,革命的舆论基础。上海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新思潮、新文化蓬勃兴起,孕育了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福州路文化街上,书店报馆林立,“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报刊,迅速地制造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⑥,这对新思想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马克思主义学说也经由上海辐射全国。租界在一定程度上为书籍报刊的发行提供了庇护,可以说上海革命报刊之所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关键在于租界的存在”^⑦。由于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租界客观上为革命者提供了更多方便,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此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复至上海,也选择在法租界设址,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在《新青年》《共产党》《星期评论》等报刊的引领下,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国。

其次,革命的阶级基础。尽管上海现代化进程的半殖民地化特征非常明显,但借助独特的多元政治格局及有利的区位优势,上海“获得了依附于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的发展”^⑧,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资本聚集,更意味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产

① 薛耕莘口述,王仰清、张鸿奎整理注释:《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上海政治(二)》,《史林》2001年第1期。

② 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③ 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

⑤ 杨卫民:《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1920—1937)》,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⑥ 苏智良:《近代上海何以成为中共“初心之地”》,《上观新闻》2020年1月19日。

⑦ 熊月之:《租界里的革命春秋——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观察》2011年第4期。

⑧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1~492页。

业工人集聚,这“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①,加之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性”^②,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帮助下,上海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③。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革命团体的勃兴,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1920年,全国工人阶级队伍人数壮大到194.6万人,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将近51.38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强”^④,是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⑤工人阶级一旦觉醒并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其力量将是空前强大的,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打击也将最为沉重。

最后,革命的思想基础。近代上海在文化上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因为包容,“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⑥,“就思想言之,将来之上海,必为世界新思想之集中地,即为全国新思想之发源地”^⑦,这是上海成为红色文化发源地的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宣传力度空前加大。《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刊出,更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自然而然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在上海长期驻守,这是“先进阶级和先进文化相结合的要求”^⑧。

红色基因在上海萌芽、发展和传播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正如1949年5月29日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所说:“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⑨从国家主权角度看,租界是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践踏,然而从革命的角度看,租界又成为反动统治铁板上的一道裂缝,成为统治的薄弱地带,自由思想和革命火种在这里点燃,一经传播,即影响到千千万万人。

(二) 红色文化“源头”特征鲜明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上海是近代中国红色革命的发源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基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启航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城、革命书籍报刊的中心出版

① 吴宁、孙鲁:《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形成、图谱和意义》,《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吴宁、孙鲁:《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形成、图谱和意义》,《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9年第2期。

③ 吴宁、孙鲁:《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形成、图谱和意义》,《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9年第2期。

④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⑥ 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⑦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3页。

⑧ 齐卫平:《党的诞生地、革命圣地、建党精神:上海历史内涵》,《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8期。

⑨ 《祝上海解放》,《解放日报》1949年5月31日。

地、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城市暴动的实验场”^①。这也造就了上海红色文化具有“源头”属性的独特性质，而其中很多红色文化资源分布在租界内。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采纳共产国际建议，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租界不自觉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共中央机关设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机关位于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党领导的最早的全国工人运动指挥机关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位于公共租界成都路19号C（后成都北路897弄），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位于公共租界成都北路7弄42-44号，等等。租界这一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作为列强践踏中国主权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却在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的变革中，成为革命者最热闹的舞台和避难所，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从中共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热血日报》《红旗日报》到白色恐怖时期面世的《前哨》再到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从马、恩原著译本到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国际歌》的翻译到《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都是在上海租界诞生的。”^②

发源于上海的红色文化如同燎原之火，从上海蔓延至嘉兴、井冈山、遵义、延安和西柏坡等不同地域，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凝聚了红色因子，传播了红色文化”^③。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中国红色革命的源头，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最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基因，借助“源头”红色文化特点和红色资源优势，“把上海打造成为彰显建党初心、弘扬建党精神的红色高地，使之与革命摇篮井冈山、伟大历史转折之城遵义、革命圣地延安、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西柏坡一起，共同组成中国红色文化的主脉”^④。

二、“源头”红色文化资源的治理现状

上海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数量众多的著名红色革命遗址和纪念地。综观租界内红色文化资源，建党主题突出，“源头”特色鲜明，时空跨度大，分布较集中，感染力强，分量厚重，保护级别也比较高。传承及治理“源头”红色文化资源，要以打造建党历史资源高地、建党精神研究高

① 苏智良、姚霏主编：《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② 吴宁、孙鲁：《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形成、图谱和意义》，《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9年第2期。

③ 高福进、孙冲亚：《上海何以堪称“全国红色之源”》，《解放日报》2019年12月24日。

④ 赵大朋：《上海红色资源的独特优势及其党性教育价值的实现》，《党政论坛》2020年第2期。

地、建党故事传播高地为抓手，增强品牌意识，抓好顶层设计，整合相关资源，加大保护力度，努力“使上海成为彰显建党初心、弘扬建党精神的党员‘朝圣地’和红色底蕴十分鲜明、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旅游目的地”^①。近年来，上海在用足用好本地红色文化资源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红色文化的保护和治理，发掘红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城市血脉。

第一，摸清“家底”。上海红色资源的存量较大，对红色资源进行系统追寻和记录是一项浩大工程。从2009年底开始，上海开展了大规模的革命遗址遗迹普查工作，全面系统梳理红色文化资源，确认“上海革命遗址遗迹总数为657处，其中革命遗址456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②，为上海红色文化研究和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之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集中力量进行学术研究和实地勘察，历经9年取得最新统计数据，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分布在上海、反映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革命遗址遗迹多达上千处，其中很多能够反映“源头”红色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重点遗址遗迹分布在租界内。

第二，顶层设计。2016年7月，上海全面启动为期5年的“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确保到2021年建党周年之际党的诞生地的发掘保护体系和宣传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彰显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出征、中国共产党历史从这里开始的文化宣传产品更加丰富、更加经典、更加深入人心，真正使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成为上海的红色名片，成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坚实根基。上海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打响红色文化品牌”，将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让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让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改革开放的动力和助推器”^③，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

第三，统筹规划。以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为契机，上海结合时下开展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简称“四史”学习教育），把租界内外的红色资源串联起来，对红色旅游资源进行了细致的统筹规划，目前已统筹规划“开天辟地”、龙华烈士陵园、“文化先驱”、“伟人风范”、“走向未来”五大红色旅游区。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寓思想道德教育于参观游览之中，通过旅游使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第四，有序推进重点项目。中共一大纪念馆筹建工程深入推进，建立了市委书记任组长的纪念馆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加大统筹领导、协调推进的力度，按建

①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课题调研组：《用足用好上海红色文化资源》，《联合时报》2020年3月10日。

② 苏智良、姚霏主编：《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③ 吴宁、孙鲁：《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形成、图谱和意义》，《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9年第2期。

党百年之际开馆的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抓好场馆场地的修缮和展陈设计工作，保证项目按期推进。同时，根据租界红色资源的保护现状，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思路，启动了对陈望道旧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团中央机关旧址、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共六大以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等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旧址进行保护性修缮，“还原历史风貌，提升教育功能”^①。

第五，强化资源利用。红色文化场馆学习参观人次再创新高，2018年中共一大会址接待访客达到146.6万人次，“较2017年增长约76%”^②。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许多党员走进红色资源现场，重温革命的峥嵘岁月，感悟共产党人的顽强拼搏。建党百年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式开馆后，首个周末即迎来参观热潮。全市各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围绕党的诞生地进行课程研发，开设专题教育课程和微视频党课。充分利用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会址等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党史现场教学，红色现场教学点教育培训功能建设已被纳入《2018—2022年上海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日趋活跃。

在红色文化资源不断发掘利用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原租界内红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还需进一步彰显，红色文化品牌塑造、文创产品开发和红色旅游宣传还需要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发掘、研究、传播能力等也都需进一步强化，用足用好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建党初心、建党精神红色高地，弘扬“源头”红色文化依然任重道远。

三、“源头”红色文化治理的四个着力点

对红色文化的治理，要突破对红色资源“围栏式”的保护方式，在“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价值取向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达到对红色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和转化”^③的效果，让红色历史深入人心，让红色文化闪耀光芒，让红色基因赓续传承。

（一）突出政治特性，坚持红色旅游的正确方向

红色旅游是挖掘红色文化社会效应的有效途径，“红色文化良好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是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④，要重点塑造红色旅游的影响力、吸引力、品牌力。

① 《用足用好上海红色文化资源》，《联合时报》2020年3月10日。

② 《用足用好上海红色文化资源》，《联合时报》2020年3月10日。

③ 俞吾金：《上海城市精神探讨之我见》，《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4期。

④ 吕南勋：《打造红色旅游精品 推动红色文化发展》，《福建党史月刊》2012年第21期。

塑造“源头”红色文化特色品牌。围绕上海“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品牌定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展开红色文化的研究工作,据此开发融文化旅游和红色教育于一体的旅游路线。同时,围绕著名人物及其生平、上海活动轨迹等创新性地开发文旅产品。深化“源头”红色文化品牌推广。红色文化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还拥有强大的德育价值,要重视品牌精神的升华,关注受众对品牌价值的精神感知,强化品牌认同,实现上海市民与游客对上海红色文旅品牌价值“从认知、认可、认同到共鸣的转变”^①。加大“源头”红色文化品牌宣传力度。上海红色文化品牌的提升离不开传统媒体的基础宣传,更需要新兴媒介的推广介绍。加强与融媒体协作,拍摄重点突出、主题鲜明的微电影、微视频、微党课,将上海红色文化以创新性的形式展示出来,让公众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地“走进”红色文化资源现场,聆听红色故事,牢记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②红色旅游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核心是进行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让党员群众实地接受红色洗礼。红色旅游工作守护的是精神高地,做的是教育人民、凝心聚力和引导社会的工作,政治性是其本质属性,政治价值是其主导价值。这就要求在开展红色旅游时必须把政治性放在首位,防止将红色故事肤浅化、娱乐化、庸俗化,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和流于形式的倾向。

(二) 着力突出思想特性,搭建党性教育的特色平台

党性教育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重要依托,是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载体,对于提升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修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生成路径上,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高度一致的,具有无产阶级内在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天然地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就决定了红色文化可以在党员领导干部党性教育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挖掘、用好用活租界红色资源,让红色文化能够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四史”教育精品课程菜单。党课是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讲好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故事、在

^① 段淳林:《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中国品牌精神文化价值提升战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② 《闯出新路子 展现新作为 彰显新担当》,《人民日报》2021年5月24日。

^③ 习近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

上海革命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需要借助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主题鲜明、逻辑清晰、结构合理的高质量课程体系。要把红色场馆或遗址遗迹串联起来,进行由点到面的模块化课程开发,突出红色教育的党性教育基因。创新教育方式,重视红色体验。红色体验是发挥红色资源党性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创造有利条件,组织党员干部走出传统教室,走进红色基地,走进现场与历史展开“红色对话”。提升场地的红色内涵,丰富展陈内容,充实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资料,创新展陈设计,再现红色经典,避免“一张桌子一条凳,两块床板一盏灯,游客进门就转身”的走马观花式参观,使党员干部升华思想和提高党性修养,彰显共产党人源自信仰的力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红色文化资源一定要与其他类型的旅游景点区别开来,重点突出红色背景,避免过度开发包装和娱乐化倾向,围绕红色资源的性质、定位、主题,打造聚焦红色展陈设计的主题。

红色历史是红色文化的具体内容,一部红色史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刻写着无数共产党人修养党性和一心为民的生动实践,包含着丰富的党性教育素材,学习红色历史的过程也是党员自我修炼的过程。在“教”的同时,也要注重党员干部的自我学习,通过教学相长,推动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带动红色精神赓续传承。

(三) 着力突出文化特性,彰显红色资源的独特价值

文化对政治具有负向的消解功能和正向的支持功能。就正向意义上的红色文化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是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有机统一体,其核心是红色精神”^①,内蕴着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无产阶级文化自信的红色精神底蕴,在教育、引导、塑造党员及群众的党性和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塑造社会成员的正确政治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正向的支持功能。

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而言,文化是灵魂,经济是形态,只有二者同时具备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的前提,正是有了红色文化传承的需要,红色旅游才日渐兴起,“没有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旅游就失去内涵和灵魂,没有了立足的文化根基”^②。文化提升了旅游的内涵和深度,“旅游则成为文化传承、创新与传播的载体,利用创意连接文化和旅游,能够扩大文旅的‘乘法效应’”^③。传承红色基因,挖掘红色资源内在价值,需要进一步凸显红色文化的文化属性,做大做强红色文化的正向支持功能,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论是源头红色文化还是其他衍生出的红色文化,都是如此。

① 马静:《论红色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实现机理》,《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② 王晋晓:《贵州红色文化资源与红色旅游发展研究》,《理论与当代》2019年第3期。

③ 范周:《以文化促旅游创新发展》,《经济日报》2018年4月25日。

一方面,要将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资源整合起来,拓展红色文化的内涵,延长红色旅游的周期,提升红色资源的竞争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名片,带动本地文化的扩散,使红色文化资源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史料征集和研究,由相关部门牵头,整合党史研究机构、高校及相关纪念馆等保存的革命史料,形成强大的红色文化研究合力,全方位盘活红色文化资源,激发出上海红色文化新的活力。同时,整合文博单位和科研院所资源,组建文物修复专业科研机构,对传统修复技艺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保护整理,整体规划本市文物修复及科研。此外,要充分借助融媒体的传播优势。融媒体既具有传统媒介的特点,也具有传统媒介缺乏的优点。融媒体传播拓宽了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解构和颠覆了传统媒介传播模式,使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更广泛、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符合大众“消费”信息的习惯。互联网强大的搜索功能和超链接功能增强了红色文化的二次传播能力,使红色文化信息能够被更便捷地检索、浏览和使用,真正实现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有效传播。因此,要注重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交互融合,构建红色文化新型网络传播格局,形成全面覆盖线上、线下的红色文化传播网,形成红色文化传播合力。^①

(四) 着力突出利民特性,带动所在地区的社会发展

红色文化的利民特性,并不是红色文化自身内生的价值属性,而是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种价值形态。由革命传统教育型的参观学习到更高层次的自我提升型的文化消费,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愈发凸显。

对于红色文化属地而言,弘扬红色文化也是一项持久的利民工程。上海红色文化以非固化的形态成为上海城市精神与观念的一部分,融入人们的生活,“润物细无声”地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红色文化内在价值的展现,可以辐射外延,满足当地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和追求,发挥其文化效益。通过政府引导和资金的投入等,带动属地资源的开发,为当地人民创收增收,发挥其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通过政策的扶持,对红色文物和稀缺资源加以保护,平衡当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发挥其生态效益。把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保护与当地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在开发原租界红色资源时,通过红色文创产品的开发和“源头”红色品牌的创立,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把红色文化的宣传与当地人民精神状况的提高衔接起来,以红色文化资源为当地人民“塑形”“铸魂”,只有在当地人民精神状况根本提高和改善的前提下,才能提高当地资源的影响力、知名度和传播力,达到扩大红色文化社会效应的目的。红色文化资源属地人民也有责任有义务将迎难而上、不畏艰险的拼搏精神,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进取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创造精神,敢闯新路、勇于胜利的乐观精神内化于心,外

^① 吴宁、孙鲁:《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形成、图谱和意义》,《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9年第2期。

化于行，并将它们世代传承下去，造福子孙后代。

红色文化资源的物化载体是红色纪念场馆和红色遗址遗迹，只有治理好这些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作为精神形态的红色基因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特点决定了我国红色文化资源大都分布在边远贫困地区，而保存下来的展现城市斗争历史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建筑类居多，大都年代久远，自然寿命接近或超过自身的使用年限。有的革命文物包括建筑文物系个人所有，增加了红色资源保护和治理的难度。此外，基于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承的需要，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资源得到了较好维护，而背后历史鲜为人知的红色文化遗址，由于关注度不够，治理上存在一些不足。近年来，随着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和发掘以及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力度的加大，一些较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相比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城市红色文化资源在分布上更为集中，红色景点更容易串联利用，对红色旅游受众而言，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优势，应该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

The Breeding and Governance of the Origin Red Culture

Wang Zhen Gao Fujin

Abstract: Shanghai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d gen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is profound, the “red origin”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d resources are abundantly distributed.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most of the red resources in early Shanghai were distributed in public and French concessions, which unconsciously became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d revolution. To pla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d resources in the concession, do a good job i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source” red gene, we need to focus on highlighting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d culture, adhere to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red tourism; highlighting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 a characteristic platform for party education; highlighting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unique value of red resources;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nefiting the people, driv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let the red culture shine in a new era.

Keywords: Red Culture; Source; Concession; Red Resources

从家书看邓恩铭的家国情怀^{*}

胡安徽^{**}

【摘要】 邓恩铭家书目前能见到的有 14 封。“家书少、国信多”成为一段时间的显著特征。没有家书或是家书少的年代，正是邓恩铭把时间和精力献给党的事业的年代。家书是邓恩铭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他的思乡之情与体贴父母之情、对时局的不满之情与对家境的担忧之情、救国救民之情与牵挂父母之情、孝道之情与革命之情。

【关键词】 邓恩铭；家国情怀；家书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革命烈士，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参加中共一大时，他既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又是唯一的中学生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较为年轻和较早牺牲的中共一大代表。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2021 年是邓恩铭诞辰 120 周年，因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研究邓恩铭烈士的事迹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邓恩铭少年时代（1917 年 8 月）便告别故乡贵州荔波，千里迢迢到山东济南求学，并在山东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工作，直至 1931 年 4 月英勇牺牲，他在山东生活了 14 年。在通讯不便利和不发达的年代，家书成为亲人之间交流感情、传达信息的特殊方式，既是表达写信人真实情感的重要媒介，也是彰显写信人思想和人格的主要载体。古语说“家书抵万金”，彰显了家书在家庭中非同寻常的地位。在山东期间，邓恩铭从未再回贵州，主要是通过书信与家人联系，书信字里行间闪耀着他浓厚而崇高的家国情怀。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凝聚力建设的百年历程及经验研究”（21BDJ034）阶段性成果。

^{**} 胡安徽，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历史医学地理、思想政治教育。

一、邓恩铭家书的基本概况及研究状况

目前学界有关邓恩铭的专著主要有《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①《邓恩铭的故事》^②《邓恩铭烈士专集》^③《邓恩铭遗作选》^④《邓恩铭》^⑤《邓恩铭文集》^⑥等6部,另有一些零散收录邓恩铭家书的著作,如《革命烈士遗书选》^⑦《革命先烈家书选》^⑧等。在上述著作中,收录邓恩铭家书最多的是《邓恩铭遗作选》《邓恩铭文集》,均有13封。学界认为邓恩铭家书有6封的,如《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认为有11封的,如《邓恩铭烈士专集》;认为有13封的,如《13封家书见证风雨人生》^⑨《邓恩铭遗作选》《邓恩铭文集》。由此看来,认为邓恩铭留存有13封家书的观点是学界主流。另外,从相关资料看,邓恩铭1931年4月5日在牺牲前夜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信。^⑩尽管我们目前只能见到附在信后的诀别诗,信的内容未能全观,但这仍表明邓恩铭确实留下了一封家书。由此而言,目前能见到的邓恩铭家书应该是14封。

就学界研究情况看,资料辑录、人物生平是最主要内容,有关邓恩铭家书的家国情怀研究仅有钟丽娟《邓恩铭家书的革命情怀》一文,该文从宏观上对家书略作分析,认为邓恩铭的家书从热爱家人、反抗旧俗和视死如归三个方面反映了他的优秀品质。^⑪《13封家书见证风雨人生》则是以记者采访报道的形式述及了邓恩铭家书,彰显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凛凛大义与涓涓柔情。^⑫任长幸《邓恩铭家国情怀与中学思想政治课融入性研究》探讨了把邓恩铭深厚的品德修为、崇高的家国情怀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有机融入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⑬尽管该文论及了邓恩铭的家国情怀,但遗憾的是,该文基本没有使用邓恩铭家书。事实上,邓恩铭家书蕴含的家国情怀在微观上还有很多值得分析和总结的亮点,故而仍有较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① 李肇年:《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山东大学历史系,1979年。

② 周隆渊:《邓恩铭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邓恩铭烈士专集》,都匀印刷厂,1983年。

④ 柏文熙、黄长和:《邓恩铭遗作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⑤ 闫勋才:《邓恩铭》,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

⑥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⑦ 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烈士遗书选》,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⑧ 高占祥:《革命先烈家书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⑨ 张可、黄震、王霍:《13封家书见证风雨人生》,《贵阳日报》2011年6月15日。

⑩ 参见邓恩铭:《诀别——给母亲的信》,《当代江西》2018年第10期。

⑪ 参见钟丽娟:《邓恩铭家书的革命情怀》,《学习时报》2020年6月12日。

⑫ 参见张可、黄震、王霍:《13封家书见证风雨人生》,《贵阳日报》2011年6月15日。

⑬ 参见任长幸:《邓恩铭家国情怀与中学思想政治课融入性研究》,《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二、家书的时间和数量反映的家国情怀

在所见的 14 封家书中，就时间和数量而言，最早的是 1917 年 10 月 14 日给父母的信，最后一封是 1931 年 4 月 5 日牺牲前给母亲的诀别信。从 1917 年首封家书开始，除 1919 年、1921 年、1926 年、1928 年、1929 年未见有明确的家书之外，其他年份都有数量不等的家书，其中 1920 年和 1922 年、1925 年、1931 年分别有两封，1923 年和 1924 年、1927 年、1930 年各一封。尽管家书时间上有间隔，但总体上持续不断，表达了邓恩铭对家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某些年份未见书信，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家书遗落，未能全部收集。比如 1925 年 7 月 31 日写给父亲的信，第一句话是“不写信大概有半年了”^①，照此推算，上一封书信大约应该在 1925 年 1 月，但家书中并没有该时间的信件。再如，1924 年 5 月 8 日写给父亲的书信中说“不写信又三个月了”^②，由此推算，上一封书信应该是 1925 年 2 月，但目前没有见到这个时间的家书。又如，1931 年 2 月 6 日写给三叔的信说：“侄此次被捕，前后情形，已详家信中，想已尽知，现在不赘了。”^③“此次被捕”是指 1929 年 1 月邓恩铭从淄博张矿区来济南山东省委研究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被捕。但查阅留存的信件，均未见述及被捕情形的家书，换句话说，在 1929 年 1 月至 1931 年 2 月之前，邓恩铭至少还有若干家书。总而言之，邓恩铭家书应该遗落了一些，不是目前见到的 14 封，应该更多。家书之多表明了邓恩铭在学习和从事革命工作之余，始终没有忘记与家人的联系，始终与家人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二是工作繁忙和处境险恶。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邓恩铭即投身运动的洪流，整天和同学们在街头宣传、讲演、游行、示威。在此期间，他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同时担任出版部长。不久，邓恩铭和王尽美等人又发起组织了“励新学会”，并出版《励新》半月刊。励新学会成立后，邓恩铭几乎每天晚上都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写文章。^④如此激荡的岁月和如此繁忙的工作，自然会占去邓恩铭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顾不上写家书便在情理之中。1920 年 12 月，邓恩铭和王尽美等人在济南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每星期六集会一次，进行讨论。1921 年 5 月，他和王尽美等人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年 7 月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更返回山东投入组建中共山东直属支部的繁重工作中，自然不能及时写信回家，故而 1921 年几乎看不到他写的家书。1923 年，邓恩铭家书仅有 1 封，相当少，但这一年他却就青岛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双十节纪念活动、学运工运活动、成立地方团组织和工人团

① 柏文熙、黄长和：《邓恩铭遗作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 页。

② 柏文熙、黄长和：《邓恩铭遗作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 页。

③ 柏文熙、黄长和：《邓恩铭遗作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7 页。

④ 参见沈德海主编：《永远值得怀念的人们》，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 页。

体组织、开办书社、成立青岛职校自治会、在青岛开展社会调查等党的工作分别给仲澥（即邓中夏）、刘仁静等人写了9封信。^①1924年的家书也只有1封，但就发展团员、青岛工人运动、创办补习学校、派代表参加学联等党团大事，写给邓中夏、刘仁静及团中央的信却多达20封。同时，还写了数篇政论性文章，如《校长和日历》《今日的感想》《青岛劳动概况》《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之进展》。^②“家书少、国信多”成为这段时间的显著特征，原因就在于邓恩铭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党的工作。1925年11月，邓恩铭在筹备纪念十月革命活动时被特务抓捕入狱，直到1926年2月才被保外就医，但仍受敌人通缉，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因此该时期家书较少。1929年1月，邓恩铭再次被捕入狱，直到1931年4月牺牲，他都是在监狱中度过，写家书自然受到种种限制，正如1931年2月6日他在给三叔的信中所言：“几年来，不是东奔西跑，就是作囚坐牢，以致绝少写信。”^③因此，1929年之后邓恩铭所写家书很少，这与他当时所处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深陷牢狱有着直接的关系。总结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没有家书或是家书少的年代，恰恰是邓恩铭把时间和精力献给党的事业的年代。由此而言，家书的时间和数量从侧面反映了邓恩铭深厚的家国情怀。

三、家书内容反映的家国情怀

家书的一字一句最能反映邓恩铭的家国情怀。就家书的内容看，主要反映了邓恩铭的以下情感。

（一）思乡之情与体贴父母之情并举

在1917年10月14日致父母的信中，邓恩铭更多关注的是衣食之事和对新环境的感受，他在信中写道：“只能受寂寞之苦。饮食之苦！至于寒冷之苦，男寂（极）不能忍受。”甚至面食太多、衣服太贵也成了邓恩铭向父母诉苦的内容。这封信是邓恩铭初到济南时所作，当时他16岁，告别家人到千里之外的陌生环境，人生地不熟，不免产生思乡之情，“男青夜思之，常常凄然，况一人独处异乡，其寂寞有令人难受者”。这正是他留恋父母和故乡情感的真实流露。但必须明确的是，此时的邓恩铭已坚定了在济南好好读书以成就事业的决心，他在信中说：“虽然吾人欲图成一事，必经大艰难、大困苦，而后能达吾人之目的。”^④至1918年9月给姑丈的信中，邓恩铭描述了和姑丈在济南时的愉快时光，对姑丈离开济南回荔波充满惆怅，实际是表达了自己的思乡之情，用他在信中的

① 参见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3页。

② 参见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103页。

③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④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话就是“明一人在省，其寂寥固不待言”。邓恩铭在信中还请求姑丈不要把自己在山东遇到的困难告诉父母，“择佳者道之”^①，以免父母担心牵挂。显而易见，邓恩铭对父母报喜不报忧，宁肯自己在外吃苦，也不愿父母担惊受怕，实际上是要减轻父母的思想负担，让父母开心生活。此外，邓恩铭想请姑丈同父亲商量，用老家的布料做衣服，再寄至山东。为此，他还将尺寸和布料颜色附于信后。^②他之所以要如此做，主要是因为山东那边的衣服价格太高（这在1917年的家书中已有表述），在家用自产的布料做衣服，可以节约费用，这显然也是在为父母着想，不愿给他们增添经济负担。由此可见，邓恩铭书信中充满的是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父母的体贴。在从事党的工作之时，邓恩铭依然对父母体贴有加。他在1927年3月25日的家书中写道：“男因事来汉口，走时父亲尚在沂水，没有让他知道，因为知道了会又害怕起来啊。”^③革命九死一生，时刻都是生死离别。此句虽短，但体贴父亲之情却绵绵悠长。邓恩铭不仅在家书中表达思乡之情，还在业余时间用吹箫和吹笛子来排解思乡之情，参加革命以后仍然笛、箫不离身。^④

（二）对时局的不满之情与对家境的担忧之情并举

邓恩铭的父母起初在荔波县城靠磨豆腐谋生，后来又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店铺，兼卖中药材和小糖果。这样的小本生意只有世道平安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最怕的就是兵荒马乱。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中特意写道：“广西不安靖，出门的生意万不可冒险，前车之鉴多得很咧！”^⑤这既说明时局混乱，更表明邓恩铭对父母做生意的担心，希望他们万万不要冒险去做生意。长期在外，思乡心切，邓恩铭决定在1922年回荔波老家一趟，但时局动荡，让他望而却步。邓恩铭在1922年8月29日的家书中写道：“今年男很想乘闲回家一次，不过像这样世道，保得住路上没有土匪吗？冒昧回去，一旦遇着怎么了？命比什么都宝贵，没有命，立时万事皆空，所以回家的事总要慎之又慎，不能敢走。”^⑥土匪的劫杀让人有家不能回、不敢回，这是什么世道？！这是对时局不满的强烈控诉。正因为时局动荡不安，他再次提醒父母：“乡间土匪横行，祖母和四叔一家决不可再住水浦，无论如何，总要搬到城里来同住。”^⑦话外之音是：如果还在乡间居住，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土匪洗劫，人财两空。这依然是他对家境担忧的体现。1923年，邓恩铭再次想回荔波，但世道仍不太平，让他不能成行，在11月2日的家书中，他写道：“男刚起回家的念头，广西又乱起来了（报上载有）。唉！这一乱，恐怕

①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② 参见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③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④ 汪文忠、茅悦：《最年轻的一大代表邓恩铭》，《人民周刊》2017年第23期。

⑤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⑥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7页。

⑦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又不知哪年才能回家?”^①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既有无法顺利返乡的无奈,又有对混乱局势的强烈不满。1925年9月20日,邓恩铭在信中说:“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②水稻是荔波最主要的物产,但米价却很昂贵;邓恩铭有学识有抱负、能吃苦又勤俭,却既无立身之地,又无力顾及家庭,这是时局不好的必然结果和真实写照。这封写给弟弟的家书,同样反映了他对时局的不满和对家境的担忧。也正是对时局的不满,促使邓恩铭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 救国救民之情与牵挂父母之情并举

1920年3月1日,邓恩铭在家书中请父亲在祖坟边多栽柏树,再植上一两株香樟。^③尊祖敬宗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它既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又能让我们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邓恩铭专门写信让父亲修缮祖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寄托了某种感情和志向。邓氏祖坟立有邓恩铭曾祖邓沛璋及其夫人金老太君的墓碑,从墓志铭上看,邓沛璋原居广东梅州,后迁至贵州荔波,“少壮时遂有志于四方,于是遨游所至历历可记”。他治家有方,“兄弟无间,朝夕甘旨承欢,长踞以进”。正因为此,邓氏家族“致政最严,夫妇儿媳动必以礼,训督诰诫庭帏雍睦,且芳谦恭接物,蔼然可亲,人为乡食矜式焉”,邓沛璋被赞誉“所为有善足纪,有德可称”。显然,邓沛璋是值得后辈称道和敬仰之人,尤其是“少壮时遂有志于四方”,这无疑激励邓恩铭远离贵州赴山东求学的重要动力。赴山东求学显示了邓恩铭志存高远,这种志向在当时便是救国救民。金老太君贤明温惠,“毓诸表昆友相夫课读,教敦孝友,俭勤而绕膝。四邻怯遵慈训,俱各成名”。^④金老太君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亲戚和睦、与邻为善,显然也有着高尚的美德。邓氏家族良好的家风和邓沛璋、金老太君具有的传统美德自然会让邓恩铭学习效仿,从而对邓恩铭的思想产生影响。这应该是邓恩铭家国情怀中家庭情怀的源泉之一。此外,柏树既是寄托后人对前人敬仰和怀念之情的象征,又是坚毅挺拔、正气高尚的象征;樟树则象征正直和坚韧不拔。邓恩铭家书中特意请求父亲在祖坟边植柏树和樟树,既是表达他对先人的敬重和怀念,更是表达他要以先辈为榜样,传承优良家风,做一个坚韧不拔、正直高尚、志在四方之人的宏愿。还要明确的是,在信的末尾,邓恩铭特意写道:“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

①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②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③ 参见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④ 潘绍犹:《从邓恩铭曾祖墓志铭看邓氏家族》,贵州省水家学会第三届、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1999年,第186~187页。

珍重玉体为要!”^①对母亲身体的牵挂之情跃然纸上。家书字里行间体现的是邓恩铭志存高远与牵挂父母之情。在1922年8月的家信中,邓恩铭一方面牵挂母亲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叮嘱父亲:“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百姓,不要助人为恶,剥夺人民。”^②既然希望父亲能这样做,当然他自己也要这样做,换言之,这其实也是他勉励自己要有体贴百姓、造福百姓的情怀。自古忠孝难两全,在处理忠孝问题上,邓恩铭在家书中说道:“如陆治平等之孝养其母其志可嘉,儿今后应努力效之,但其平凡之职务,儿实不屑为也。”^③由此而言,邓恩铭一方面希望努力做到像陆治平那样为母亲尽孝,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做平凡之人,能成就一番为民族尽忠、为百姓谋福的伟大事业。邓恩铭救国救民之情在他所作的诗中也有表现。诗曰: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④诗句表达了他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他在居住的房间,写下了“万里负笈,不无目的,依偎理想,有枝可栖。偿抱负志,不寒不饥。南雁北飞,去不思归”^⑤的诗句,这同样说明邓恩铭有着为救国救民甘洒热血的雄心壮志。

(四) 孝道之情与革命之情并举

邓恩铭对父母的孝敬在每一封家书中都有体现,在给父母的信件中,他总是念念不忘让父母注意身体。为了给父母治病,他千方百计托外地的朋友购买药物,如从北京购买狗皮膏和上清丸、阿胶寄回荔波,^⑥用实际行动表达对父母的孝道。不仅如此,他在家书中总是恳请父母要保重身体。在1922年8月29日的信中,他一再叮嘱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⑦在1923年11月2日的家书中,他让父亲少吃阿胶,因为阿胶并不是什么好药,多吃容易误事。^⑧在1925年9月20日的家书中,他希望两个弟弟要孝敬父母,不要因小事打架,千万不要惹老人家生气。^⑨在1930年12月5日的家书中,邓恩铭回忆起因在外而不能尽孝时说:“离家十余年,一事无成,不但没有尽到丝毫子职,反使老人受累受惊,并且祖母和父亲之丧,儿都没有在家,这是多么不成器,多么不孝呵!”

①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②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③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④ 参见闫勋才:《邓恩铭》,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⑤ 沈德海:《永远值得怀念的人们》,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⑥ 参见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⑦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⑧ 参见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⑨ 参见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但愿母亲长健，儿病无恙，则将来总有使母亲享福之一日。”^①因未能尽到孝道而自责之情和期盼将来能让母亲颐养天年之意跃然纸上。邓恩铭不仅对父母关爱有加，对其他长辈同样嘘寒问暖。在1917年10月的家信中，他非常关心三叔、四叔、三舅和大姐的情况。^②在姑丈返回荔波之时，邓恩铭亦是担心其路途上的安危，祝福姑丈吉人天相，安全抵达家乡。^③在1920年9月14日的家书中，邓恩铭不仅再次提到三叔、大姐，而且挂念大舅、何舅爷、陈姐夫和弟妹的生活、读书情况，希望父亲能早日回信，“详详细细的写给男知道，免得男天天想哩！”^④表述了邓恩铭想了解亲人信息的急切之情，彰显了他对亲人们浓厚的孝心，因为没有这种孝心就不可能有如此急切之情。

不愿为家尽孝的人很难为国尽忠。邓恩铭对亲人有着浓厚的情感，在涉及革命的问题上，同样有着炽热的感情。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民歌为代表的俗文化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1918年2月，北京大学发起了在全国征集歌谣活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收集、整理和研究民歌的热潮。在此背景下，邓恩铭也投入其中。1922年4月6日，他专门写信请父亲帮他征集歌谣。为做好征集歌谣工作，他还给父亲出了个主意：一是办一两桌酒席，约请本城年纪高、能唱歌的老太太们来唱，再请人抄写；二是买一些花生、糕、果子之类，请各家的小孩子来唱，也找人记录下来；三是同学校教员们商量，把本地歌、水家歌、苗歌的大意记下来。在信的末尾，邓恩铭特别恳请父亲“歌谣写好后，千万早日挂号寄来”。^⑤这和他希望父亲早日回信告知亲人们近况表达的情感一模一样。民歌是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重要载体，邓恩铭对征集民歌的积极态度和方法举措，正是他在文学领域革命之情的真实表露。五四运动时期，邓恩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此后又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在学校的这些表现，引起期望他读书做官的父亲的不满。邓恩铭在家书中解释道：“儿生性与众不同，最憎恨的是名和利，故此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奈何！”^⑥这彰显了邓恩铭投身革命的坚定决心。在1924年5月8日的家信中，邓恩铭写道：“三爷与印寿回南，儿本当同行，奈职务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⑦这段时间，邓恩铭任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正忙于发动工人和建立工会组织，事务繁忙，纵然想回家尽孝，但因忙于革命工作，也只能放弃回乡。这种坚定的革命之情见于他最后一封家书所附绝笔诗：“卅一

①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② 参见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③ 参见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④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⑤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⑥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⑦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①不仅表达了他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和对革命后继有人的坚定信心，也体现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为国家民族尽忠的赤子深情。

就写信对象而言，有父亲、母亲、姑丈、三叔和弟弟，均是至亲。尤其是给父亲、母亲的家书最多，有 11 封，占全部家书的 81%。这是对父母深厚感情的具体体现。邓恩铭在革命工作之余，牵挂自己的众多亲人，综观家书，他关心的有祖母、外祖母、大奶、全姑妈、梁妈妈、三叔、四叔、三婶、四婶、大姑母、三姑母、二姨妈、三姨妈、大舅、何舅爷、大姐、陈姐夫、两个弟弟、妹妹三菊、诸位表姐妹等 20 多人。关心的对象愈多，表达的亲情愈浓。邓恩铭在家书中不仅关心长辈的身体和生活，而且关心弟弟妹妹的学习和成长，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邓恩铭有着宽广的家庭情怀。

邓恩铭家书中体现的家国情怀在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都有体现。1923 年底，受党中央委派，毛泽东由长沙出发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临别前他给妻子杨开慧写了一首《贺新郎》，其中有句云：“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②毛泽东以此词告别爱妻杨开慧，舍弃儿女情长而投身民族大业。龙大道在 1926 年 7 月 20 日给父亲的家书中，一方面讨论国家的局势，担忧百姓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牵挂祖母的身体状况，^③显示的同样是家国情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④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家国一体、舍小家保大家的家国情怀，是中国人的执念，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源动力，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独有标识。^⑤

四、结语

邓恩铭家书蕴含的家国情怀，不仅是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大爱，而且是他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追求，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在建党百年之际，重温邓恩铭家书体现的家国情怀，不仅有助于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坚定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化责任担当，而且能够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素材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① 邓恩铭：《诀别给母亲的信》，《当代江西》2018 年第 10 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③ 参见高占祥：《革命先烈家书选》，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798 页。

④ 朱熹撰，张茂泽整理：《四书集注》，三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2 页。

⑤ 田旭明：《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 年第 12 期。

Deng Enming's Family and National Sentiment Seen from Family Letters

Hu Anhui

Abstract: There are currently 14 from Deng Enming's family letters that can be seen. The few family letters and the many country letters have become a distinctive feature in the period. When there were no or few family letters, Deng Enming devoted his time and energy to the Party's cause. The family letters were an important mean for Deng's family and national sentiments, reflecting his homesickness and consideration for parents,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worries about family, his desire for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his concern for parents, filial piety and revolutionary feelings.

Keywords: Deng Enming; Family and National Sentiments; Family Letter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思政课整合路径研究^{*}

李立男^{**}

【摘要】文化是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重视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肩负着继承和弘扬文化的重任。我国一直重视文化的育人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提升思政课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政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相关性与切合点，使二者有了融合的可能性。因此，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思政课的相关案例，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政课；整合路径

我国一直重视文化的育人作用，特别是文化的思想教育功能，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针对如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指导思想与教育大纲；《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则提出了形成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体系和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目标；《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的通知》指出了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提升以文化人、文化育人质量体系的重要性，并且明确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问题。而高校思政课教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具有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想信念的合格接班人，其中理解和把握我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 本文为2020—2021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XMSKLLYB20-11）阶段性成果、厦门工学院博雅教育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XJYJG20021）成果。

^{**} 李立男，厦门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引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基因，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善恶取向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总和，不仅有物质形式的表现，还有民族思维和价值取向等精神形式的内核。”^①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积淀，都是对这个国家以往文化的继承以及与时俱进地创新转化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②而“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承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创新性转型，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③革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的产物，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与特定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与革命文化一脉相承，是属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近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归以及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发展，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合。

（一）文化与思政课整合的重要意义

雷骥从学理上梳理了文化、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含义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可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与自信，增强其有效性。^④李秀芳、王鑫也认为深藏于人心中的“文化基因”对人的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高校思政课是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而思政课应主动对接文化自信，将其融入教学，建立科学的实现机制。^⑤项久雨、吴海燕则认为培育牢固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尤其重要，是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⑥冯凯阐述了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所处的历史地位和鲜明的坐标色彩。^⑦

① 朱云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吉林教育》2020年第1期。

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重要论述摘录》，《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23期。

③ 程恩富、李立男：《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④ 参见雷骥：《文化、文化自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辨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年第3期。

⑤ 参见李秀芳、王鑫：《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文化自信教育》，《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⑥ 参见项久雨、吴海燕：《培养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0期。

⑦ 参见冯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坐标》，《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

（二）文化与思政课整合的实践研究

对于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张师帅认为文化能够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①刘红英则指出文化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底蕴等。^②对于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刘丽红、李学云认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信，需要坚持“四个自信”的有机统一、文化自信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不断提升教师的文化素养；^③李超民、茹奕蓓分析了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四个方面阐述了文化自信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的思路与方法。^④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的整合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问题，一直是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话题。曹兰胜认为文化自信与文化繁荣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传承，需要与其同频共振。^⑤陈学明等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但可以将其变成当代文化资源，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⑥杨燕和林志友分别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⑦罗建平、苏晓哲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特定的文化载体，并特别指出这个文化载体特指中国各种优秀文化。^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于洪霜、何瑞麟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⑨在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做法上，就其内容而言，迟成勇认为应将中

① 参见张师帅：《论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其实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

② 参见刘红英：《中国传统文化走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意义》，《思想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

③ 参见刘丽红、李学云：《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信》，《教育评论》2017年第9期。

④ 参见李超民、茹奕蓓：《文化自信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研究》，《学术论坛》2017年第5期。

⑤ 参见曹兰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传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

⑥ 参见陈学明、黄力之、吴新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补共生》，《天津人大》2015年第10期。

⑦ 参见杨燕：《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探析》，《桂海论丛》2013年第4期；林志友：《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层次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三个阶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

⑧ 参见罗建平、苏晓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文化载体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⑨ 参见于洪霜、何瑞麟：《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结合》，《教育与职业》2012年第18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①就其手段而言,岳宗德认为应通过开设一些传统文化课程辅助思想政治教育;^②金国峰、宋磊提出,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③等等。

(四) 文化与思政课整合中出现的問題

众多学者研究发现,文化的运用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从大学生的角度而言,有些大学生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对传统的美德观念认识不够。李德万认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足、知识储备缺乏、相应的价值观过于功利化等。^④第二,从学校的角度而言,当前学校并没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思想教育的过程。欧阳九根、傅洪键指出,很多高校没有设置传统文化的相关课程,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相关部门没有对传统文化的教育进行宣传和指导。^⑤

当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一些错误思想和观念在大学生中仍然有传播的空间。这就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将文化融入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对于探寻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之间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增强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与人文素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以及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思政课整合的可能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是指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属性,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形态,以文化传承创新的方式方法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培

① 参见迟成勇:《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融合》,《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12期。

② 参见岳宗德:《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探析》,《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

③ 参见金国峰、宋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策略》,《高校辅导员》2015年第4期。

④ 参见李德万:《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途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⑤ 参见欧阳九根、傅洪键:《传统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年第9期。

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此，思政课意识形态属性与文化属性使其与中国文化具有整合的可能性。思政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理论与中国文化具有亲缘性，并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不断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同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也具有丰富的文化思想与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与中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与文化的现代性重构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深度融合的过程。”^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传来之日起，就在不断实现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中国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现代性转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构想，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突出的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表现的“在文化上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既是对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深度思考，更是对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大贡献”^②。另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使其同国家意志相结合、同文化政策相结合，形成在世界文化交流过程中无法复制的亲和力、凝聚力与创新能力，并为坚定当代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文化思想

思政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亲缘性”。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关于文化的思想也为与思政课契合指明了需要遵循的价值取向。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着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认同机制”^③。

1.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中就对文化做了明确阐释，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阐明了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与该时期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认为物质生产实践决定

① 刘小龙：《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自信的深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23日。

② 刘小龙：《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自信的深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23日。

③ 刘润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

着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跟随着物质生产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提到:“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阐明了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哥达纲领批判》《人类学笔记》等著作中,文化思想进一步深化。《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从更深的层次阐明了文化与物质生产、经济发展的关系。

2.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毛泽东在《论新民主主义》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实质是反帝反封建,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化范畴,社会主义文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①还认为,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文化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具体来说,在文化发展的路径上,强调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国外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优秀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并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提出社会主义文化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在文化发展的方针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实践证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中国文化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改革开放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文化思想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要抓,“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②对于教育,邓小平把“有理想、有道德”放在“四有”新人的前两位,即重视教育的育人功能。从党的十五大开始,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③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④党的十七大之后更是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提出加强文化建设,并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① 张忠家、杨值珍:《论文化自信的构建》,《江汉论坛》2018年第5期。

② 张志芳:《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现实启迪》,2019年2月13日, <http://cpc.people.com.cn/nl/2019/0213/c691113-30642111.html>。

③ 《民族精神要与时俱进——社会各界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2002年11月21日,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2/11/id/21527.shtml>。

④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与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次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① 要将文化自信置于“四个自信”中最根本的地位。在具体的实践上，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② 明确阐述了文化自信应有的内容和具体的实现方法，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思政课整合提供了实践原则和路径。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思政课整合的具体实践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相关内容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创新了教学方法和手段，改善和提升了高校概论课教学效果，又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而回应了弘扬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学应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掘文化资源，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一）原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何与新时代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当前的重要课题，而如何将文化与教育理念、教育内容等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教育理论更是教育工作者当前面临的问题。由教学实践和教学经验发现，文化融入教学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 重视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主要着眼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其全面发展。人文素养包括文化知识素养、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文化丰富的人文内涵是提升高校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补充。例如，利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

^① 李斌、霍小光：《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习近平总书记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人民日报》2014年3月13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8页。

神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利用诸子百家的思辨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独立精神；利用勤俭节约、仁爱、慎独等传统道德体系提升大学生的道德境界；利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思想激励大学生勇做开拓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除了注意政治引导性，也应承担开启人的心智、启迪人的灵魂的责任，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当下，正确的政治方向、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优秀的精神内涵、人文精神和高尚道德等是对当今大学生的要求。”^①将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势必会弥补高校思政课人文素养教育的不足，使大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净化灵魂、健全人格、坚定文化自信，进而成长为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2. 突出文化在教学中的创造性转化

对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②对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照抄照搬，应当是扬弃，是创造性转化，即“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融入思政课教学，首先要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将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概括为“为政以德”“革故鼎新”“知行合一”“群策群力”。^④其次要紧扣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阐发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这些论述紧扣时代要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转换提供了方向指导，也为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提供了可遵循的路径。

3. 改革教育教学方法

将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要通过相应的教学方式来实现。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征，讲授法一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教学方式。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需要新的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加入新的教学方式。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理念是符合当前时代特征、能够发挥大学生的主动性的教学理念，也是能够实现增强教学和学习效果的目标的教育理念。因此，以学生为中心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启发学生为主线，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教学方式上，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① 朱杨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④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第一,利用探究性教学方式、互动启发式教学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实施教学方式过程中,要注意教学内容和学生身心的适应情况,注意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内在契合性。

第二,变权威式、结论式教学方式为问题研讨式教学方式。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一个开放的主题,互联网时代学生掌握的信息并不比教师少,因此传统权威式教学不适合当下的教育。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授课内容设置与文化相关的问题和案例,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小组讨论、社会调研、答辩等环节让学生在探究中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认同,主动将文化内化于心。

第三,采取开放式教学。教师应当在讲授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现实情况和专业特点,添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与时俱进的信息。同时,通过灵活的方式激发他们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4. 开展与文化相关的教学实践

古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原则。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延伸、补充,实践课是能拓宽思想政治课程的渠道,并且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中设置了专门的实践课时。“根据《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 2014》,大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对自身思想品德发展的影响认可度最高,远高于其他因素”^①,重视思政实践课势在必行。而目前高校思政实践课问题也很多,表现为流于形式、不能与课堂结合等。因此,从文化中汲取营养,加强课堂教学与课外体验的结合,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的重要途径。

首先,高校应积极开发博物馆、纪念馆、名胜古迹等文化资源,开设校外实践基地,开展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例如,吸纳学生参加博物馆、纪念馆等志愿者活动,使大学生能够理解、运用、铭记和感悟;组织大学生参与养老院等福利场所的志愿者服务,让他们身体力行地体悟敬老尊老的传统美德;组织开展以历史名人、重大历史事件、传统节日日为主题的活动,例如端午节可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需要在精心策划的基础上,达到感悟、巩固、升华等教学效果。

其次,鼓励学生在假期开展与文化教育相关的实地调研。教师布置与文化相关的实践作业,让大学生组队出行,开展调查研究。指导教师通过对大学生调查过程和结果分析的指导与评价,让大学生能够真正有所收获和感悟。

综上,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体验文化,增强对文化的价值认同,深入认识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的统一,成为文化的践行者和传

^① 朱杨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承者。

5. 利用网络新媒体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大众传媒成为弘扬文化的重要载体并被大家认同。例如,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百家讲坛》等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深受大学生喜爱。教师也应该利用互联网拓展教学方式,借助文化中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提高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大众传媒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手段和方式的全新拓展,为教师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例如,教师可以设计思政课教学信息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推送文化和思政课相结合的信息,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活泼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情感的渗透和思想的互动,使大学生既学习了相关思政课内容,又受到文化的熏陶。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开展课堂教学活动。例如,通过课堂观影、课堂演讲等方式丰富教学形式,并引导学生进行思考;通过丰富的资源和形式提升大学生对文化的兴趣,提高思政课的实际效果。

6. 提升教师的文化素养

在将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在中国大地上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他们往往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出发来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带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①但是,当今一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缺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厚功底和能力。不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不可能结合中国文化特点和用中国话语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内涵。

随着传统文化的式微,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教学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降低,传统文化底蕴也逐渐丧失,并且随着教育分科制度的实施,学者的知识结构只侧重于自己的专业学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研究较少。这就造成了大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学术领域具备过硬的专业素质,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积累却不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教学方面,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把控能力不足,教学方法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非但不能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一定的困境。因此,兼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师资队伍,是使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重要因素。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思政课整合的实践

文化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反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内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四

^① 黄岩、朱杨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

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其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任务。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是贴近大学生实际的重要文化资源。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更好地感受中华文化精髓与自身生活的关联,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增强民族价值认同,增强大学生的自豪感和文化责任感。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文化自信的内容和载体,以此教育大学生实现传承文化、提升文化自信的目标,同时实现完善大学生人格、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

1. 与“原理”课的整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简称“原理”课),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共通点,因此在课程的设计中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也可以在课上运用文化的思想来进行讲解,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更丰富地阐发。这既能够丰富传统文化概念内涵,使其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获得现代化的阐释,又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为中国化,使大学生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具体案例包括唯物辩证法、民本思想与群众史观、“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经世致用与社会实践、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等。在具体的设计中,“原理”的第二章“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主要内容是关于实践和认识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要正确把握理解和认识活动,必须联系人类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实践具有相通性。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到“知行常相须”(《朱子语类》卷九),注重实践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相通之处,都是教学过程中的宝贵资源。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耳熟能详的话语来授课,使课程更易被学生理解和认可。另外,在授课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些思想的局限性,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进行辩证的解析,使学生在比较中理解,加深印象。

2. 与“基础”课的整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简称“基础”课)的主要内容是理想信念教育、中国精神的学习以及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等。“基础”课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思想教育,即人生观、理想信念、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教育;道德教育,明确借鉴优秀道

德成果,遵守公民道德准则,其中有些是对传统道德新时代的发展,有些则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这门课程与文化结合最紧密,教材中不少章节都有文化的内容,有些章节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在第二章“理想信念教育”中,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的转化资源展开。本章旨在促使大学生追求远大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崇高信念。儒学中的“三纲八目”,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将立世为人作为追求目标。这一学说浓厚实践色彩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使其将自身价值实现与国家发展相结合。这与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远大理想的教学目标不谋而合。第三章“弘扬中国精神”,对民族精神进行了详细的展开。“抓住传统文化中‘志当存高远’的理想观,‘虽九死其尤未悔’的信念观,‘君子有道’的道德观等契合点,开展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教育。”^①

第五章第二节明确了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夙夜在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苟利国家生死以”等强调责任奉献的思想和精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等推崇仁爱、以和为贵的精神,“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道德原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格,重“自省”“存养”“克治”“知耻”“慎独”的道德修养。中华传统美德变成全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②,“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等,体现了中国智慧,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精神给养”^③。

“基础”课以理念转变为先导,以“思想引领”到“行为养成”为逻辑思路。通过对教材内容的深度研究和再组织,提炼教材内容体系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专题形式组织教学,并据此设计相应的教学结构、框架和程序。

3. 与“概论”课的整合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简称“概论”课)介绍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以及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制

① 黄岩、朱杨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余卫国:《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③ 吴琳:《试论依法治国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功能、价值表征与实践意蕴——基于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政与法》2015年第1期。

度,可以在政治和思想上引导学生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并联系中国国情,于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内涵,很多源于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该课程时,应当注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时代精神融入“概论”课教学,增强大学生的制度自信。第一,引导学生在了解国情;第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第三,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第四,激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在具体的设计中,以“概论”课第二章、第三章毛泽东思想为例,可以利用毛泽东诗词梳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脉络。毛泽东诗词堪称中国革命史诗,是20世纪最优秀的中国文化代表,最具中国气派、中国作风。

另外,“概论”课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蕴含了传统文化中良治善治的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先进文化等方面的适应与协调。习近平总书记讲道:“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各部分的文化特征,来帮助学生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原意是指生活比较安定。发展到现在,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对传统法家思想“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的继承和发展。在讲授这一内容时,还可以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全面小康社会进行对比,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更全面的解读,加深学生的理解和印象。

4. 与“纲要”课整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简称“纲要”课)讲述了近现代中国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奋斗历史,讲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过程。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以及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贯穿中国历史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讲授这门课程时,增强学生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感,升华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课程内容分成四块: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1949~197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时期(1978年至今),对于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示和生动体现。例如,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讲述了日军侵华时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英勇的中华儿女谱写了壮丽的爱国诗

^① 王鹏:《新疆城市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耦合互动关系的思考》,《实事求是》2020年第9期。

篇。革命者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精神构筑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些都是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鲜活案例。教师在教授过程中,应当重点讲解国家危难之际展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同仇敌忾,抵御外辱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又一次有力验证,进而提升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三) 保障

将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除了教师与学生的努力,更需要在校园文化建设、学校的制度建设以及专业课建设中巩固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形成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面育人的教育格局。

1. 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生活是大学生高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也是发挥其思想政治价值的重要途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校精神文明和文化内涵,因此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①高校可以利用大学生社团组织开展以文化为主体的学生活动,诗歌大赛、书法大赛和辩论大赛等,通过活动进行文化知识的普及,同时也可以寓教于乐,让大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感受文化的育人力量,激发大学生的求知和学习欲望。高校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具有灵活性和操作性,是文化进校园的重要实践途径之一。

2. 学校制度建设

全面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委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②高校党委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的核心和主体,必须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的作用,引导各方积极参与、支持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要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坚持书记抓、抓书记,成立由校党委书记任组长,校长任副组长,校党委组织部、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人事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小组,建立党委领导、部门齐抓共管、全校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全力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制度体系。重点是推进制度系统化、多样化、多级化、全员化建设,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制度、激励评估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常规制度,深化知识供给制度,完善学术研究制度,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学科高质量发展。切实理顺内部制度关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涉

① 朱云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吉林教育》2020年第2期。

② 朱喜坤:《思想政治工作对我国高校办学的重要性》,《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12期。

及领导关系、机构设置、行为方式、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要推动工作落实。

3. 专业课程建设

一是打造优质的教师团队。高校应该有意识地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通过开展教师沟通、教学融合讲座等方式，使教师掌握融合思想政治课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二是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收集和展示。可以通过开展经典导读、阅读沙龙、书香校园、国际文化交流、高雅艺术进校园等主题活动，充实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三是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及学生考核评价体系，努力形成文化育人、教书育人、实践育人、服务育人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力量，对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行为方式，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标识，是全体人民精神凝聚力与向心力之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育人目标层次鲜明，内涵丰富，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的目标殊途同归。“敢为天下先”的担当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都是培育大学生爱国爱党精神的精神给养。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素材。

另外，文化包含的人文素养、人文精神、道德标准和文化传统等，对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审美情趣，进而塑造健康人格、构筑完备的思想体系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内涵，并应对新时代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进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Li Linan

Abstract: Culture is wisdom and precious wealth of a nat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national cultur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cultur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hose main content is Marxism and its sinicization theory have relevance and fit in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these are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on with them.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certain principles, this paper lists the relevant cas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Keyword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tegration Path Research

国学为根，综合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岳德常^{**}

【摘要】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就必须突破旧的话语体系。要突破旧的话语体系，就要突破认识论范式的束缚，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要突破这两个束缚，中华民族具有独到的优势：一是我们有一个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对“闻道”的追求；二是在追求大道的过程中，发展出一门独特的学问，那就是“心性之学”，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大学之道”，它为人类突破认识论范式和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提供了方向与路径。“大学之道”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之道，亦即文化建设之道、人类解放之道。要构建一个超越以往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新体系，构建者自身就必须率先走上“大学之道”。在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两个问题：一要为人类提供科学合理的信仰，二要找到一个新的“第一原理”，推导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在对“大学之道”的深入阐发和坚守中找到解答。

【关键词】话语体系；哲学范式；大学之道

新冠肺炎病毒对人类社会构成巨大威胁。在肆虐的疫情面前，西方政治体制不堪一击，无能为力，唯有中国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住了疫情，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在当今世界流行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却备受指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抗疫成就一直被妖魔化，不仅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怀疑、攻击，还受到国内“公知”的无端指责，无论社会主义体制如何优越，他们都不会满意。究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而是西方社会

^{*} 本文为2020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以儒家君子文化涵育新时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研究”（2020BKS015）阶段性成果。

^{**} 岳德常，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遗产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国内“公知”的话语体系狭隘片面，既不能指导人类合理行动以应对各种挑战，也容不下我们共产党人的社会治理实践，与其在他们的话语体系内辩解，不如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必须突破旧的话语体系的限制。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突破呢？程恩富所说的“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开拓了我们的思路，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突破“两个束缚”

为什么要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这是因为现有的话语体系狭隘片面，不能容纳也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更不能指导人类合理行动，制造了大量的灾难，使人类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突破这个话语体系的狭隘性、片面性。但我们看到，旧的话语体系蒙蔽了人们的眼睛和头脑，受蒙蔽者并不认为自己被蒙蔽了，他们坚信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和所看到的现实就是真理，这种武断与自信，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独断论。见不贤而内自省，我们要进行话语体系建设，首先要突破这种独断论。考察人们受蒙蔽的原因，要想突破旧的话语体系，有两个障碍需要突破，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突破“两个束缚”。

（一）突破认识论范式的束缚

要想构建新的话语体系，首先要找到一个稳妥可靠的大前提。马克思当年也是这样做的，他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①进入新时代，在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深挖旧世界的地基，发现了价值体系问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方略，它不仅是我们构建话语体系的大前提，而且也是必须达到的目的，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新高度。所以我们可以立足于这个新高度，回首人类哲学发展的历程，重新梳理哲学发展史，把它概括为四级哲学范式，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1. 本原论范式研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2. 善恶论范式研究人性的善恶问题。
3. 认识论范式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4. 知行论范式研究人们坚持的价值体系的优劣问题，要求人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

有了这个哲学发展路线图，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下话语体系建设的任务是什么了，那就是突破认识论范式，进入知行论范式。认识论范式之所以需要突破，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恩格斯称之为“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①。这个问题虽然很重大，但如果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就会忽略更为重大的“哲学根本问题”，那就是人所践行的价值体系的优劣问题，于是就导致了两个缺陷。

首先是把一个完整的过程分析为彼此对立的各个要素，在其中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例如唯物与唯心、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自由与必然、民主与专制、英雄与人民、个人与集体，如此等等。在这种对立中，不管在选择其中哪一个，人们都摆脱不了片面性。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不能合理行动。

比如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其根源就在于第三级范式的这种缺陷，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本来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这个观点把这个整体分裂成彼此对立的两极，只要其中的一极否定另一极，就会使两者都无法实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人用“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来否定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战胜疫情的伟大胜利，其根源也在于这种哲学范式的缺陷。

再如民主与专制的对立问题，也是第三级范式制造出来的。在这种两极对立中，人们预设了民主的正确性，只要是一人一票，那就天然正确。虽然西方民主模式已经百孔千疮，但如果人们跳不出两极对立的思维范式，就仍然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其次是遮蔽了哲学根本的问题——价值体系问题。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必然有一个价值体系，而且必须在价值体系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成长为人；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人必须闻道，也就是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狭隘性、片面性，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合理行动。但处于第三级范式中的人们一方面坚决地否认价值体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坚持着那种低水平的价值体系，这个东西潜藏在他们的无意识的深处，由于他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就更深地处在它的控制之下而不自知。这种潜伏在无意识深处的价值体系往往就是那种最糟糕的价值体系，虽然有的人也标榜某种道德法则，但那只是挂在嘴上，实际上主导其行动的仍然是隐藏在其无意识深处的那种价值体系。它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以丛林法则为行为法则，马克思称之为“拜物教”，坚持这种价值体系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真的成了动物世界。

在这种低水平价值体系主导下，人们舍本逐末，无法正确应对现实问题。比如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中国在武汉“封城”的做法是“侵犯人权”“反应过度”“这种做法在美国是违宪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这就把西方话语体系的狭隘片面彻底暴露,让人们看到了究竟哪一种政治体制才是有效的体制。从各国抗疫的情况来看,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在病毒面前不堪一击,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撒谎、瞒报、欺骗民众、转移矛盾上,在中国已经把疫情控制住的时候,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确诊人数一路飙升。

如果人们没有能力反思自己潜意识深处的价值体系问题,也就无法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束缚,也就不能合理行动,既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代表社会利益。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双重标准,中国贪官的“两面人”现象,还有顽固的历史虚无主义等诸多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个人品格上的缺陷,其根源都在于价值体系的狭隘性、片面性。这些人虽然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国度,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顽固地坚持低水平价值体系,把它视为“普世价值”,却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要坚持它。正是这种对低水平价值体系的非理性信仰,使他们不能合理行动。我们要解决历史虚无主义,要根除党内腐败现象,就必须摧毁“公知”和党内腐败分子对这种价值体系的迷信;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要揭露国外敌对势力坚持的价值体系的狭隘片面。理解便是克服,价值体系的转变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根本转变。

(二) 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

要构建新的话语体系,首先要摆脱第三级范式的束缚,认识到价值体系问题的存在,并接受新的价值体系。但这还不能算是完成任务,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跳出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这个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隐藏得更深,因而更难突破。

处于第三级范式的控制之下,人们虽然意识不到价值体系的存在,但实际上仍然在坚持着某种价值体系。而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下人们所坚持的价值体系往往是那种低水平的价值体系,同时也正是这种在无意识状态下的坚持才是最顽强的坚持。考察这种低水平价值体系对人的控制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个体价值体系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有一个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超循环”过程。就像核酸RNA和DNA与蛋白质的关系,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个互为因果的闭合圈。人们的价值观的狭隘片面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在这种狭隘片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人们就认为这种狭隘片面是正常的,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行动又进一步强化了环境的狭隘片面,于是就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互相强化的“超循环”。

价值体系“超循环”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是一个很坚固的东西,正是这个“超循环”把个体与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超循环”的存在,个体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并非仅仅发生于个体身上,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它在社会价值体系的大环境中形成,受其制约。社会价值体系形成于无数个

体的价值体系的相互作用，并在它们之上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反过来又控制着个体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如果低水平价值体系形成了“超循环”，就会控制每个人的头脑，把社会运行锁定在低水平轨道上。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处于这种“超循环”之中，人们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行为颠倒混乱。

知道了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存在，我们也就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揭示各种文化现象背后最基本的规律。所谓文化，也就是价值体系超循环过程，它的形成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各种目标与规则在人类有意识行为的互相作用中形成，最后形成的结果却不受人类自觉意识的控制，因而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人们对现有价值体系“超循环”适应良好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当人们对现实不满意并想换一种活法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各种宗教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团团围绕并力图解决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由于它们没有明确提出价值体系超循环问题，所以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如古代的隐士和佛教徒，在不改变这个“超循环”的前提下，为了追求心灵的解脱而躲进深山老林，最后都会发现，这种解脱是一种幻觉。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①

马克思还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② 时代精神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了价值体系超循环，也知道它有一个进化过程，就可以发现，时代精神亦即价值体系超循环在进化过程中所达到的高度。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超循环之中，谁也不能跳出这个超循环，因而每个人都是价值体系超循环的产物，因而葛兰西断言：“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③ 虽然有很多人并不像专业哲学家那样知道许多哲学术语，但他们确实都处于价值体系进化亦即哲学发展的某个阶段。理解便是克服，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对自己头脑的束缚，克服那种认为自己是站在价值体系演变进程之外的独断论，用儒家“大学之道”的术语来说就是“格物致知”，就是“闻道”，用葛兰西的话说是“批判自己的世界观，就是使它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把它提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界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④

认识了这个价值体系“超循环”，我们也就抓住了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根本，一通百通，纲举目张，更好地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比如说，为什么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而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用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③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④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济基础决定论来解释,就很难自圆其说,所以就有人辩解说历史规律也会有例外。如果发现了价值体系“超循环”的作用,这些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这是因为在那些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人民群众的生存难以为继,支撑旧制度的价值体系无法继续控制民众的头脑,先进价值体系就有可能乘势而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形成了“超循环”,牢固地掌控着社会运行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隙可乘,无法撼动和取代其地位。

再比如说,为什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在生产力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反而崩塌?那是因为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不能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稳定的“超循环”,而是率先垂范地倡导低水平价值体系,使之形成了“超循环”,在此基础上,其社会主义政权注定要崩塌。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我们身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铁腕反腐,打老虎拍苍蝇,做了大量工作,为什么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其原因就在于低水平价值体系在官场形成了“超循环”,形成了滋生腐败分子的温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干部的头脑与行动,如果没有强大的定力,很多干部就难以抗拒。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①,这是根除腐败现象、扭转被动局面的治本之策。要做好这件事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就必须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形成稳定的“超循环”。

再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例,我们这些年来高度重视,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成效不大,甚至出现种种“顽瘴痼疾”呢?这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高校乃至整个教育事业舍本逐末,忽略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小学追逐升学率,高校追逐的是规模与排名,盲目照搬西方教育模式,鼓吹所谓的“校长治校”“专家治校”“教授治校”,在各种借口与幌子之下抵制党的领导,放纵私有制价值体系扩张,使学术圈也变成了名利圈,“专家”“教授”也利用手中的权力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有的甚至甘愿充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的传声筒,这样的人招摇过市,使利己主义价值体系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超循环,控制了高校的运行过程,所以出现了种种“顽瘴痼疾”。在这种“超循环”越来越强化的过程中,那些承担思想政治教育职责者的价值体系就存在问题,又怎么可能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呢?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和改变这个“超循环”,要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那就只能是缘木求鱼,投入越多,问题越大。

再以互联网为例,在这个信息自由传播的虚拟世界中,高雅严肃的内容步履维艰,粗俗下流的内容无孔不入,这是因为后者诉诸人的低层次欲望,能够吸引“眼球”,带来“流量”,然后进一步强化人的低层次欲望,人们沉溺于各种短视频、游戏和娱乐节目,看到的都是各种荒唐和妄想,于是在信息源与受众之间就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

形成了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越来越发达，人的心智却越来越退化。

知道了这个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存在，我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一片混乱，那是因为低水平价值体系越来越强化，形成了稳定的“超循环”，控制着人们的行为。它毫不怜惜地碾压人的生命，不仅束缚人的眼睛与心灵，使人们狭隘片面、颠倒迷乱，而且践踏人的尊严，使人们焦虑孤独，深陷虚无主义的迷茫之中，并以无数个体的痛苦生命来强化自身，维护自身的统治，即使人们发现了危险，也无法挣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走向毁灭。

个性的充分发展必须借助于充分发展的社会价值体系“超循环”，因而人们只有在自觉推进社会价值体系“超循环”进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才能最终进入自由王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突破了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精神控制，自然也就知道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力量——价值体系“超循环”，那种自发形成的价值体系“超循环”总是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驾驭这个价值体系“超循环”，就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能够驾驭这个“超循环”的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驾驭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形成“超循环”，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知道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们自然会发现自己所应承担的一个重大任务：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投身改造旧世界的伟大事业，自觉推动能够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形成。只有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超循环”稳定运行起来之后，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稳定下来，个体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二、儒家“大学之道”是突破“两个束缚”之道

我们要建设新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突破认识论范式的束缚，然后还要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的束缚。怎样突破这“两个束缚”呢？只有这样来提出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儒家君子文化的重要价值。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历史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还有一个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对君子人格的追求，亦即对“闻道”的追求。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中国人发展出了一门叫作“心性之学”的大学问，其中最核心的精髓就是“大学之道”，它为人类突破认识论范式和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提供了方向与路径，这是中华文明的独到优势。

（一）闻道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要突破认识论范式的束缚，单个人就可以独自完成。比如说马克思这样的伟

大思想家,就可以完成这个突破并创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但要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则无法由单个人独自完成,这个突破过程是一个社会集体过程,必须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来完成。哪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呢?环顾全球,也只有中国能够担当这项责任,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手中有两件珍宝,一是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二是有老祖宗留下来的“大学之道”。

前面介绍过哲学发展的四个范式,中国哲学是早熟的,很早就进入了第四级范式即知行论范式。与西方哲学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哲学一直在知行论范式的高位运行,中国人也研究本原论问题、善恶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但中国哲学的主旋律是知行论问题,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孔子说“君子遵道而行”,所研究的都是价值体系问题,人们常说中国文化早熟,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方略,其原因也在于历代圣贤在对大道的漫长追寻过程中留下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

纵观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对道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从老子所说的“道”,演变到《中庸》所说的“天命”、程朱理学所说的“天理”,再演变到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最后演变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过程。我们现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遵道而行。我们可以把这个从道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演变过程概括为“道即价值体系论”。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中就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圣贤所说的“道”就是中国哲学的根,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就是这个根上长出来的新芽。知道了这个传承关系,我们也就可以深入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现在的“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自觉传承与发展。

我们还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就在于它与中华民族这一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内在契合,它们都力图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束缚。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深刻契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融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飘荡在空中的“幽灵”,无法进入社会运行过程。由此也可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则是进一步推动这个闻道过程,不仅是个体的闻道,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集体闻道。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二）“大学之道”即是突破低水价值体系“超循环”之道

正是由于中国人长期追求大道，所以能够发展出一门独特的学问，那就是“心性之学”，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儒家“大学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漫长发展过程，也就是对道的深入理解过程。君子的生命历程，就是体道、悟道、得道的过程。这个体道悟道、遵道而行的过程，也就是沿着“大学之道”向上走的过程。

《大学》第一章对“大学之道”进行了概述。关于这一章的内容，古人有很好的概括，那就是“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构建一个理想社会，就必须培育完美的个体，而这个培育工作首先要从个体的觉悟开始，在“三纲领”中就是“明明德”，在“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然后才能“诚意正心”，进而“修身齐家”，由近及远，由家而国，直至达到“止于至善”和“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修身”是“本”，“治国平天下”是“末”，如果在“修身”这个环节没有做好，要想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结果，那就根本不可能。

“大学之道”的道理并不复杂，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是对于“格物”的理解。古人行文辞约义丰，考察古代典籍中关于“物”的含义，有大量的例证表明，它本来就包含“道”，或者说它有着社会价值体系的含义，如《易经》中的“厚德载物”“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楚简《民之父母》中的“物之所至者，志亦至焉”，其中的“物”都可以解释为价值体系。还有庄子的《齐物论》，实际上就是一部深入研究价值体系问题的专著。因而《大学》所说的“格物”，即是对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辨析或反思，进而对与之相联系的整个社会价值体系“超循环”过程进行反思。所谓“致知”，也就是“闻道”，认识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然后就可以进一步地把它确立为自己的信仰，“诚意正心”，沿着“八条目”的顺序一路走下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这样来解释，不论在儒学义理上还是在文本上，都可以融会贯通了。

“大学之道”的道理并不复杂，为了更直观地表示，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坐标图（见图1），其中横坐标标示人的年龄，纵坐标标示人在自我实现上达到的高度，原点以上分别是“生理成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原点以下标示的是人们堕落的程度，分别是“危害自身”“危害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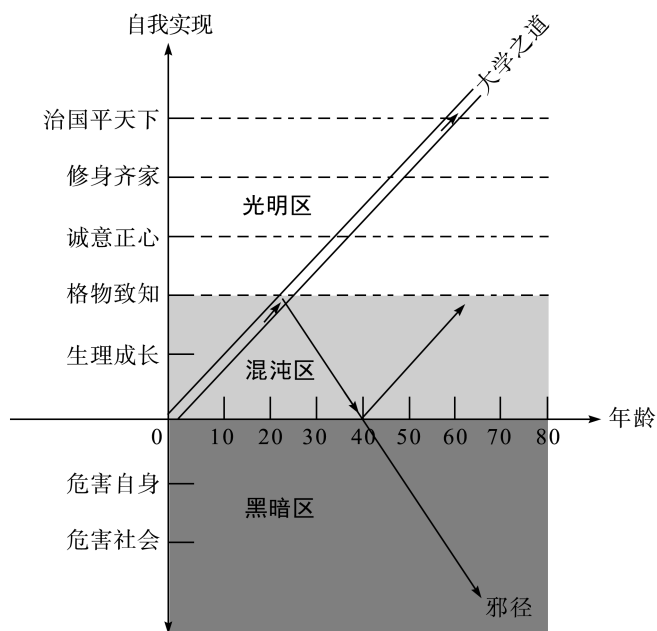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之道”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分为三个区——“光明区”“混沌区”和“黑暗区”，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上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光明区”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混沌区”里的人都戴着一顶无形的大草帽，他们看不见上面的区域，只看见自己眼前与脚下的区域，以为那就是人生的全部内容，所以便处于独断主义的迷雾之中。他们深陷在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旋涡之中，晕头转向，之所以对私有制价值体系抱有绝对的信仰，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它，这个信仰潜藏于其潜意识深处。所有的庸人，无论是美国的政客，还是中国的贪官，他们都处于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控制之下，都没有经历过“格物致知”环节，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对自己的价值体系高度自信。还有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网上所谓的“恨国党”“带路党”，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缺少自信，但在坚持私有制价值体系时却高度自信，认为它是“普世价值”，不容置疑，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独断主义。如果不打破这种独断论，他们就只能是井底之蛙，一直在“混沌区”里折腾。

人们要想跳出“混沌区”，那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它为人跳出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提供了向上攀登的“梯子”。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唯有人们内心深处价值体系的转换提升，才能给个性成长与社会运行带来新东西。中国古代圣贤所说的“闻道”，亦即突破“格物致知线”，通过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认识到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从环境中接受的价值体系是有缺陷的，进而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精神控制，为自己找到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所有人都必须走上“大学之道”，才能跳出“混沌区”，这是唯一的解脱。

之道。人们通常把生活在“混沌区”与“黑暗区”的人称为“经济人”或者“庸人”，为了与这种人有所区别，我们可以把生活在“光明区”的人称为“光明人”。人们一旦走上“大学之道”，完成了从“经济人”到“光明人”的人格提升，其文化自信才有了可靠依据。

（三）“光明人”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联系

“大学之道”既是突破认识论范式束缚之道，同时也是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束缚之道，因而我们说“大学之道”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道，亦即文化建设之道、人类解放之道。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类有些特别优秀的个体完全有可能特立独行，独自突破“格物致知线”，进入“光明区”，也有可能突破“诚意正心线”“修身齐家线”，却不可能独自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于是我们发现，“大学之道”所说“治国平天下”，其终极目标也就是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经过漫长的酝酿发展过程，只有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才能最终把这个任务提上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①只有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略之后，我们才能发现“大学之道”的重要价值，才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那就是中国人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最前列，抓住了最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问题。在形成稳定的“超循环”，主导了社会运行过程之后，社会主义制度也就进入“无为而治”的高级阶段并最终稳定下来。

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对这个历史传承过程有一个全面了解，就必须实际地进入“光明区”，在精神上成长到应有的高度。德国科学家海克尔提出了一个名为重演律的学说，它认为个体发育就是系统发育的短暂而又迅速的重演，按照同样的逻辑，人类精神进化过程同样要在个体精神成长过程中“重演”一遍，我们要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过程“重演”一遍。要踏上这条人类精神向上成长之路，我们就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攀登，认识人的“天命”，认识“天理”与“良知”，然后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最终到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由这个成长过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个体成长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的意义,那就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实现自身的“天命”。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无非要实现自己的“天命”。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大学之道”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大学之道”即民族复兴之道;对于个体来说,“大学之道”即实现“天命”之道,以往的人们必须走上“大学之道”,才能成为君子;对于新时代的人们来说,同样也必须走上“大学之道”,才能从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下脱颖而出,这样的人自然就是君子。

当我们走上“大学之道”,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光明人”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联系。列宁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社会的。”^①套用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充斥着“混沌人”的国家也建不成共产主义。以往的政治学对人性成长与社会制度进步之间的有机联系视而不见,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论述也完全适用于这种庸俗政治学:“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②通过揭示这种有机联系,我们可以找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那就是引导人们走上“大学之道”,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由“混沌人”成长为“光明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样的人越多,就越是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稳定运行的“超循环”。人们一旦走上“大学之道”,进入了“光明区”,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认同是最深层的人格上的认同。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也就找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哲学反思不到位,缺少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思,结果就跳不出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在两种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竞争中,不能自觉地有意识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命为“公知”而不能“自知”,所以就只能认同西方的那一套浅薄狭隘的价值体系,难以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不能合理行动,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问题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异化现象的根源,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制造对立、冲突、两极分化与动乱、灾难。在“大学之道”图上(见图1),他们没有进入“光明区”,深陷在“混沌区”或“黑暗区”里。这种人之所以不知珍惜社会主义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没有踏上“大学之道”,缺少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思,缺少了遵循中华精神成长过程的复演,缺少了对“天理”“良知”的体认,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思想成长的歧途,在“混沌区”里徘徊。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不足,自信地认为自己所知道的就是绝对真理,自己的价值体系就是“普世价值”,狂热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地要用自己狭隘片面的价值体系来改造社会。由于价值体系的狭隘片面，他们就把西方社会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们就身在中国心在西方。以应对新冠肺炎病毒为例，美国政客不管怎样折腾与失败，他们都认同拥护，中国的抗疫无论做得多么好，他们都不会满意。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说“所有的人都要改造”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①此后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②现在看来，他说得很对，为了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一个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都应当走上“大学之道”，进入“光明区”。只有在“光明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才会越来越稳定。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就可以说“大学之道”即社会主义稳定发展之道，亦即摆脱历史虚无主义之道。

基于同样原因，我们也还可以说，共产党人是“大学之道”的最终实现者。儒学即人学，“大学之道”即价值体系成长之道。人类为什么需要共产主义，那是因为它是与人的健全天性最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共产党人致力于建设这一社会制度，因而就是“大学之道”的真正实践者。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方略，要想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率先践行“大学之道”，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修之于身”，才能从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泥坑中爬出来，才能拥有值得坚持的价值体系。“大学之道”即共产党人自我革命之道，党性锻炼之道。在人们实际地走上“大学之道”以后，就可以发现，真正的共产党人必然是真正的君子，他们都生活在“光明区”，两者在这里融为一体，他们都是“光明人”。在这样的人格基础上，人们自然也就实现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假如有人自称君子而不认同共产党人，或者反过来自称共产党人而不认同君子人格，那就说明他的价值体系都还没有成长到能够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起来的高度，所以就仍然处于片面性之中，仍然重复着“盲人摸象”的故事。

三、坚守“大学之道”，构建新的话语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也找到了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的思路，那就是“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国学为根，也就是说要构建一个超越以往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新体系，构建者自身就必须率先走上“大学之道”。当我们沿着“大学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之道”进入“光明区”之后，一个“光明人”也就诞生了。庄子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按照同样的逻辑，有了这样的“光明人”，自然也就有了新的话语体系。一旦人们走上“大学之道”，就可以在价值体系上成长起来，突破了认识论范式和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新的话语体系不过就是这个精神成长过程的副产品罢了。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人们的眼界就越宽广，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就越全面、越深刻。

个体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是一个整体，“光明人”要实现自己的“天命”，就必须关注人类解放事业，推进人类“天命”的实现，所以就必须要对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就必须研究其他文明话语体系，研究它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建立一个兼收并蓄同时又超越了以往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话语体系，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也要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开辟理论发展新境界，此即综合创新。

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虽然我们有“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路，但从儒学传承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仍然存在许多误入歧途的风险。为避免这种风险，我们在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时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为人们提供科学合理的信仰，二是要注意构建方法。

（一）新的话语体系要为人们提供科学合理的信仰

任何一个话语体系，都必须包含有关生命意义的回答。我们构建的话语体系，要想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局面，就必须针对生命意义问题提出一个对所有的人都有说服力的答案，一个任何国家与民族都可以接受的答案，否则我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就无法进入人们的生命过程，这样的话语体系就是一个飘荡在虚空中的“幽灵”，没有生命力。

西方人喜欢批评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中国人面前产生出一种文化优越感。有些中国人也对这个问题疑惑不解，对于这种疑惑，我们必须澄清，所有的人都有信仰，宗教信仰只是种种信仰中的一种，而且是狭隘片面的信仰。费尔巴哈早已发现：“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①现在我们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立场上来考察宗教信仰问题，就会发现信仰也不过是人们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其中都有核心价值，因而所有的人都有信仰，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其中都有一个被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核心价值，区别就在于它能否引导人们超越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能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能否引导人们实现自己的天命，能否保证人们行为的合理性。正如拉兹洛所说：“人类的进化已经不是生物的而是社会文化的进化。成功的准则不是简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的再生产，而是合乎理性地思维与行动。”^①

所有的人都有信仰。如果用能否引导人类合理行动作为信仰的标准，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不仅有信仰，而且还是真正科学合理的信仰，那就是“大学之道”。

首先，“大学之道”为人类提供了科学合理的人生目标。“大学之道”摆脱了人格神的纠缠，这是中华文化的优势之所在。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神”，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神”。在我们看来，在每个人的生命之中，本来就有一个令人敬畏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天命”，一个可以在现世实现的目标。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扭曲、遮蔽，许多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天命”，追逐那些狭隘片面的目标，所以需要“大学之道”来引导人们走出这种困境。其他各种宗教也想承担这一职能，但它们不是诉诸人的理性，不是引导人们实现自己的“天命”，而是借助于虚构的上帝，用死后的天国与地狱来引导和恫吓世人，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宗教活动仪式上，引导人们节欲苦行，逃避社会责任，这就把人类引入了歧途，无益于社会与人生，等而下之的则把宗教变成敛财工具，变成了祸害。

其次，“大学之道”为人们提供了实现“天命”的路径。其他各种宗教也都想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不管是“佛”还是“上帝”，也都要为人们提供一个超越性目标，佛教讲“开悟”，基督教讲“因信称义”，都在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但它们没有为人们提供精神解脱之道，自称获得解脱的人们也无法把自己的体验传达给其他人，所以就依靠一些神秘主义的话术来欺骗信徒，谁要是按照他们提供的修行办法，就不可能实现“天命”，最终都要归于幻灭。“大学之道”与那些宗教信仰不同，它要求人们格物致知，通过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而认识大道，通过坚持遵道而行而正确履行各项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人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天命”，这是一条由“混沌区”进入“光明区”的唯一通道，因而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道，所以我们说它是科学合理的信仰。

“大学之道”具有与时俱进的潜能。在私有制刚出现的时候，与之相对立的价值体系随之产生，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这是历史发展的目标，当然也是各种哲学宗教学说应当达到的目标。但由于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各种哲学宗教理论由于各自的不同特征，就面临能否与时俱进、坚持到底的问题。以基督教为例，它把解脱的希望寄托于末日审判，寄托在死后进入天堂，在现世生活中，人与天堂永远无缘，所以它就不能指导人们合理行动，为了说服信徒，耗费大量的精力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后来就越错越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深入反思价值体系，不能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非但无法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反而被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背离初心，必然走向末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大学之道”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解答现实问题，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成长，因而具有强大的包容能力，能够吸纳和融会贯通各种哲学宗教理论的优秀成果，包括马

^① [美] E. 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闵家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克思主义,形成“集大成”的科学信仰。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说“大学之道”是科学合理的信仰,2000多年来,它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天命”的安身立命之道,它相信“途之人可以为禹”,因而是任何天性健全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人生目标;它就在人们自身之内,无须寻求外在的证明,只要人们静下心来,聆听内心深处的呼声,就可以发现它的存在。其他一切都可以虚无,都可以娱乐,但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却无法虚无,也不能用来娱乐。为了实现“天命”,人类就需要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所以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需要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奋斗过程。只要我们把这里的道理阐发出来,我们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有的人都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会自觉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事业自然也就具有内在的成长动力,蓬勃发展、高歌猛进。在此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构建的话语体系就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感召力、影响力,就可以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各国各民族就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 在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方法

儒家君子开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明确新的生活目标,制定新的行为法则,并诚意正心地付诸实践。但在表达上却相当随意,他们喜欢用一种语录体来表达思想,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后来的王阳明,都是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随机地做出解答,用尽量浅显的表达来阐发精深的道理,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觉悟。佛教里的禅宗甚至有一个明确的主张——“不立文字”,就是不凭借语言文字来解释、传授教义,其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采用“棒喝”的方法来启发初学者开悟,这就更加无法见诸文字。于是西方哲学家就误以为这里面缺少深刻的思辨,比如《论语》就被黑格尔嘲笑了一番,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

但实际上,孔子对道的深入体悟是西方哲学难以企及的,这种安身立命的哲学恰好正是那种最深刻的哲学。大道至简,我们要构建一个能够推广到全世界的话语体系,一方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用最简洁的话语传达最深刻的人生智慧;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哲学家的方法,遵守推理规则,构建一个严谨的没有内部矛盾、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一个可以检验的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

理论需要形成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9~120页。

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① 要避免这种困境，我们就要像笛卡尔那样，“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②，通过普遍怀疑，清除一切传统的偏见和一切可疑的知识后，然后得出无法怀疑的“第一原理”，再按照推理的规则，一步步地推理，建立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如果与“大学之道”对比一下，我们便可以发现，笛卡尔的这个普遍怀疑其实也就是“大学之道”中的格物致知。格物即对价值体系进行辨析，包括反思自己潜意识深处的价值体系，也包括反思社会环境中的价值体系，这也是一个普遍怀疑的过程，必须打破那种把现在的价值体系视为天经地义的独断论，人们才能致知，认识到大道的存在，这在笛卡尔那里则是找到“第一原理”。在这两个话语体系的起点上，哲学家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笛卡尔虽然有正确方法，但他找到的“第一原理”却有问题。他的“第一原理”是“我思故我在”，其问题就在于它的贫乏，把人的生命过程抽象为一个思考着的大脑，支撑着这个大脑活动的人的生命过程被抽象掉了，支撑人的生命过程的社会进步过程也被抽象掉了。前提决定结论，由于其“第一原理”的贫乏，所以笛卡尔的理论体系是贫乏的。相较于笛卡尔的贫乏，“大学之道”的“格物致知”则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这里的“致知”所“致”的是什么“知”呢，那就是大道，后来的哲学家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深入阐发，依次演变出天命、天理、良知，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则演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现在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仍然是“格物致知”，也就是反思自己头脑中的价值体系，把原有的价值体系清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迎接进来，然后还要诚意正心地付诸实践，修齐治平，一直沿着“大学之道”向上走，由新的价值体系带来新的实践，由个体的新的实践带动社会的新的实践，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超循环”，当这个“超循环”稳定地运行起来之后，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最终稳定下来。

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相比，“大学之道”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视野，不仅可以解释个体的生命过程与整个社会历史过程，而且精确而简洁、逻辑自洽；不仅能够为个体提供生命意义的科学合理的解答，而且能够为各种社会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为各种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不仅是人生的说明书，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路线图，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才能越来越像一个人，实现人的“天命”。在每个人都沿着“大学之道”向上的过程中，社会集体才能不断进步。它所概括的上述基本原理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巨大潜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中庸》）。这个“第一原理”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在它面前，所有虚假狭隘的话语体系都相形见绌，以它为“第一原理”，按照推理的规则，推导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不仅可以吸收中华

①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② [法]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页。

文化精髓,而且可以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一个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的话语体系。显而易见的是,要做好这件事情,理论上的推理是必要的,逻辑规则也是必须坚守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忽悠人的理论,故意把推理的大前提隐藏起来,用一套天花乱坠的话语把它包装起来塞给人们。要识别他们的骗术,那就要找到它的“第一原理”,看它是否科学合理。但必须强调的是,话语体系不仅应当逻辑自洽,而且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它必须能够引导人们合理行动,实现人的“天命”。理论自洽标准与行为合理标准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最终要统一于人们坚守“大学之道”的实践,新的话语体系的建设过程实际上是人们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攀登的过程。

新的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其实也就是新的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形成过程,不仅理论家要坚守“大学之道”,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乃至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当坚守“大学之道”。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所能独自完成任务,这是一个社会集体的进步过程,所有的人都要参与。如果只有少数领导与专家攀登“大学之道”,而没有社会大众参与,那么构建出来的话语体系就没有生命力。英雄与人民、领导与民众的区别就在于在“大学之道”的攀登上所达到的高度不同,所有的人都应当走上“大学之道”,这既是深藏在人性深处的内在冲动,也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也就是《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就需要运用执政权力来做好人民群众的引导教育,执政权就是教育权,只有在大多数中国人走上“大学之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形成稳定运行的“超循环”,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的话语体系才能成长起来。这样形成的话语体系,就形成一种“势”,具有影响世界的力量。

现在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运用执政权力来驾驭价值体系“超循环”,还有“大学之道”,可以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因而我们正处于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的最有利时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是机械的自然必然性,这是因为价值体系“超循环”的运行并不遵循那种机械的自然必然性,人类要避开自我毁灭的悲剧命运,就必须把它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所以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下决心摆脱研究思维与存在关系哲学范式的羁绊,勇敢地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立时代潮头,通古今之变,对旧的话语体系来一次彻底的清理,进而以“大学之道”为第一原理,融会贯通,发展出一个完善的话语体系。“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其中的“根”只能是中华文明成长过程的内在逻辑,必须发展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才把最重要的价值体系问题呈现出来,于是我们才能发现儒家“大学之道”的重要价值。由于“大学之道”本来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它为“第一原理”构建的话语体系,自然也就具有了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此即《论语》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Sinology as the Root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Build A Discourse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ue Dechang

Abstract: To build a discourse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break through the old discourse system. First, we must break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he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And then the shackles of the low-level value system “hypercycle”. To break through these two shackles, the Chinese nation has unique advantages. One is that we have one of the deepest spiritual pursuits, which is “hearing the Tao”. The other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ao, we have developed a unique learning, that is “Xinxing”, whose core content is “The Way of the Learning”, which provides the direction and path for mankind to break through the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and the control on the “hypercycle” of private ownership’s value system. “The Way of the Learning” is the way of build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s well as the way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To build a new system that surpasses all previous discours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builders themselves must first embark on the “The Way of the Learning”.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solving two problems. One is to provide humans with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beliefs. The other is to find a new “first principle” and derive a logically self-consistent theoretical system. All questions can be answered in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adherence to the “The Way of the Learning”.

Keywords: Discourse System; Philosophical Paradigm; The Way of the Learning

论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天人合一”^{*}

隋云鹏^{**}

【摘要】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实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天人合一”理论适应工业革命、工业化和工业社会而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一历史时代，自由作为最高文化信仰，是个体生命的安放人心之处。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这一历史时代人生意义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实践作为现存世界的真正本体，通过实践实现了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同一了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人民群众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华文化现代化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中华文化现代化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在文化大众化中实现文化现代化。

【关键词】安放人心；为人民服务；文化大众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天人合一”理论，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实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天人合一”理论适应工业革命、工业化和工业社会而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使命之一是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实现“天人合一”的螺旋式上升，以解决工业社会的安放人心问题，确立个体生命在工业社会的人生意义，从而为工业社会的个体生命提供文化支撑、精神指引、人文关怀和心灵温润。由于中华文化现代化处于世界市场和全球化时代，其“天人合一”的新发展也因此具备了世界意义。

一、在自由中安放人心

天人关系的实质是人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在关于天人

^{*} 本文系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论文集入选论文。

^{**} 隋云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系的思考、体悟和实践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论，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时至今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世界已经进入彻底的唯物主义时代，天人关系由天文与人文的关系转变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物、人与科技、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成为时代课题。要解答这个时代课题，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人合一”理论尤其是心性之学提供了有益借鉴：人与外在关系的解决取决于人与自我关系的解决，人与自我关系的解决取决于个体生命的人心如何安放。由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①，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安放人心问题，注重个体生命精神境界的升华，以发挥人的内在世界或者说精神世界对外在世界的积极影响和主观能动性。例如，孔子强调“仁”，主张“从心所欲，不逾矩”；《大学》强调“至善”；《中庸》强调“中和”，主张“执两用中”；孟子强调“人性之善也”，主张“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朱熹强调“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观点；王阳明强调“良知”，主张“心外无物”；《金刚经》强调“善护念”。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内因对事物变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将其运用到道德实践中。由于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十分讲究道德实践中的“克己”功夫。例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劝学》）。

历史上，首先提出“安放人心”这一哲学命题的是孟子。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又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认为仁是安放人心之处，学问之道是为了安放人心，而人生意义在于求仁，做仁人君子、成圣成贤。《孟子》与《大学》的思想一脉相承，《大学》第一章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学问之道即大学之道，仁即至善，做学问的目的是求仁，从而内心安定地走完人生。儒家认为圣贤、仁人君子人人可以做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大学》第四章还论述了安放人心的方法：仁体现在子女身上是孝，体现在父母身上是慈，体现在君主身上是仁爱，体现在臣子身上是恭敬，体现在人与人交往上是诚信，每一方面做到至善都是仁，都能安放人心。例如，孔融让梨虽然是一个生活中主动与别人分享的平常举动，但代表着无私无我的圣人境界——至善境界，而这样的道德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境界每个人都能做到。无私无我的圣人境界来源于天，每个人都能从太阳、月亮、北斗等天体的运行中看到这种精神境界。中国先民很早认识到天体运行是有规律的、理性的，这种规律或者说理性是以天体“诚信守时”表现出来的。例如，太阳、月亮、北斗等天体周而复始、东升西落，为人们兢兢业业地指示时间和节气，体现了刚健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人类要向天学习这种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实现人的精神领域的“天人合一”，“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周易·大有·彖》）。所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中华文化与生俱来的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人人不论高低贵贱和社会分工都有人生成功的希望与实现路径。所以，虽然安放人心问题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比较成功的。

宗教不存在安放人心的问题。对于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说，教宗教义自然是心灵皈依、安放人心之处。对于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宗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疗愈人心的麻醉作用。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虚幻的幸福，“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②。由于宗教还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长期存在，因此应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在这一历史时代，自由作为最高文化信仰，是个体生命的安放人心之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漫长的前世界市场时代，由于生产力长期缓慢发展，外在超越——社会革命迟迟得不到实质性突破，面对侵略性资本对民众生命的异化，文化巨人只能通过倡导内在超越进行反抗。在中国传统社会，儒、释、道都主张用精白道德对抗物欲世界，“天人合一”的实质是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和解。例如，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把“太极——理”作为宇宙本体和安放人心之处、人生意义所在，限制个体生命的不合理欲望。王阳明强调“致良知”，把“心——良知”作为宇宙本体和安放人心之处、人生意义所在。在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也把“理”作为宇宙本体，但他们过于强调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体生命命运的客观必然性。黑格尔在批判发展必然与自由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把人与世界的和解定义为自由，作为安放人心之处，“自由是心灵的最高的定性。按照它的纯粹形式的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发见它自己。就是按照这种形式的定义，有了自由，一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在世界里得到满足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已解决了”^①。黑格尔关于人与世界的和解或者说精神世界的自由，是形式上的或者说概念上的逻辑展开，缺少实现路径，既没有像宋明理学那样立足于精神境界或者说道德修养的提升，也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赋予自由实践性或者说革命性，“‘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②。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尤其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认识自由、把握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放是自由的同义语。为了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让个体生命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物、人与机器的关系中获得充分解放，从而获得真正的全面的自由，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进入了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同时推进的历史时代，真正的全面的自由成为安放人心之处。

二、在实践中深化认识

从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一直是农业社会。在此期间，天文历法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科学技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组织。由于农业社会生产的需要，虽然原始社会解体，但氏族组织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为宗族组织。受制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长期缓慢发展，人们的实践对象主要是以天文历法为主要内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与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论与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是人的思维领域或者说精神世界的“天人合一”理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论，是在道德实践中追求内在精神世界自由的学说。《周易》对君子精神世界的自由境界有一番描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周易·坤·文言》）孟子据此论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又进一步论道：“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阐明了在道德实践中由内圣而外王的君子境界。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强调实践和认识的同一性，强调两者的“合一”，这也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来源和主要特点。自北宋开始，随着儒学、佛学、道学在哲学上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心性之学在日益圆融纯熟的同

① [德]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时,也日益朝向主静、寡欲、空无的方向发展,穷理尽性、尽心知性、心外无物、发明本心、明心见性、心性不二等成为心性之学的基本概念和重要范畴,“理”“心”分别成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宇宙本体。针对这一倾向,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受制于时代条件,王阳明强调的实践主要是道德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心性之学朝向内在世界的发展方向。

自世界进入近现代史以来,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注重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更加注重矛盾统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统一,因为斗争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所以,“天人合一”理论需要同马克思主义融合发展、综合创新,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和斗争精神,在中华文化现代化中实现新发展。另外,“天人合一”理论的认识对象是二分,即天、人,或者说个体生命所在的外在世界、个体生命本身,或者说个体生命的外在世界、内在世界。天人之际的“际”即指个体生命外在世界、内在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通过天、人或者说外在世界、内在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达到外在世界、内在世界的同一、合一。天人之际也是天人相分的边界,而天是人力所达不到的地方。面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天的边界在不断退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对象则是三分,即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者通过实践实现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达到了外在世界、内在世界的同一、合一。文化巨人通过探讨天人之际的“际”,在广袤无垠、无边无际、无数无量的宇宙中,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个体生命确立了人生意义。

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实践作为现存世界的真正本体,通过实践实现了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完成了这一历史时代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同一,实现了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革命性突破,推动了人类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类进入了全面科学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发展的认识运动规律,为确立“实践——为人民服务”这一体用枢轴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无限接近,充满了人类认识能力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运动,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揭示了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永

恒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①。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我们认识、利用、驾驭这一历史时代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科学认识真正的全面的自由，提供了锐利武器，指明了实现真正的全面的自由的条件、方向、途径、意义，从而为中华文化现代化构建“天人合一”理论的最高范畴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为创立马克思主义自由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自由学说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自由学说通过实践打通人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实现了主客体的同一、合一，推动人类的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实现螺旋式上升，自由成为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最高范畴，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最高文化信仰，“天人合一”理论实现了新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自由学说通过“实践——为人民服务”这一体用枢轴，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宇宙的无限性同一起来，实现了个体生命在这一历史时代最大程度的解放和自由。

三、在为人民服务中确立人生意义

人生意义与安放人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确立人生意义才能做到安放人心。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这一历史时代人生意义之所在，是天下归仁、止于至善、致良知、博爱在中华文化现代化中的新发展。人民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根本标识。自人类有史以来，还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像社会主义工业文明这样把人民等同于自己本身。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是世界市场的产物，伴随着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它们打通了国家内部的壁垒、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和世界市场的壁垒，成为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世界性反抗。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君“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统治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资本主义民主相对封建君主的独裁统治是历史的进步，它逐步确立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建立了共和制、议会制、普选制、政党制等，从形式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民主，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②与资本主义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形式民主与事实民主相统一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注重政治上的民主，更注重经济上的民主，“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

^① 《列宁专题文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分配平等以及其他经济上的平等,就不会有真正的平等,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更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人权也得不到真正的保护。同时,民主与平等是同等概念,因为民主意味着平等。只有真正的民主、平等,才会让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自由首先是人民的民主、平等、自由。为人民服务意味着让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平等,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事实上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受制于规律同时也认识、利用和驾驭规律的历史。人类总是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家庭、成长过程、社会形式、生产力、时代等,总是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不自由的状态。例如,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会受到这个家庭的规律的限制;出生在什么样的时代,就会受到这个时代的规律的限制。他(她)的一切都会打上这个家庭、这个时代深深的烙印,而要摆脱这个家庭、这个时代的限制,就要认识、利用、驾驭相应的规律,付出相应的代价,才能获得解放和自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认识到阶级差别是人类不平等、不自由的根源:“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②由于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消灭分工,消灭阶级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③也就是说,“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④。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自由是指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利用和驾驭,代表人类社会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的最高范畴和最高境界,“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页。

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①。所以，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获得真正的全面的民主、平等、自由，从而让人人都有实现人生价值的希望、保障与路径，是个体生命在工业社会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以资本为主要内容并围绕资本展开的；个体生命的人生意义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服务，个体生命的一切归根结底以资本为指标来衡量。逐利性是资本的内在基因和根本属性，没有逐利就没有资本，因此资本天然具有侵略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反抗，资本会把整个世界——当然包括所有的个体生命都纳入它的统治范围。资本的侵略性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儒家的民本精神是死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根本目的和主要使命在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而对侵略性资本进行强有力的反抗。所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民性上是同一的，人民性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和根本属性，中华文化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中华文化现代化必须坚持文化大众化。

四、在文化大众化中实现文化现代化

中华文化现代化首先是时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这一历史时代是工业革命、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历史时代，也是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历史时代，中华文化的对象是迥异于农业社会的工业社会，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是创造迥异于农业文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当然，在中华文化的历次时代转化中，始终不变的是文化的功能、作用和影响：为个体生命提供文化支撑、精神指引、人文关怀和心灵温润。

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人类创造了无数的文化形态，以及无数的艺术形式。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书法、武术……文化、艺术以及哲学、宗教、人生意义等是人类社会自身演化的产物，离开人类社会则毫无意义，“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②。佛教徒、道教徒虽自称为“出家人”，其实也没有离开过人类社会，而天堂、地狱不外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的异化的别称；妖魔鬼怪则是个体生命的异化的别称。实际上，儒、释、道宗师们的精神境界愈高，愈悲悯众生的苦难，愈入世。虽然受制于时代条件，他们的学说缺乏革命精神，但大都充满了深厚的人文精神。侵略性资本对生命的异化没有底线，民众的苦难根源于阶级压迫和剥削，这也是侵略性资本造成的人类社会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

的最大的异化,“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同时,文化巨人虽然明了人类社会规律,却无法取消这个规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②。

为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劳动人民,各个时代的文化巨人对侵略性资本保持着强烈的警惕和反抗精神,他们因此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他们的人生之路也因此艰难而坎坷,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③。

儒家十分重视儒学大众化。“易简”理论可以说是儒家的大众化理论,“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系辞上》)。儒家从人类社会最常见、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入手,揭示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石——“五伦”,实现了儒学大众化。他们还根据人类社会规律与天体运行规律的内在联系,把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石——“五伦”与宇宙秩序联系起来,推天道以明人事,构建了农业社会的天人关系——“天人合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随着心性之学的兴起,“天人合一”内化为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境界,为个体生命提供了安心立命之所,儒学也成为个体生命“须臾不可离”的理论体系,实现了最大化的大众化。例如,王阳明从“易简”理论中受到启发,将“良知”这一最平凡、最常见、人人具足的概念确立为心学的核心范畴,构筑起自己的心学大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④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开始,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版序言,第9~1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④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

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①。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理论与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重视理论武装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先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文化的生命力根源于人民群众，只有那些与人民群众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精神指引、人文关怀和心灵温润的文化，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人民群众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华文化现代化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而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中华文化现代化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在文化大众化中实现文化现代化。

在文化大众化进程中，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文化大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儒学讲堂、孔子学堂、农家书屋、社区书房、基层党校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建设，深入调研基层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运用先进科技、移动智能、社会化服务等手段，创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模式，加强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日常供给，解决基层人民群众日常优质文化活动不足的难题，打击非法传教活动和邪教活动，实现文化事业的“基层突破”“实践突破”。在文化大众化进程中，还应注重培育健康向上的世界级流行文化。二战结束后，西方流行文化在塑造西方软实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刻影响着世界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配合西方政治战略瓦解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敌对政权。加强文化产业、文化工业，尤其是流行文化工业的培育，大力发展流行电影、流行音乐、流行歌曲、流行动漫、流行艺术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O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ui Yunpeng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refers t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theory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particular, with the aim of adapting to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 freedom, as the the highest cultural belief, becomes the spiritual home for man's soul of each individual. Serving the people is the core value of socialis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living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 Writers of Marxist classics regard practice as the real body in the existing world. Practice enables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world of man, thus unifying these two worlds. People are the main forc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e cannot separate ourselves from the people; rather, w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all for the people, all relying on the people and shared the fruits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by the people and achiev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cultural popularization.

Keywords: Spiritual Home for Man's Soul; Serving the Peopl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简论

郝玉萍 谢元态*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丰富而深厚。本文在“协和万邦、天下为公”政治观、“义利合一、重义轻利”经济观、“和而不同、万物并育”文化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态观、“和合共生、德化慎战”安全观的大框架下，分别阐述了其传统文化渊源与传承，同时论证了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传统文化；天人合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创新。“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涵量广博、底蕴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的处事之道和施政理念，通过从中汲取精华和营养找寻同当今时代精神、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契合点、共鸣点。”^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凸显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治国理政提供了全新的理念，而且也为世界化解危机冲突和促进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一、“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的政治观

（一）“协和万邦”“天下为公”政治观的渊源与传承

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天下观”。中国人自古崇尚和平，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记载，主张国与国之间要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如此便能实现世界的繁荣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崇高的政治理想。

* 郝玉萍，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9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谢元态，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转型经济。

①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中国古人普遍追求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这首先是基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升华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①，然后又引申出处理政务与人事的重要法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②即能明察才德者，既能使同族人亲密和睦，又能够辨别和表彰行善事的百官，诸侯各国的关系自然可以得到协调，继而实现万邦和谐。儒家主张亲仁善邻，“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③。意思是说，如果远方的外族人不归服，就修养礼义仁德招揽他们，一旦他们来了，就要好好安顿他们，主张以仁德感化外族，反对盲目诉诸武力。^④道家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天地”为基础的政治主张，认为顺应了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天下自会和谐安定。《意林》深化了对“世界大同”的认识，主张在政治生活中应当坚持“和而不同”，“君臣亲而有礼，百官和而不同，此治国之风也”。这种观念对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和道家共同追求的“天下观”，超越了狭隘的国家观，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宽广胸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文化渊源。^⑤

近代以来，“协和万邦”思想得以传承。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世界大同，人人生而平等，并无阶级之分，即“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孙中山也倡议“天下为公”，认为国家的主人应当是全体人民，主张实行三民主义，以实现“公天下”。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协和万邦”思想，不论是李大钊、毛泽东的“大同世界”思想、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判断，还是江泽民“国际秩序新理论”的观点和胡锦涛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论述，都是对中华民族“协和万邦”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二）“人类政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为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人类政治命运共同体强调以合作促和平，是对中国传统“协和万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扬弃与超越。近代以来，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将弱肉强食、赢者通吃奉为生存之道，是一条以掠夺为主要手段的殖民道路。尽管这条道路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西方国家追求胜者通吃，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使者”，而视其他民族为劣等民

① 刘广昊：《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党政领导思考》2015年第12期。

② 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2015年重印），第3页。

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2002年重印），第172页。

④ 参见陆卫明、孙喜红：《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⑤ 孙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文化根基》，《人民论坛》2020年第18期。

族，把其他国家视为奴役的对象，这人为地恶化了地缘政治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冲突。针对国际政治格局的严重不公平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习近平从全人类共同利益角度出发，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打破了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恶性竞争思维，超越了政治制度、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差异，为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提供了全新的价值遵循。

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和谐，中华民族向来追求和平，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贵和理念牢牢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中，集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①。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贯彻于中国外交实践的始终。随着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提升较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捍卫它们的国际话语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无论是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处理国际事务，还是践行“不冲突不对抗”外交理念，都是中国“协和万邦”思想和“人类政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证明与现实体现。

二、“义利合一”“重义轻利”的经济观

（一）“义利合一”“重义轻利”经济观的渊源与传承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纵观中外历史，积累财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通过百姓辛勤劳动来积累财富；另一种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通过暴力手段抢掠他国财富。中国人向来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虽然承认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但又强调不义之财断不可取。

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义利观，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均有研究。儒家强调重义轻利，并将重义和重利视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如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认为君子能够明白道义上的是非，而小人只能明白利益上的得失。同时，孔子也明白物质利益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因此并不排斥追利，而是提倡义以生利。孟子对孔子的义利之辩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将怀义与怀利视为是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并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③，因而要去利怀义。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义

^① 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8 日。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2002 年重印），第 39 页。

^③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265 页。

利思想,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①的荣辱评判标准。道家的无为而治内涵丰富,对待义利,同样主张无为。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高度体现了道家主张的道德情操。庄子不但遵循了老子的义利观,而且与孔子的君子与小人之辩和荀子的荣辱之辩如出一辙,认为:“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②可见道家的义利观与儒家基本一致。墨家的义利思想则与儒家有所不同,墨子主张言利,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认为就像“爱”是相互的一样,“利”与“义”是统一的。墨子的这一主张虽然与儒家主张的追“利”势必会妨碍追“义”的主张不同,但都同时强调“仁义”。

对待传统的义利观,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没有全盘吸收,而是进行了批判继承。李贽的义利观融入了“公平正义”原则,认为“正义即是谋利”,肯定了追求私利的正当性。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观认为,工商业与农业在社会财富增值中同等重要。王夫之提出“天下之公欲,即理也”,认为人人共有的欲望即“公欲”,也就是“公理”,“公理”的实现就是人们共同利益的满足。他的这一思想分辨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及其追求的关系,属于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二)“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利益至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重利理念被视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天经地义”的不变法则。在这种“唯我为上”“唯利是图”的价值观驱使下,各国为了争夺利益不惜结盟对抗,导致局部战争频发。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倡导各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追求我多你少、我赢你输,而要义利兼顾,双向共赢。^③“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强调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可以说,“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就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重义轻利、先义后利道德准则的继承和当代阐释。因而,“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义利观,而且也包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义利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义利观的丰富和发展,彰显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实现合作共赢价值观的坚定追求。

坚持正确义利观和建设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要体现在处理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践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共同体”,中国外交政策追求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尽管国内与国际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多变,但是中国始终倡导包容性发展,指出各国应走合作共赢的道路。从国内看,中国致力于让发展成果惠及所

① 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页。

②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2页。

③ 参见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

有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成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从国际看，中国致力于促进全球减贫，破解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难题。即便是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也开始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帮助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近四十年来，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无论是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还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抑或是发起“一带一路”倡议，都表明了中国坚持合作共赢，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的坚定决心。可见，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实现国强民富和人民幸福的核心价值观遵循，而且也能为各国处理经济关系从而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提供了国际行为准则。

三、“和而不同”“万物并育”的文化观

（一）“和而不同”“万物并育”文化观的渊源与传承

和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和而不同是和文化的基本处事原则。早在西周末年就有和同之辩，如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①，意即只有不同的事物和谐共处，世间万物才能丰硕成长，如果完全一致则无法发展和继续；只有多样的统一才是实现真正的和。后来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②，指出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君子认同有差异的和，而小人认同的则是无差异的同。老子对“有无”与“难易”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思维。他首先肯定了对立是事物之间的常态，但同时又认识到事物之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道德经》中他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因为事物的有无与难易往往是相互融合的，并且是可以相互统一的，因而看似对立的事物，往往存在对和的共同追求。《礼记·中庸》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对立统一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南朝史学家范晔则更为强调事物统一性的一面，正所谓“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即使出现极端的情况，也完全可以“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意即君子能够求大同而存小异，争取最大的团结，又允许不同的意见存在。哪怕是面对“过”或“恶”，也要尽量“救过”或“匡恶”。

经过长达千百年的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在近代仍然闪耀着奇光异彩。张岂之对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做出了新的诠释，主张将“同一性”分为两种：一种是否定差异的同一，古代称之为“同”；另一

① 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73页。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2002年重印），第141页。

种则是肯定差异的同一,古代称为“和”。^①我们所说的“和而不同”就是肯定差异的“和”,就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同一”,在保留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优秀文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坚持唯物辩证的“两点论”,认为“一万年都有两点”。他在论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才能够“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这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极好阐释,认为我们既要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也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共同维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百花园才能繁花似锦,人类文明才能丰富多彩。

(二)“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未来文化冲突将取代经济和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和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二战结束后,随着西方文明绝对优势地位逐渐衰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通过向他国倾销文化产品等手段来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通过遏制和侵蚀他国文明来维持文化霸权地位。时至今日,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观念依然可以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习近平强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②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尊重文化多样性,在差异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发展。只有构建“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多样性的文明形态才能得以保存,文明隔阂与文明冲突才能趋于消弭,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才能得以加强。“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对于打破文明冲突论、消弭文明隔阂、遏制文明冲突、增进文明交流具有积极意义,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文化观,而且也助力世界文明前进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下,只有在“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坚持“和而不同”,才能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这是习近平主席一贯坚持的主张,并且在多次讲话中指出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学习借鉴。只要大目标不冲突,各国就应当尊重文化上的“和而不同”,只有承认和包容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和共存共荣,最终进入“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① 参见张岂之:《我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孔子研究》1986年第3期。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更加积极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也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中国文化精品纷纷走出国门,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窗口。用文学作品讲好中国故事,用影视作品传播中国声音,中国文化精品的对外输出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华文化魅力和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孔子学院等文化对外传播平台在各国纷纷建立,伴随着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大量优秀国外文化也被“引进来”。这“一进一出”的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各国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且也进一步拉近了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减少了阻力。

四、“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

(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态观的渊源与传承

中国古代先贤向来把天地、自然看作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尊重自然、敬重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

道家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并且富有深刻哲理。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重要思想命题,主张人们应该顺应和效法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天、地、人”思想,强调天道乃自然之道。他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主张人类应该顺应天道,不要刻意去追求个人欲求而破坏自然之道。道家还视自然规律为常,强调“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③,告诫人们正确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将“妄作凶”。

“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的根基,孔子也强调要尊重自然规律,他在《论语·阳货》中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④意思是说,天未曾说话,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表现了他对天的敬畏并且意识到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认为人性在于人心,故尽心则能知

① 王弼童:《道德经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9页。

②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页。

③ 王弼童:《道德经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页。

④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2002年重印),第188页。

⑤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1页。

性,^①而人性乃“天之所与我者”^②,因而“人”与“义理之天”是“合一”的。

尽管儒家与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态观的核心思想基本一致,但儒家肯定人为,即肯定人在自然面前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人具有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如荀子在道家视自然规律为常的基础上,认为既然天行有常,那么人类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又如,董仲舒对天、地、人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提出“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③,认为上天创造万物,大地养育万物,而人类则可以改造万物,于是“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④。对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⑤的主张,认为天与人自成一气,人和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再如,北宋张载“天人之本无二”与明代王阳明“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的观点,同样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正如毛泽东在《心之力》中所说:“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⑥

(二)“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人类中心主义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主导世界观。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主导下,诸如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才会层出不穷、频频发生。面对全球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⑦。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打破西方国家“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树立“天人合一”的正确生态观,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践行绿色环保、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继承,而且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生态理念的创新性发展;不仅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写进了党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将“绿色发展”确立

① 季羨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②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0页。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节选)》,周桂钿解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页。

④ 董仲舒:《春秋繁露(节选)》,周桂钿解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页。

⑤ 董仲舒:《春秋繁露(节选)》,周桂钿解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248页。

⑥ 韩毓海:《立国显始做宏略——青年毛泽东〈心之力〉特立独行倡“新学”》,《北京日报》2015年10月28日。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为新时代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绿色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功进入快车道，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论是塞罕坝林场的百万亩人工林，还是毛乌素沙漠的“止沙生绿”“人进沙退”，抑或是库布齐沙漠的人进沙退，都是中国为地球添绿所做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通过经济支持“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设立，主动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努力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与实施等一系列重大国际生态治理行动，中国始终以时代为己任，以责任为担当，为全球绿色治理提供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并且做出中国表率。习近平在2021年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又再次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① 综上所述，以“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经验，正在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样板和中国经验。

五、“和合共生”“德化慎战”的安全观

（一）“和合共生”“德化慎战”安全观的渊源与传承

中华文化历来坚持崇尚稳定、热爱和平的基本立场，提倡“和合共生”，反对穷兵黩武。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长期以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国民形成了“安居乐业”“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安全观。受这一传统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慎战”观念也深入人心。

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已经有了“尚武而不黩武”等国家安全观念。著名军事战略家孙臆提出“无备者伤，穷兵者亡”^②，倡导信义立国，反对轻易用兵，主张慎战。当时的思想家普遍反对穷兵黩武。儒家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认为好战的人应该受到最严酷的刑罚。道家认为“兵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③。意思是说尖兵利器不是君子经常使用的东西，主张不应用战争解决问题。墨家极力反对武力战争，强调非攻，并用“非攻”理念说服周边的诸侯兼爱，让诸侯主动放弃战争。兵家提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④，认为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正所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处理方式只会让双方两败俱伤。又说“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⑤，即武器是凶残的东西，是不可不慎用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兵家最高境界的“善战”上策。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光明日报》2021年4月23日。

② 张震泽：《孙臆兵法校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页。

③ 王弼童：《道德经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8页。

④ 王震：《司马法集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页。

⑤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页。

秦汉以后,“慎战”观念更加受到推崇,并深深地影响着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唐太宗主张以德服人,反对动用武力,其秉承“慎战”观念,通过“偃武修文”实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长治久安。宋太祖极力主张“崇文抑武”。元世祖忽必烈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附会汉法”,实行仁政,并经众多高官的补充完善逐步形成了元代安全观的思想体系。明成祖继承了墨家的“兼爱”思想,主张“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实现了明朝的一段稳定和辉煌。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有丰富的“战略”问题专论,强调:“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①但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又要“用战争反对战争”^②

可见,“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传统安全观的核心,而“德化慎战”又始终是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由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演变成“一超多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科技和军事第一强国,称霸全球。美国秉持零和、单赢的思维模式处理国际关系,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剧增,地区安全问题频发,人类安全面临严峻的考验。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到拜登对中、俄、伊等国的极力打压,其恶劣行径充分暴露了其维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狰狞面目。当今世界,霸权主义依然是困扰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霸权主义者从来只考虑自身安危而不顾他人死活,在这种不平衡不对等的安全条件下,世界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安全。当今世界风云激荡,面对世界政治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共产党人以博大的胸怀,始终秉承中华文化“和合共生”的“仁爱”安全观,坚持崇尚稳定、热爱和平的基本立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构想,强调既要注重自身安全,也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审视安全问题,以追求人类共同安全为目标。这种追求共同安全的理念摒弃了“你输我赢”的对抗思维,突破了“零和博弈”的历史局限,超越了霸权稳定论,是对传统安全观的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

中国始终秉持共享安全原则来处理国家间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努力为各国人民创造持久的安全稳定环境。”^③在“全球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参与各种热点问题的处理,坚持以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方式推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反恐、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③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

护网络安全、抗击疫情等国际合作，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国际维和与安全保障。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抗疫行动和为他国提供经验与帮助的行为就是中国践行“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证明。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再次强调，处理全球气候问题，各国不但要坚持“多边主义”原则，而且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①

六、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理论价值深刻，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普遍联系的辩证思维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应用，内涵极为丰富，具有哲学、经济学、社会性、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重要理论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创造性结合的理论创新。作为一种以应对全球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方面，是对中华传统天下观、利益观、文化观、生态观、安全观等价值观念的批判继承。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无论是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科学文化还是国防外交，都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下，世界各国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通力合作，形成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格局，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集大成的中国智慧，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国治国理政和正确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国际关系的行动指南，而且是回答世界应该向何处去，各国和各地区正确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国际问题的中国主张。正如毛泽东在《心之力》一文中所说：“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②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等潮流的加速发展，各国、各地区之间联系的日益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逐步成为国际共识，成为优化国际治理、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时得出一致的深刻结论：“21世纪人类如果要过和平幸福的生活，就应该回到2500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③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光明日报》2021年4月23日。

^② 韩毓海：《立国显始做宏略——青年毛泽东〈心之力〉特立独行倡“新学”》，《北京日报》2015年10月28日。

^③ 张承先：《弘扬华夏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

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①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治国理政”思想,表达了世界正义力量的共同心声。因此,加快构建公正合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必然选择,是世界共同繁荣的前途所在。

On the Ge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ained i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o Yuping Xie Yuantai

Abstract: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tains abundant and profound gen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political view of “harmonizing with all nations”, “the world is for the public”; the economic view of “justice and benefit in one while valuing justice over benefit”; the cultural view of “harmony but not sameness”, “all things are cultivated together”; the ecological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the heaven and human”, “Tao follows nature”; the security view of “harmony and symbiosis” and “moralization and warfighting”,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cology and security.

Keyword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raditional Culture; Harmony between the Heaven and Human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文化迭代与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重建^{*}

王 虹^{**}

【摘 要】 文化艺术一直是意识形态的主战场，而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和各种形式控制着全球的文化艺术领域，长此以往，无论是文化安全、舆论安全，还是艺术发展、文化思想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都会受到根本性的威胁。同时，随着新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加深，以美国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艺术价值标准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夺取国际文化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主导权迫在眉睫。当下需要从几个方面重新审视艺术的规律、重新定义艺术的原则和标准、重新对艺术价值标准进行阐释，重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美学精神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和研究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文化的迭代发展。此为中华文化复兴的应有之本旨，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当今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使命。

【关键词】 文化迭代；艺术价值标准体系；话语权

1917年，在欧洲一片萧条之际，美国通过重金推举一些现代艺术家，引领了世界艺术风尚，之后美国又推出了所谓“后现代主义艺术”和“当代艺术”，主导了此后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潮，同时通过批评话语的充分展开、展演活动的推广以及艺术研究的跟进，打造了全新的世界艺术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完全否认之前欧洲为主导的艺术话语体系（核心在于否定欧洲主导的审美价值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以美国垄断资本利益为中心的艺术价值标准体系。这套体系涉及艺术生产的各个方面，从架上绘画、音乐、舞蹈到电影等新媒体艺术，创造了持续至今的美国价值观导向的艺术体系。“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艺术方法论与意识形态迭进”（编号：2020SYB35）的阶段性成果。

^{**} 王虹，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①掌握了全球经济垄断权的美国资产阶级同时也积极致力于掌握全球的艺术话语权。此后,美国将文化产品作为一本万利的买卖,不仅可以轻松地从中赚取大量经济利益,而且可以通过在全球毫不费力地推广美国价值观从而掌握世界文化思想的主导权。这种打着艺术旗号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了欺骗手段和精神污染,但因为艺术价值标准不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还暂时无法系统地颠覆这一不正常的艺术体系。

一、文化迭代的产生与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变化发展的观点来看,艺术价值标准体系不是固定不变的。首先,艺术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它就是谁的样子。在封建社会,艺术标准体系就是封建主阶级的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标准体系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在新帝国主义时代,艺术价值标准体系就掌握在垄断金融资产阶级手中,由此带来的艺术标准必然就是符合金融资本风格的标准维度。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力量的腐朽衰落,必然会慢慢失去对艺术话语权的掌控;同时,时代的变迁,旧的话语体系的有效性不断减弱,从而全世界劳动群体和新一代的成长以及互联网新媒体的急速发展,必然催生新的文化和新的艺术价值标准,而这一切都成为新时代新的艺术标准体系重建的基础。

如今,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的艺术价值标准体系越来越成为阻碍中国文化和发展的因素。从政治方面来看,如果不能夺得文化思想的话语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因为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可以轻松通过各种艺术产品推广与中国利益对立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经济方面来看,如果不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文化艺术局面,中国企业尤其是文化艺术企业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即如在电影等领域,中国企业将持续受到挤压和限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谁掌握了世界文化思想话语权,谁制定了文化艺术产品的价值标准,谁就能在文化思想方面取得世界主导权,从而夺取文化产品的定价权和控制权。

如何夺得文化思想的话语权?假如还是跟在美国模式后面亦步亦趋,势必很难摆脱文化方面的被动局面,而如果简单地与之对立,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文化艺术必须摆脱美国文化艺术标准,以迭代的方式推进和生成全新的艺术价值标准体系。

迭代意味着以超越过去整体模式的方式生成全新的价值和标准体系。迭代的典型例子是苹果公司以智能手机直接实现的对诺基亚等公司功能手机产品的更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换代。网络时代，迭代几乎是竞争成功的唯一方式，因为随着成本透明化、可替代性增强，如果没有全新的系统出现，就很难取得竞争胜利。在文化方面同样如此，中国的艺术创作者无论怎样努力，只要他们的作品是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化内容的，都无法超越西方本土创作者，只能沦为二流和山寨廉价产品，即使是部分创作者加入了更多新的内容和创见，也很容易被忽视和否定，因为文化艺术的价值标准并没有掌握在本国手中，无论是各种艺术奖项、评论话语、美术馆等展演体系，背后所遵循和推崇的都无疑是西方文化艺术价值标准。

不过，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新时代的技术进步逐渐拉开了中国与他国的互联网技术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明显的先进与落后之分，而在于互联网信息占据感官的全面程度、交流方式的速度、方式等的变化带来的舆论话语场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潜在的，然而又是迅速的，以至于可以说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实现完全的文化迭代。由此，我国的互联网舆论将进入一个西方通过旧的互联网形式难以操纵的时期，更进一步，实现文化主体性甚至推进全球互联网话语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时至今日，如何引导文化迭代的方向，促进文化迭代以符合本国文化主体性同时也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发展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

文化迭代是通过文学艺术创作、传媒宣传、理论更迭等共同形成的整体文化运动来实现的。网络时代，文学艺术以各种形式渗透在网络内容的片段中进行传播。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网络时代，尤其是在新媒体不断涌现的当下，网民从“读文字”逐渐习惯于“读图”，进而习惯于视频、短视频（B站和抖音等），因此文学的影响力逐渐让位于艺术直观的影响力。美国一直在研究视觉艺术，就是因为认识到视觉直观对受众的控制力逐渐超过文字符号对受众的影响。从现实来看，与艺术活动相比，目前中国在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层面的话语主动性并不突出，而且与成熟的西方意识形态控制直接对抗的效果并不理想。

同样，当下新的文化迭代也需要以艺术作为突破口，而且当下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具有优先融合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互联网技术潜力，因此中国未来的艺术创作如果建立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就能将包含足够多的观念和思想在内的文化内容通过意蕴风格和外在的形式表达出来，征服受众，潜移默化地实现文化思想的更迭。在此种情况下，以艺术作为文化迭代的突破口，孵化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艺术家，建设能够自由运用艺术理论表达中国文化精神的评论家队伍，培养能接受新的艺术价值标准的受众，最后完善符合中国利益的文化审查机制，建立新的艺术价值标准体系，实现世界文化主导权的交接才有可能。

文化迭代的重心在于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建设，这需要通过艺术价值的科学鉴定及艺术创作、展演、批评、研究等整体性的组织建设和工作推进来逐步实现。

二、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和研究体系，夯实艺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由于过去的艺术价值标准体系都掌握在欧洲和美国手里，而背后的理论内容都是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这套理论若用来解释中国传统艺术或者当下新的艺术创作都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但目前仍然有不少学者“言必称古希腊”，一切当下的和历史的现象都往西方理论里面套，这是错误的方向，很容易使艺术创作脱离现实走上“改弦易辙的邪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核心——分离思维、机械对立的思维都已经逐渐不应当下全球化与大融合的趋势，需要被扬弃，而富有包容思维和辩证色彩的中国哲学思想更适应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应该作为艺术理论研究的理论来源。而中国辩证色彩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整个中心就是建立以中国智慧为核心的新的艺术标准体系和实现文化迭代的理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指导美学研究，在实践中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其结合当下社会现实实践来理解和推动当下的创作，同时也用来评判作品内在的思想结构。旧的艺术或者艺术哲学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将最核心的问题归结为超历史的本体论问题，“对于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把它叫作意识形态，他们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①。因此，要摒除旧的意识形态的侵扰，挖掘和发现新的非资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和表达方式。比如，一些年轻艺术家已经在融合中国精神和西方艺术方法进行创作，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分析作品中展露的非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这样既能帮助艺术新生力量和受众理解这种新的风格模式，也有助于在理论研究层面形成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与中国风格结合的理论体系，以此推动新的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建立。

西方霸权主义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也体现在文化方面。文化艺术的生产和评价标准体系的主导权一直都是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最激烈的方面之一，一百年来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艺术界很多时候都以西方思想尤其是美国文化为圭臬，以西方社会设定的一套艺术评价标准体系为准绳，对其本质、缺陷和危害性缺乏认识，甚至不能反思。但历史在发展，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世界格局都在剧烈的变化之中，我们需要反思过去的文化价值标准，建立更符合世界发展和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新文化思想体系。

^① [苏] 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远迈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页。

（二）以文艺批评来推进文艺创作

2015年，中国文联设立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等与文艺批评相关的协会组织，目的是逐步建立起一个由中国掌握话语权的批评和研究体系，但是仅仅设立围绕中国话语的批评组织还不够，目前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批评与创作脱节。搞创作的瞧不起搞批评的，认为他们只知道纸上谈兵，而搞理论的瞧不起搞创作的，认为他们都是粗俗的匠人。此种情况造成写评论的人不愿意去深入了解艺术创作，搞创作的人又不愿意接触理论内容，使两者很难相容，评论家想要主宰创作者的走向，但创作者既听不懂评论者的说法，也不愿意被牵着走，这就形成了矛盾，阻碍了艺术从创作到研究的发展。

文艺批评主要运用的是美学（即艺术哲学）理论，高校的美学专业，一直设在文学院或者哲学院之下。文学院下的美学专业偏向于文学方向，几乎是纯文学理论，脱离了艺术创作领域。必须强调的是，美学研究的是艺术的理论，一旦脱离艺术和艺术实践，就丧失了其理论意义。另一种情况是美学专业放在哲学院，情况同样严重，正如黑格尔阐释的那样，如果研究的是纯粹的理论，那就是哲学，而不是艺术理论，更不是艺术。设在哲学院的美学专业容易走上纯哲学的道路，陷入烦琐的哲学理论迷宫，而且理论大部分都是西方哲学。这种理论架构既不能指导艺术创作实践，也不能有效地推动美学的发展。因此，首先需要改变学科设置，将美学设立在艺术学院，并且对美学专业的研究活动提出要求：批评者要研究当下作品，与创作者进行互动，在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搭建桥梁，让大众逐渐接纳和欣赏包含新的艺术价值标准的艺术作品。只要持续推广一段时间，这种新的艺术价值标准就能确立。

二是批评与欣赏脱节。前面提到由于对艺术哲学-美学的学科定位方面的问题，文艺评论要么偏向于纯感性的文学性的抒发，让欣赏者看着不知所云，要么偏向于艰深的哲学表述，让欣赏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打破这种局面，艺术作品的普及和推广、新的艺术理念与格局的建立都是空谈。欣赏者和受众是被培养的，只要能有效地沟通作品和受众，新的艺术价值理念就能被有效地传递。在这个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那年那兔那些事》，每一位喜爱这个动漫IP的参与者都是讲解员和评论员，他们成功地将这个动漫故事里的历史内容挖掘出来共享给其他欣赏者，创作者、评论者、欣赏者共同促成了这个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饱含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动漫作品的成功。批评队伍的成员应该首先自己热爱艺术，然后进入艺术作品，充分体会其中的思想与情感，并以恰当、简单而深入的方式传递给其他欣赏者，而不应该以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姿态来面对创作者和欣赏者，尽力克服当下文艺评论中的“文学范儿”“哲学范儿”“文学与哲学机械组合范儿”等让人不知所云、除了自我炫耀毫无社会意义的错误倾向。

积极而有效的艺术批评要求评论者有足够的艺术知识积累，有足够强劲的思想

维能力将复杂多样的艺术现象进行梳理,从而找出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评论能够言之有物,既不能过于文学化,也不能过于哲学化,而是要和艺术作品紧密结合,以展现、分析、评价作品作为己任,通过艺术的各种形式,挖掘出其内在的思想意识,同时研究不断涌现的作品中出现的新风格、新形式。

(三) 正确评判文艺作品的价值

如何评判作品,需要从文化产品的特征来进行。

首先,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物质商品,具有消费的持久性。一方面,文化产品的价值在消费中实现,另一方面“它的精神价值的消费却是可以永恒存在的”,同时“文化产品生产者不仅要通过学术交流活动 and 他人广泛协作,还要广泛利用前人的成果,因而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它的使用价值具有永恒的意义”。^①

其次,文化产品需要具有创新性,因为“创新性劳动是精神生产最本质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精神生产”。^②文化产品无论借鉴和模仿多少前人或者其他领域的内容,如果没有传达出属于自己的新的意见、情绪、观点、态度,同时在结构上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整体,都不具有创新性和独特的价值。

再次,文化产品需要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文化产品融合了各种成分,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同时也表现为精神内容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产品可分为知识类和艺术类,两种类型的文化产品分别有不同的品相,但又常常是高度结合的,这提高了文化产品内涵的复杂程度。无论如何,文化产品只有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领域的纵横和精神内容的多样)才是具有价值的。

最后,文化产品需要具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以深邃的哲理和知识,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③;另一个是“以特有的敏感性和预见性,引导人们认识社会和未来”^④。文化产品的价值,必然取决于其内在的思想性和情感价值,甚至是其中的预见性和启发性,因此判断一个文化产品的价值,就必须从其是否具有思想性和影响性角度加以考量。

因此,在判断一个作品是否有价值的时候,应该从持久性、创新性、复杂性、影响性这四个方面进行。当下充斥的各种徒有其表的文艺作品,在这四个方面都有缺失,就应该根据文化产品价值评判的四个标准加以批评和分析,指出问题、提出建议。

① 程恩富主编:《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② 程恩富主编:《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③ 程恩富主编:《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④ 程恩富主编:《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三、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操作标准

（一）建立艺术价值的科学鉴定体系

建立艺术价值的科学鉴定体系，首先在于对艺术品的鉴定、鉴证、鉴识和鉴价。艺术品是否有价值，首先建立在科技鉴定基础上。目前，艺术品辨伪防伪领域虽然存在形形色色的方法、模式以及各具特色的业务案例，但是均归属于作者鉴定、经验鉴定、科技鉴定与科学备案这四个系统之中，有些个案或属于其中一类，或是其中两类之组合。作者鉴定、经验鉴定历史悠久，科技鉴定与科学备案是当代与时俱进的新系统，共同汇成艺术品领域的辨伪防伪阵营。

2009年以来，文化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在艺术品知识产权保护与规范艺术品市场等研究领域开创性地研发了“艺术品科学备案技术管理系统”和“应对艺术品科技高仿品的科技识别系统”，拥有21项专利技术，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初步奠定了艺术品科学鉴定、科学备案作为艺术品鉴证研究的重要基础。^①

科研人员采用光学仪器对各类书画作品的微观结构进行了大量的取证比对，证实了任何书画作品画面的任何一处微观形态都是独一无二的，取其微观图像并备案就可以锁定该作品唯一性特征信息，成为日后验证其是否被调换的可靠依据，因为任何高超的复制技术只能复制作品的艺术形态，而无法复制作品物质形态中的微观世界。在这一科研实证后不久，科研人员就获悉了A200便携式显微镜的功能与特性，将其引入艺术品科学备案业务作为书画微观图像取证验证的借用工具，策划了“为中国画备案”的业务模式以及推广方案，并在多家企事业单位进行试点，从而为艺术品科学备案事业及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为艺术品科学备案的大趋势。

2017年，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艺术品鉴证重点实验室成立，并成立新一届专家委员会和特邀研究员队伍。通过艺术品鉴证重点实验室这个科研平台，继续探索艺术品认知与管理领域的相关技术问题、学术问题，开展艺术品大数据研究和全面而深入的艺术品鉴证研究，以形成一支艺术品鉴证认知与科技管理的专业研究团队。这为鉴定及甄别艺术作品的好坏、新旧、真伪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二）运用新技术、新媒体进行不断的艺术创新实践

当前，互联网、物联网、VR、AR、5G等新科技发展迅速，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信息的来源，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逐渐成熟的网络文化体系潜移默化地影

^① 参见尹毅主编：《书画认知与管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存在方式。艺术来源于生活，在互联网新技术和新媒体技术运用的基础上，中国当下和未来的艺术创作必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从目前来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具有优先融合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类感觉和知觉形式为一体的互联网技术潜力。从过去的文字到后来的视频再到短视频，互动性越来越强。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艺术创作只要建立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所改变的现实基础上，就能更好地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趋势。

这就要求艺术创作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将新技术、新媒体形式自由地运用到创作中去，研究新技术带来哪些方面的感官和意识的觉醒，积极地把握住这些新出现的需求，打造与移动互联网生活方式能融洽结合的风格。

与互联网发展结合，不是要直接表现互联网生活，而是需要琢磨互联网时代人的存在状态和思想状态。以绘画作品为例，不是绘画作品的内容要出现诸如计算机、互联网、AR 仪器等代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器物，更没必要直接出现诸如“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字样，因为这些都是直接的宣传作品可以用到的东西，艺术更倾向于通过间接的方式来揭露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普遍本质，然后转化为形象性。整个过程就是通过抽象到形象的转化来传递新时代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比如有一位青年画家，他的作品内容是桃花树枝和花朵，但是树枝和花朵的质感凸显，而背景则被虚化，这种虚实对比其实就很能凸显当下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感受：虚化的庞大网络世界和实在的个体世界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因此，这个作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直观的方式表达了互联网一代的心理感受。毕竟艺术作品的核心还是表现人生和评价生活，技术是人的工具，技术发展是人作用的结果，人才是主体。立足于这个核心，就能更自由地运用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新方式表情达意，逐渐形成内在和谐、能反映当下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及这个时代的艺术风格。

（三）孵化培育新的艺术流派以实现艺术话语的再阐释

流派的打造是制造文化艺术风向的重要手段，这需要更多国家政策的介入和国家资本的参与。上至文艺复兴，文化艺术流派的产生背后有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提升地位而进行的大量资金投入和规划；中到启蒙主义时期，新的文化艺术流派的产生背后也是有国家和民间资本的大量参与和规划；后到美国崛起时期，通过高薪吸引世界各国符合帝国主义文化精神的艺术家、吸收世界各国的新技术提高文化艺术技术水平、建立文化艺术孵化中心等手段来推动美国文化艺术的迅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和资本有意识地打造新的艺术流派，通过艺术家和理论家团队来制定和阐述新的文化艺术标准，从文化上对欧洲主导的艺术中心发起攻击，最终实现了文化迭代。毫无疑问，这个文化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重新建立也是由美国政府机构部门（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规划并与垄断资本共同完成的。20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输出采

用的也是和美国类似的路径方法。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在国家支持下,动画领域的“中国流派”享誉世界,音乐领域的中国风格也引起全球瞩目。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兴起的“85 新潮”事实上成为新帝国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注脚,并没有真正展示中国特色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文化艺术价值。后来又陆续出现一些自称“学派”的艺术潮流,但由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文化强势,这些创作群体基本上还是处于对美式文化艺术的模仿和追随状态。

目前,在流派的形成方面国内还处于自发和零星的状态,但是在绘画等领域已经涌现出大量从具体作品上逐渐摆脱之前美式艺术风格和内蕴的新作品,从作品到创作者再到创作群体,只要持续不断地生成新的作品,通过政策及资金支持就能迅速建立新的流派。

在这个生成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评论家必须参与其中,引导和帮助这些新的创作者持续地创作具有摆脱旧的艺术价值体系的作品。作品的选拔可以通过艺术机构来进行,具体而言,可以先根据艺术机构策划方案的思想基调和风格走向来进行判断和选择,然后对机构挑选的作品进行遴选,选出最突出的作品及创作者,其后对选出来的作品及创作者进行整体的规划,以艺术中心为单位对艺术群体的活动进行规范和资助,对风格、内容、形式等进行结合,形成有足够技术突破性和理论深度价值的新的艺术流派,最后通过国家文化发展等项目进行推广和传播。

新的、成熟的艺术流派可以实现艺术话语的重新阐释,也就是具体地对旧的艺术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和扬弃的工作,同时也能聚合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为未来摆脱帝国主义话语体系做好人员和理论上的准备。

四、艺术价值标准体系的推广路径

(一) 以展演作为桥梁来促成艺术观念的推广普及和新的艺术标准的建立

艺术展是艺术风格的符号性事件,历史上任何一次艺术风潮无一例外地由艺术展或者其他展演活动引发。因此,艺术展不应当作为简单的展示作品的方式,策展人应该有意识地把新的艺术风格和标准融入对作品的选择和组合之中,甚至应该就展出主题的需要,促使艺术家完善自己的作品,继而将展出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观念来表达,以展出的风格和理念为中心来整合空间、灯光、背景音乐等因素,主动打造完整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越完整,新的艺术标准和新的艺术理念就传递得越充分。

2017 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央美术学院邱志杰率领中国艺术家团队参展,展

示了和西方艺术标准不同的风格特征,虽然一些作品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艺术标准的桎梏,但作为整体的艺术展呈现出来的却是有价值的新风格。策展人不仅是艺术家的推举人,也是艺术家的引导者,若策展人能够有意识地以建立新的艺术世界为己任,就能有效地推动艺术观念的普及和新的艺术标准的建立。

目前的问题是艺术展一般是由学院派的学者来做策展人,他们一般有三个特点。第一,作为学院派的通病,哲学化倾向太严重,不利于受众理解展出的理念,最后艺术展容易成为艺术圈和学术圈小范围的孤芳自赏。第二,商业性太强,他们往往受雇于艺术机构,作为卖画的推手,很难谈得上艺术思想和风格的主动建构。第三,比较分散,没有办法系统地了解 and 掌握当下的艺术发展趋势,无法走出小圈子。

因此,国家不仅需要设立评论家协会等组织,还应该成立针对策展人的规划、推动、扶助中心,以便整体统筹艺术展演的价值导向。同时,在展出机构方面,需要有更为整体的展出规划,让艺术作品挑选和展现更符合规范,更能体现整体的文化思想风向,从而让艺术展演活动具有更强的中心思想和文化主体意识,更能传递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审美价值取向。

另外,在选择作品方面,需要对作品的价值进行反复考量,考量的依据除了前面提到的文化产品的四个特征之外,还需要预见到作品未来的价值,也就意味着认识到作品的内涵与未来社会发展的契合程度,这就需要艺术策展人和团队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也有深刻的认识。文化商品的消费过程具有长期性和永久性,而“某些文化商品的有用性,由于当时人们的欣赏趣味、时代风尚、意识形态等原因而未能被人们认识,它却不会像一般产品那样逐渐丧失价值,其自身价值会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在适当的时候重现出来”^①。因此,策展人和团队需要具有判断作品未来价值的能力,通过适当的包装和宣传,促使这种未来价值能够尽早地表达出来,从而占据文化产品市场的先机。

(二) 设立艺术奖项并逐渐打造为世界艺术价值标准的指向标,争夺艺术价值标准的国际话语权

通过艺术奖项的设立来会聚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褒奖其中和中国文化风格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方法、立场相符合的作品,以此产生示范效应,鼓励各国的艺术家创作富有本民族特色但又同时能摆脱新帝国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作品。其结果是,围绕中国的大风格,新的艺术价值标准就能自然而然地通过不同国家、地区的创作者汇聚起基本的实践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就能进入符合中国利益和世界融合趋势的新的理念体系,共同促成世界级艺术现象的出现,推动新的艺术价值标准的建立。

^① 程恩富主编:《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目前,朝这个方向做得比较突出的是南京百家湖集团策划的“南京国际艺术展”,尤其是2014年第二届南京国际艺术展,设立的奖项中金奖奖金达50万美元,吸引了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参加。评委大多数是中国艺术理论、比较哲学和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他们的主导下,获得金奖的作品是爱沙尼亚艺术家的《创世纪》和中国艺术家的《从头再来》这两个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创世纪》以“非西方哲学”的非形而上学方式对创世纪进行了新的阐释,这种阐释基本上只能用中国道家 and 禅宗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通过这种阐释和再创作,这个作品就成为饱含中国风格情怀的作品。《从头再来》则模仿了西方绘画经典《雅典学院》的形式,但对其神圣性进行了消解。《雅典学院》表现的是西方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形象,而《从头再来》里面门廊还在,但整个环境和人物都残破不堪,这种消解对应和展现的就是当下西方文化逐步褪色和残破的现实。可以看出,《创世纪》和《从头再来》都对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精神进行了质疑和消解,其中自然而然地就显现出接近于中国意蕴的文化艺术精神走向。

但是私人企业主导的艺术奖项受资金等条件限制,具有不稳定性,尤其是2016年受房地产行业情况的影响,第三届南京国际艺术展取消了获奖奖金,此举必然削弱这个奖项在世界范围的吸引力。因此这些奖项应该受到重视,建议采取以政府承担一部分资金和宣传、企业负责运营和宣传的模式,努力延续这种逐渐发展起来的以中国大风格为主导的艺术奖项,进一步打造为中国面向世界的艺术奖项,并以此建立和推广新的艺术价值标准体系,主动争夺国际文化话语权。

五、结语

艺术评价标准体系所涉及的其实就是文化话语权问题:以什么标准来评价艺术,涉及是用谁的立场、用谁的眼光来看艺术,用谁的标准来定义艺术。在以西方为主导力量的艺术评价体系之下,所产生的必然就是以西方的立场、视野和眼光来看待的艺术,所以涌现出的艺术作品也必然是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目的和现实利益的。而如今文艺的话语权是掌控在美国资本力量主宰的“当代艺术”和“抽象艺术”的概念和话语体系手中,不首先破除对这套艺术评价标准体系的迷信,不清除掉这种倾向于非人化、反社会化的价值体系的负面影响,就无法开创面对未来的新的文化艺术局面。

因此,当下的时代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勇于破旧立新。“破”——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应该大胆地批判和摒弃以美国为主导的旧的艺术评价标准体系,为艺术发展注入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并在正本清源的过程中结合历史上伟大的艺术精神,建立更符合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规律的新的艺术评价标准体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批判错误的艺术观念和过时的评价标准的同时,立足中国文化

精神，分析艺术发展规律，从而探寻艺术发展的前景，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时代责任。呼应文化迭代的时代潮声，以艺术品的科学鉴定、鉴证、鉴识、鉴价为基础，运用新技术、新媒体进行不断的艺术创新实践，将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展演作为桥梁来促成艺术观念的推广普及和新的艺术标准的建立，设立艺术奖项并逐渐打造为世界艺术价值标准的指向标，孵化培育新的艺术流派，从而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美学精神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和研究体系，夯实艺术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而创造富有时代精神和新的价值理念的标准体系，推动世界文化的迭代，此为中华文化复兴的应有之旨，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使命！

Cultural Ite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rtistic Standard System

Wang Hong

Abstract: Culture and art has always been a key battleground of ideology,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deology is controlling the global field of culture and art through various media and forms. In the long ru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be threatened fundamentally whether in cultural and public opinion security, or art and cultural ideas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with new imperialist colonial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deepening, western culture and art value standard system with American culture as the core in China has become the main obstacle to confidence in culture, theory, road and system, therefore seizing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standard system is imminent.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rules of art, redefine 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 it, and re-explain the standards of art value from several aspects, so as to rebuild the aesthetic thought and research system centered on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promote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e. This is the inherent purpose of Chinese culture rejuvenation,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and the mission entrusted to the Chinese nation by the present era.

Keywords: Cultural Iteration; Art Standard System; Discourse Power

饭圈文化低龄化的症候分析及应对之道^{*}

付安玲 孙艺菡^{**}

【摘要】近年来，以追星为主要特征的饭圈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悄然兴起，经由互联网发展、资本推动与青少年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催化愈演愈烈，并且日益显现出低龄化的演变趋势。青少年粉丝作为参与主体，在饭圈文化的强势裹挟下，逐渐陷入排他性严重、行为偏执、情绪焦虑的虚假狂欢中无法自拔。对此，应从偶像自身、平台整改、文化融合三个维度来消除饭圈文化的荼毒，增强主流文化影响力，引导青少年粉丝养成理性思维方式，从而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关键词】饭圈文化；低龄化；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认同

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介的迭代更新和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饭圈”等粉丝文化现象借势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逐渐被熟知，并深刻改变了当代青年的文化生态，形成极具创造力和感染力的“饭圈文化”。在标榜个性特色和追求趣味多元的饭圈文化张力中，一方面粉丝容易被大量情绪化“控屏”，倒向非理性和群体极化，进而偏离青年文化开放多元的价值初衷；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生活中生活坐标的缺失和网络中情感代偿的满足，越来越多的年轻粉丝逐渐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在非此即彼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与现代社会包容共享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如今饭圈文化作为当下青少年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在互联网的发展、资本的推动与青少年自身多重裹挟下，日益显现出低龄化的演变趋势。饭圈文化的无序生长、打榜失控的极端事件等严重侵蚀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三观养成和人格塑造，亟待纠偏。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专项“大数据提升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效果的路径研究”（19VSZ072）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优势学科）“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构建机制研究”（19BYSJ28）的阶段性成果。

^{**} 付安玲，法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孙艺菡，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

一、饭圈文化低龄化的宏观语境

“饭圈”即粉丝圈的简称，是指具有共同情感基础的追星群体。以“00后”为主的青少年构成当下饭圈文化的主体，不同于“80后”“90后”，完全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他们具备原子化社会独特的人际交往疏离感，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独属于他们自身的饭圈文化。当下互联网的发展、媒介资本的推动以及他们自身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渴求，更是为饭圈文化低龄化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宏观语境。

（一）互联网：饭圈文化低龄化的稳固根基

“饭圈”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彼时的“饭圈”还是以个体活动为主，规模较小且在地区分布上较为分散，在年龄分布上也没有显现出低龄化的趋势，不具备较为完善的体系机制。而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把在互联网空间为行动地点，具有明确规则秩序并且行动力强劲的群体组织称作‘饭圈’”^①。由此可见，“随着网络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化模式和交往场景在虚拟空间的重塑，给青年群体提供了话语表达的渠道和平台，这是理解‘饭圈’文化、粉丝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②。互联网已成为“饭圈”发展必不可少的技术基石，使粉丝群体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扩大自身规模、完善组织规则，对其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促进作用。同时，“‘饭圈’基本元素不断交流从而形成群体意识，推动‘想象共同体’的构建，由此衍生出一定的意向性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圈层式’文化传播模式，即‘饭圈文化’”^③。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青少年文化参与的门槛，在为粉丝发表言论提供更为自由空间的同时也构成饭圈文化低龄化的主要诱因。粉丝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生产者，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聚合，同步开展线上和线下活动，在打破时空限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分工明确、行动力强的“饭圈”团体。参与门槛的降低也突出了饭圈文化匿名化的特征，为青少年粉丝群体搭建了一个交流轻松、表达自由的开放式平台，展现了青少年粉丝特有的社交属性。另一方面，互联网丰富了粉丝的表达方式，满足了他们对归属感的渴望。“饭圈”具有交互性、虚拟性的特征，互联网增强了青少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互动感，而“饭圈”的交互性也不仅仅局限于偶像与粉丝，同样也存在于粉丝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实时互动。其中，号

① 李金秋：《“饭圈”文化对青少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及启示》，《汉字文化》2020年第19期。

② 王薇：《“饭圈”文化透视与综艺娱乐内容生态重建——“倒奶”打投事件引发的思考》，《中国电视》2021年第7期。

③ 袁志香：《“饭圈文化”下青年主体意识的建构》，《人民论坛》2020年第14期。

召力和影响力大的粉丝往往成为整个“饭圈”内的意见领袖，强势影响着其他粉丝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并成为他们精神依赖的核心人物，带给他们归属感。此外，互联网凭借其反馈及时、实时互动的优越性提升了青少年粉丝的参与感，虚拟“狂欢”激发了青少年的文化参与热情，大数据对于市场需求的精准定位为偶像们树立“完美人设”提供了数据支持，却也造成青少年文化参与的“信息茧房”。在回音室效应下，青少年粉丝由于对自身行为缺乏理性和准确的预判，思想上极易陷入非理性思维的困境，甚至产生偏激的行为。

（二）媒介资本：饭圈文化蔓延的主要助力

“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① 大数据时代，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之下，各类媒体飞速发展并在各类偶像选拔节目爆红后迅速找到了资本逐利的新方式，媒介在商业运作的引导下改变了粉丝的传统角色，重构了粉丝身份，使粉丝参与到偶像的出道过程之中，强化了粉丝群体保护自己偶像的“使命”。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热播为爱奇艺这一投票平台带来了上亿元的利润，其为资本带来的流量与热度更催化了资本操控运营模式的现象。自此之后，批量生产偶像明星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选秀经济也成为媒介资本赚取粉丝利润的重要方式。流量催化与资本助力在为粉丝了解偶像、传递诉求开辟新渠道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竞争的恶性循环。低龄化的青少年粉丝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确立的关键时期，极易被营销号、职业黑粉带动情绪从而忽视事件是非曲直，在资本情感绑架的一系列操控下沦为投票氪金的工具。资本竞争越来越依靠于舆论的引导，而资本操控下的舆论往往会根据自身利益加以引导与传播，这就容易导致对于同一事件不同时间的舆论氛围会有所差异，有时正面有时负面的言论在扰乱网络生态的同时也通过控制偶像形象进一步引导了粉丝行为。“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在数字媒介时代，粉丝群体并非一个严丝合缝的共同体，他们始终处于分分合合的流动状态中。”^② 虽然基于不同青少年粉丝的自身需求，她们对于同一偶像的喜爱可能会存在差异，有的是“事业粉”，有的是“女友粉”，但各大媒介平台通过细化粉丝的身份认同促成了各个取向群体之间的相互较量，从而保证了“饭圈”日常的活性。然而，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在商业资本的不断参与诱导之下，还未拥有坚定判断力的低龄化粉丝沦为资本竞争的工具，也在其矛

① [美]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② 曾一果：《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社交媒介环境下“饭圈”文化的自我突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9期。

盾不断激化的过程中掩盖了资本的消费本质,造成了如今“饭圈”日益膨胀的异化消费现象。

(三) 对于身份认同的渴望:饭圈文化盛行的内在动因

《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增长,触网低龄化趋势更为明显,通过互联网开展粉丝应援活动已经成为当下“追星”的主要方式。在此次抽样调查的所有学历段中,初中生在网开展粉丝应援活动的比例达到11%,高中生达10.3%,小学生也有5.6%,而且日益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娱乐社交与社会生活从并行不悖到开始产生交集,青少年在寻求社会意义与身份归属感的过程中,需要向成年人心智模式进行转换的媒介,饭圈文化便是其中之一。”^①当下,参与饭圈文化的手段途径日益丰富,如制作短视频、表情包等,粉丝甚至可以参与偶像的出道与成长过程,成为偶像出道的“制作人”,这跨越了过去偶像与粉丝之间的“鸿沟”,在偶像与粉丝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共生关系”,“跳脱社会秩序,在虚拟网络世界中构建话语空间,反映了青年群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愿望”。^②同时,这也满足了低龄化粉丝对于自身身份认同和进行文化参与的渴望。在“饭圈”这一网络亚文化中,“偶像和粉丝正日益结成一荣俱荣的利益、情感共同体。前者需要流量数据的支撑形成影响力,后者则使尽浑身解数为其提供足够的消费保障。青少年粉丝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左右偶像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③。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为独生子女的低龄青少年群体日益面临个体孤独的困境,改变在现实中遇到的同伴缺失现象构成激发低龄青少年参与饭圈文化的主要动因。低龄化粉丝群体往往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对新兴文化有着较强的包容性,在此前提之下他们对自身身份强烈认同感的缺乏就为饭圈文化低龄化的盛行提供了一定的内在动因。在追星过程中,粉丝可以将自己心中的理想人设转嫁到偶像身上,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渴望使他们对偶像产生一定的情感依附心理,在这一过程中满足了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的需要,同时也缓解了他们自身现实感缺失造成的恐慌心理。

二、饭圈文化低龄化的症候解读

随着饭圈文化的日益发展,“饭圈用语”应运而生并逐渐演变为粉丝独有的

① 张添翼、陈雪曼:《从符号消费到符号生产——青少年“饭圈”文化的哲学解读》,《东南传播》2020年第12期。

② 王薇:《“饭圈”文化透视与综艺娱乐内容生态重建——“倒奶”打投事件引发的思考》,《中国电视》2021年第7期。

③ 孙佳山:《饭圈的“群体性孤独”由何而来》,《中国青年报》2019年9月12日。

交流方式,饭圈内部规则的日益成熟使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得以重构,促进了饭圈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饭圈文化低龄化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圈层化严重导致了“饭圈”的排他性,日益走向极端化;低龄化粉丝的偏执行为也使其自身日益陷入虚假狂欢中无法脱身;当下追星流程的虚荣架构更是加重了低龄化粉丝的焦虑情绪,使她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一) 排他性严重:“饭圈”走向“一言堂”

饭圈文化在当今的互联网平台日益快餐化,青少年粉丝的群体极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各大偶像粉丝之间的骂战每天都在媒介平台上演。“非我族类”这一概念反映了“饭圈”内部强烈的文化边界意识,致使不同圈层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次元壁”,这种次元壁“既阻断他人的窥视、进入,也区别其他圈层,还反身强化圈层共同体的辨识度和认同感”^①。当下,“饭圈”的排他性尤为严重,青少年粉丝为了便利“饭圈”内部交流、增添言语趣味性,独创了属于他们圈层内部的用语,即“饭圈用语”。“饭圈用语”创立之初,各家粉丝还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然而在一些低龄青少年的参与下,一些带有一定侮辱性的词语便被广泛运用于自家粉丝的骂战之中,对“饭圈”内部的团结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日常交往的话语体系,对良好互联网风气的养成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不同圈层粉丝的交流互动中,“饭圈”低龄化粉丝往往把握不好“安利”自家偶像的分寸,对偶像的盲目夸赞与“拉踩”别家的不良风气进一步导致了不同圈层之间信息的日益分裂,使圈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饭圈”的圈层性与聚集性使正处于确定自我角色、坚定自我意识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对偶像的追捧日益狂热。如今的偶像已不仅仅局限于真人,“初音未来”“洛天依”等虚拟偶像也在饭圈中受到极大追捧,更有粉丝狂热到与虚拟偶像举办婚礼的地步,这些出格行为日益佐证饭圈文化作为一种边缘亚文化对当代低龄化青少年主体意识建构的消极作用。在饭圈文化排他性严重的影响下,低龄化粉丝群体过于追求虚拟的认同与所谓的自由,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精神出格”。

(二) 行为偏执:日益陷入“信息茧房”

低龄青少年粉丝心智不成熟,自制力比较薄弱,理性思维相对缺失,易被煽动而产生盲目的追捧或产生对陌生事物的狂热情绪,在这一情绪的煽动下,现实中低龄化粉丝机场围堵、网络暴力、被动跟风、网络控评等无底线追星行为屡见

^① 马中红:《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审美裂变和文化断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不鲜,这在抢占公共资源的同时对公共秩序的维护造成了极大的困扰。2020年,“AO3”事件在网络平台上持续发酵,起因是肖战粉丝不满网友评论举报了“AO3”这一平台,引发了平台用户的严重不满。当下“饭圈”偶像与粉丝早已紧密捆绑,粉丝的这一行为导致肖战遭到全网抵制,在破坏偶像风评的同时也给网络公共秩序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通过互联网平台,青少年在“饭圈”中往往选择性地倾向于接收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信息,排斥那些游离于自身价值观之外的信息,长此以往,极易陷进“信息茧房”而无法脱身,导致自身意识形态长期游离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对外部世界的包容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最终形成较为封闭的极化思维。青少年粉丝将自己的梦想喜好投射到自己喜爱的偶像身上,在心中建立偶像的“完美人设”,一旦“人设”崩塌,不理智的粉丝便开始脱粉回踩,将“饭圈”内部追星的盲目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在资本的操控下,“数据”与“流量”成为鉴定偶像咖位的关键标准,诱发了粉丝的“打榜氪金”等行为,将为偶像“氪金”这种粉丝自主性权力彻底扭曲成了粉丝的强制性义务。一些媒体或个人对偶像隐私和行程的倒卖,导致“饭圈”中低龄化的“私生”横行,打破了追星应有的界限,日益解构扭曲了粉丝原本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使青少年粉丝在这场虚假狂欢的盛宴中日益迷失自我,沉浸于自身建造的信息舒适圈中行为日益程序化,沉迷于“饭圈”这一虚拟世界无法自拔,在对现实的逃离中逐渐陷入被动迷茫的困境。

(三) 焦虑迁徙:粉丝沦为“打榜”机器

一方面,在资本的操控下,“顶流”已然成为判定偶像娱乐圈地位的标杆。在此背景下,对于成为“顶流”这一目标的焦虑情绪也正逐步由偶像转移到低龄化粉丝日常的“追星”活动之中。最近,有部分偶像的粉圈发出了“学生党要买105张专辑”的言论,甚至出现粉丝为偶像“打榜倒牛奶”事件,这些畸形的言论和现象背后无疑是资本变本加厉地推波助澜。如今娱乐圈中偶像打造“美强惨”人设已成为各大公司吸引粉丝的基本操作,粉丝目睹自己偶像被“误解”、被“群嘲”、遭受公司“不公”对待,种种现象使粉丝认为偶像“氪金打榜”是帮助自家偶像“翻身”的唯一出路,娱乐公司也正是借此建立起粉丝与自家偶像之间的情感关联,在引发粉丝群体强烈的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压榨粉丝的剩余价值。由此,购买衍生产品、租购广告摊位、微博投票打榜、拍摄杂志宣传、日常接机送机等行为成为当下青少年粉丝追星所必备的日常流程。基于这种价值逻辑,“饭圈”成员的理性思维与自身的判断能力容易遭到更深程度的异化,青少年粉丝甚至即使知道自己正被资本无情地利用与操纵,却仍旧不愿脱身,为偶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资本世界中自我感动于“殉道者”的假象。

另一方面,低龄化粉丝将自己偶像打造成为“顶流”的内在焦虑与“对家”粉丝恶性竞争的外在压力日益演变为“饭圈”中的非理性消费现象。低龄化粉

丝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偏离主流消费观，最终导致理性思维的丧失。为了“顶流”这一头衔，“明星带货”成为各大粉圈一场场无声的较量，为粉丝带来了不小的考验。粉丝不仅需要时刻统计直播后的货品销售数量，通过真实数据来实时反馈自家偶像的带货能力，更重要的是每个粉丝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购买明星直播的产品，如此盲目的消费不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消费风气，而且也催生了诸如偷父母钱来追星的畸形行为，对低龄化粉丝理性消费观的形成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效应。在这一消费观的影响下，原本理想的“饭圈”自娱乐化早已成为过去，资本对偶像是否营利的焦虑转移到了粉丝身上，从而使青少年粉丝在如今信息爆炸式增长的时代逐渐丧失理智，最终沦为“打榜机器”。

三、消解饭圈文化低龄化症候的实践理路

饭圈文化如今不仅是“圈地自萌”，而且还实现了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饭圈正在以互联网为媒介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饭圈早已从1.0时代演变到2.0时代，从封闭到相对开放，从排他到融合，无一不显现着饭圈的发展与进步。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整改饭圈文化，实现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一）把关偶像：以身作则，弘扬网络空间正能量

“在整个‘文本盗猎’过程中，偶像作为被盗猎物，成为任由粉丝群体改写的空洞客体，主角的位置由作为‘盗猎者’的粉丝牢牢占据。如果偶像想在这场由粉丝引领的狂欢中获益，就必须配合盗猎行为，参与到对自身的改写中。”^①当代“饭圈”，偶像在资本操控与粉丝期盼中似乎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最能够影响粉丝、规范粉丝的地位。优秀的偶像会激励青少年健康成长，带领他们一起投身公益事业与爱国事业，增强“饭圈”内部的团结性与秩序性，如不久前河南受台风“烟花”影响遭受洪涝灾害，王一博以身作则，默默奔赴抗洪前线，用实际行动为青少年粉丝做出正面表率。反之，那些具有负面新闻的偶像则会错误引导青少年粉丝的价值观，不利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近期的吴亦凡事件在网络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吴亦凡不尊重女性、无视我国法律道德的行为在微博上引起了众怒，大部分粉丝纷纷表示“脱粉”，但仍有部分低龄化粉丝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仍坚持吴亦凡“无罪论”，价值观已经遭到严重的误导与侵害。因此，把关偶像在整治饭圈文化的过程中尤为重要。

^① 江怡：《粉丝文化参与偶像工业的新可能——以〈创造101〉中的“文本盗猎”事件为例》，《艺术广角》2020年第1期。

一方面,对于新生代偶像,应严格把关,培养可以弘扬网络正能量、引导网络舆论风向的偶像,杜绝“偶像失声”等问题。提高偶像门槛,例如要求偶像必须受到高中及以上教育,必须接受针对性的知识培训以及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以有效避免大量未成年涌入娱乐行业的练习生模式。应引导新生代偶像通过一些公益手段来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鼓励偶像提升自身的引领能力,规范粉丝言论、制定“饭圈”规则、坚守底线,不做盲目迎合粉丝口味的“假人”,从根本上避免偶像“塌房”现象的发生,击碎粉丝心中“完美人设”的幻想。

另一方面,创新偶像明星的生成方式,改变在年龄与容貌方面过于狭隘的偶像标准,探索适合我国发展要求的产业新模式。当下中国偶像明星的生成方式大多拘泥于照搬韩国的练习生选拔与比赛选秀的基本模式,但中韩两国的社会基础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韩国,有传言称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个准备出道的练习生,韩国父母对子女出道也大都持支持的态度,但我国是教育大国,父母对出道做明星包容度较低,读书仍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实现理想的途径。因此,在我国,创新偶像生成模式,发挥社会各行业道德榜样的引领作用对于青少年粉丝坚定理想信念、建立理性思维具有基础性意义。近年来,各大行业的正能量领军人物在网络上引起一阵特别的“追星”潮流,撒贝宁等央视主持人通过参与热门节目收获了一批青少年粉丝,以王毅为首的“外交天团”也在霸气外交的同时让青少年坚定了爱国情怀,而以钟南山为首的广大医疗人员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无私奉献更是对引导青少年的价值认同起着积极的作用,我们应以此为基础建立各大正面人物带领的主流饭圈文化,通过偶像明星的以身作则引导低龄化粉丝由盲目崇拜转变为理性追星。

(二) 整改平台:规范舆论,引领主流文化新风向

2021年6月,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网络上的一些重点问题与各类有害信息进行整治与打击,以此督促各大平台切实履行自身责任,通过完善平台规则与用户监督规范粉丝行为、优化平台功能,引导平台为打造青少年粉丝理性追星环境协同发力,力图通过推动饭圈文化的良性发展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基于此,网络监管的各部门应该完善相关法律,加大监管力度,实现网络投诉举报流程的高效化与规范化,建立正确的规范路径,对微博等泛娱乐化平台进行调整与整改。

一方面,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完善互联网法律来增强对各大网络平台的把控,取消超话与榜单,废止打榜制度,增加各大平台宣传主流文化的节目。平台应设置权限整治低龄化粉丝无限度上网的行为,取消引发低龄化粉丝攀比集资的明星超话与热度榜单,针对低龄化粉丝的“氪金”行为设置限额,严厉打击围绕“饭圈”非理性消费形成的黑色产业链,彻底整顿平台纵容低龄化粉丝互撕掐架,以圈层矛盾制造话题、博取流量的无良行为。宣传符合主流文化的节目是构

建清朗“饭圈”生态的关键内容，也创新了“饭圈”女孩追星的新形式，如《上新了故宫》邀请到了很多当红明星作为嘉宾，在吸引青少年粉丝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了主流文化，探索了饭圈文化传播的新形式，创新了饭圈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另一方面，加强对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发布内容的筛选与把关，加大对营销号和职业黑粉的整治力度，打击“流量至上”这一营销模式带来的不良网络风气，使青少年能够回归关注主流文化发展的状态。当下，一些平台对营销公司在网络上把控舆论导向的行为置若罔闻，甚至限制政府媒体的报道。对此，各个平台都针对自身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整改。微博整改之后，热搜第一的上方始终置顶着国家时政与正能量的重大事件，这对于正确引导青少年粉丝思维形式、构建理性的舆论生态具有基础性作用，也为各大媒介平台的整改树立了正面的典范。网络平台必须建立严明的平台秩序，保持自身的责任感，杜绝在资本操控下纵容平台秩序失控现象，引导青少年粉丝群体打破圈层思维，建立立足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正能量平台，消解一系列“符号消费”行为，从而增强青少年粉丝进行群体分享的参与感，通过在维护青少年权益的过程中获得的支持与拥护消解饭圈文化低龄化可能带来的网络风险的群体基础。

（三）融合文化：引发共鸣，激发饭圈文化新能量

发挥主流文化对网络亚文化的引领作用，深入渗透饭圈并推动饭圈文化进行文化转向，在潜移默化中主导饭圈文化的方向。一方面，“在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互释与互构中，对青年圈群给予足够的人文关切和科学的价值引导，防范可能出现的‘行为失范’，规避可能存在的‘集群盲动’，消除可能滋生的‘价值偏离’，使其成长为真正具有建设性、富于生命力的正能量群体。”^①饭圈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典型代表，虽从未真正意义上融入主流文化，但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对此，将饭圈文化与主流大众文化融合，将青少年对明星的偶像崇拜转变为政治认同就变得尤为重要。近期，以撒贝宁为代表的央视主持人凭借幽默的性格加盟各大网络综艺，在弘扬正能量的同时收获了大批青少年粉丝，这种主流文化的渗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青少年的主体意识建构，提高了青少年理性思维的能力。

另一方面，饭圈文化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更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亚文化中，基于此，引导“饭圈”主动融入爱国主义活动便成为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相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2020年，轰动全网的“网络出征”

^① 胡玉宁、徐川：《青年圈群脉动的媒介感知与文化诠释——基于“饭圈”现象的叙事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

事件便是“饭圈”自发组织爱国活动、主动融入主流文化的生动诠释。“‘饭圈女孩’自发组织‘网络出征’，是表达爱国情感、传递群体诉求的有效手段，社群通过自我范畴化与社会比较，重塑身份认同，最终获得社会认同。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良性互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冲突，维护了网络生态的稳定与和谐。”^①不久前，“追星女孩”给武警湖南总队湘西支队送奶茶事件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女孩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拥兵女孩”，并写信表示“追星只追人民子弟兵”，这一行为弘扬了正确的“追星”价值观，也为“饭圈”提供了正确的追星样式。共同举办公益活动、共同维护国家权益，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也表明了鲜明的政治立场，“饭圈”多次向我们证明正确的追星方式可以延续“饭圈”温暖、促进“饭圈”成员共同成长。因此，我们应当尊重圈层差异、警惕盲目跟风，在尊重青少年想法的前提下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通过思政课提高青少年思辨能力，引导他们塑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精神力量，在满足青少年急需的认同感与参与感的基础上引导青少年粉丝产生情感共鸣，警惕网络群体极化对凝聚社会共识的潜在威胁。

总之，饭圈文化已然渗透到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饭圈思维时刻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模式。饭圈文化低龄化的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如何防止不良价值侵害青少年，让饭圈文化发挥积极作用，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关机构监管到位和对粉丝进行正向引导，是保护粉丝权益和防止饭圈文化走极端沦为资本牟利工具的前提。为此，需要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多管齐下，将粉丝的情绪和行为引流到正向价值高地，让饭圈文化能够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才是防止“饭圈”变“怪圈”、营造新时代青年亚文化良好生态的正道。

Symptom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Young Age of the Fandom Culture

Fu Anling Sun Yih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andom Culture, which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star-chasing, has emerged quietly among the young group. Driven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capital and the youth themselves,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and increasingly shows the evolution trend of younger age. Teenage fans, as the main participants, gradually fell into the fake carnival of

^① 张璇：《“饭圈女孩出征”的社会认同过程研究》，《东南传播》2020年第1期。

serious exclusivity, paranoid behavior and emotional anxiety under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Fandom Culture and could not extricate themselves. Therefore, we should eliminate the poison of Fandom Cultur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idol itself, platform rectific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culture, and guide young fans to develop a rational way of thinking, so as to build a clean cyberspace.

Keywords: Fandom Culture; Younger Ages; Mainstream Culture; Ideological Identity

“名”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介入”话语转向*

李 云**

【摘 要】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介入话语转向问题可以从认识论、政治伦理以及本体论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在传统的“名辩”“正名”“命有之名”“名与实”的要点上,明晰当代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中华传统本体论之一的“名言观”介入当代文化观的话语体系建设,这其中所存在的互文与辩证的关系,是深入理解中国当代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的过程和依据。这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体系的再次确证,而且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方面成就的进一步论证,更是对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信仰建设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文化观;话语建设;名;正名;介入

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观的话语体系建设。“语言”一词在中国古代记载为“名”“言”“辞”“话”“语”等。西方有“逻各斯语言观”或者“逻各斯中心主义”,与之相对,中国有学者提出“名言观”^①。观念与话语、观念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对“名”的讨论中管窥一二。在当代文化建设中,一是先秦时期得到广泛研究的“名”介入中国当代文化观的话语体系建设,“名”介入中国当代文化观的话语体系建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二是融入中国古典精华的当代文化建设,有助于在现代中西方多文化频繁交流的背景下确立中国特色文化观的话语权位置 and 地位。古代名学思想研究者谭戒甫说:“知鲁胜分‘名’为三,即一‘正名’,二‘名本’,三‘形名’。”^②孔子在《论语》中最早提出“正名”的问题,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儒家的“正名”同样也是社会秩序稳定、政治伦理和谐的根本,因此以“名”的三个角度的“介入”来探视文化观,

* 本文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传播基地重大课题“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201703)的阶段性成果。

** 李云,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对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 赵奎英:《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② 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2页。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得到传承。“介入”译自法文“engagement”和英文“commitment”，比如，美国学者阿诺德·贝林特的《艺术与介入》（*Art and Engagement*）一书，国内研究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学者建议译为《艺术与交融》^①。“交融”突出了“介入”一词的“参与”意义，以及摆脱二元论，走向中国古代情景交融、主客相融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情景。所谓“介入”话语转向，同样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话语体系建设中转向中国古典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化的交融、交流的趋势，即“名”言观等传统话语方式与中国当代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的融合。

一、认识论意义上的“命物”之“名”或“名辩”之“名”

中国当代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建设实践等多重指导下，理论与时代相结合，形成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又能表达契合中国当代发展特点的话语体系。在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克服传统文化的薄弱环节，需要将传统文化观和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多方价值观予以融合。融合的第一步就是“命物之名”。“名辩”的意义在于认清中华文明在全球的地位和价值，为建设中国当代文化观的话语体系实现“命物之名”并得以“正名”，以正当的名义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现代的、当代的优秀文化观、价值观体系。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人类史上唯一未被中断的数千年文明形态，承载了建设任务、传承使命和繁荣义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对中国当代文化观的话语体系进行引领和展望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的文化专题分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坚定文化自信”，第三卷则以“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作为文化类专题论述了网络强国、宣传思想工作、媒体融合发展、国家灵魂和民族灵魂、育人问题以及五四精神的传承，六篇文章紧随时代主题和发展背景，成为中国当代文化观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日报评论社出版的《习近平用典》（第一辑）、《习近平用典》（第二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习近平讲故事》都是有力的证明，这些包含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文章、会议上的讲话等论述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引，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内外反复探讨、学习的资料被记录、参考、运用，从而收到了“命物之名”的效果，这是“名”概念介入中国当代文化观的话语体系建设的标志之一。

在廉政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以“四知据金”“要言妙道”“反腐没有纸牌屋”“民脂民膏”“霸王别姬”“三命而俯”“亡国之音”“民心所向”等故事推进廉政建设，以“半条棉被”“康熙不取灵芝”“为政先修身”“不贪一时之

^① 程相占：《环境美学的理论创新与美学的三重转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功”“把泪焦桐成雨”“贫困马克思写就《资本论》”等传统语言或故事语言来劝诫品格的养成。治理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实事“国产手机逆袭”和自身经历“读一百遍《共产党宣言》”以及“历史人物张之洞感叹改革”等促进管理者和民众的思考。对待友邦，习近平主席以人民友好、国际交往、文化融通以及历史情感来全面记录和宣扬。以不同的话语对待不同的对象和问题符合“名——分”的思路，“名”可以明“分”，“分”定则国“治”，“名——分”不仅指外在的政治，也指“修身”之治。简单地说，名即名称、概念，学习相关文章，结合文化观内容的阅读体验是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初步任务；“名”又与“名声”“名目”“名分”等况谓人品行、地位的道义相关，个人的知识学习和修身历练也是文化观话语建设的开始阶段——命物和名辩阶段，这是“名”介入个人修养揭橥“名”的另一传统特色。

二、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毁誉、况谓之名”或“正名”之“名”

“名”自诞生起，就代表了一种具有观念性质的理论，政治伦理和逻辑认知是“名”的两大类用法，也是“名”的重要的介入性特征。中国早期文化观的话语体系建设主要体现为逻辑认知阶段和政治伦理的实践。先秦时期，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到杂家都有关于“正名”的详细论述。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有各家关于“正名”的论述，如“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①“正名”之于万物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联系。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政治宣传活动、文化宣传活动对于“正名”和“毁誉、况谓之名”也至关重要。在浙江工作的六年时间里，习近平在《浙江日报》特色栏目《之江新语》发表《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强调“杭州应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历史文化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做得更好”^②。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提到梁家河的变化，“他最初对‘人民’二字的体悟，就来自梁家河”^③。人民日报社记者卢新宇说习近平是中国故事的“第一主讲人”，“讲故事”激发人们的记忆并塑造回忆载体。故事大都是存在人的“记忆”之中，借助柏拉图“理式”概念中的“记忆”，更有助于理解“讲故事”在文化观形成过程中的地位。柏拉图的“回忆说”认为，人们通过回忆某件事情的过程就可以得到所有

① 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9页。

②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讲故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0页。

③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讲故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4页。

的知识,学习不过只是回忆罢了。《习近平讲故事》一书是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忆的结合,故事讲出来的时刻和出版后创造了集体记忆,人的记忆在人的一生中不仅起到维护知识体系的作用,也为人们的心灵创造一片栖息的土地,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中所无法把握的“存在”同样可以在充满集体记忆的这一“存在者”中找到,这可以帮助那些在快速发展的“失范”社会中的彷徨的人寻求存在的意义,从而让“失忆”的灵魂有安身之所。摆脱庸俗、感性和欲望的出路即重新回忆并找到新的感性,即马尔库塞应对现代社会新理性提出的“新感性”策略。习近平讲故事则是强化中华民族回忆和抚慰现代中国人个体灵魂的过程。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记忆的空间范围,全世界人民的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后续国际合作就可以看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在这场疫情中尽最大努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也向全球传递了当代中国互助共赢、友好往来的文化观。世界的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观的介入,中国传统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价值观异于西方二元论非此即彼的哲学传统,应当成为多元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扩大思想文化的宣传,为中国当代文化“誉名”。

首先是重申“正名”的问题。“所有的文明制度一个根本的载体就是‘名’”^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旗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建设“正名”的同时,也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名,二者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也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相辅相成,息息相关。治国理政的方针和新理念的实践也都是从“正名”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②。历史文化作为重要的介入因素,与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不无关系。冯友兰将“正名”解释为在社会关系中的每个名都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③,名即名分,胡适说:“让名代表它所应代表的,然后重建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和制度,使它们的名代表它们所应代表的东西。”^④中国当代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应当是不断“正名”的过程,与孔子将“正名”作为“理政”的首要 and 根本途径是一致的。

其次是“正名”的实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脱贫”是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1988~1990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其间针对闽东的脱贫和发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习近平强调:“脱贫致富的实践过程不但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

① 赵奎英:《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9页。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④ 胡适:《先秦名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②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③ 的讲话。讲话除了提到吃穿教育等基础保障问题，还提到了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的指标，以及“集中连片的贫困区要着力解决健全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产业”^④ 等问题。这里涉及“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的矛盾。改变个人消费品的大量消耗，从而投向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从最大的消费到最佳的消费。这种转变的前提正是文化价值观的变革，“正名”和“正名”的实践同样重要，或者说，文化建设的介入与脱贫的实践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最后是脱贫之后的新时代对“消费人”文化观的况谓与毁誉。文化观常指的是“人”的文化观念，以人为本是关键。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每一个社会和经济体制都不仅是一个处理物质与机构之间关系的专门系统，而是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系统”^⑤。一切社会和经济的活动中，人都是最高价值的存在。人的最高价值不能仅仅用冰冷的制度和政策禁锢，人本主义社会主义最大价值的发挥是辩证的人文主义发挥，是文化的给养。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当代工业的发展导致现代社会出现很多“消费人”，“消费人”永无止境的消费欲是否能让人获得自由？对饥饿的恐惧的消失是否真正地让人获得自由？两个问题实际上说明了同一道理：当“消费人”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如果不能扭转“消费人”最大限度消费的欲望，那么“贪欲”会使人丧失良知，此时人的唯一生存的价值就是“消费”，为了消费而消费。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三种解决方法：一是消费习惯的改变，让“消费人”变成能生产的、主动的人；二是中华民族勤俭、朴实等优秀传统品质介入现代社会生活，开创一种新的精神风尚，即人本主义的精神风尚；三是各类民主方法的复兴。

三、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命有之名”

“文化可分三个层次：一是表层文化，也叫物质文化，即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在物质层面上含有的某些精神因素，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属于这一层次；二是中层文化，也叫制度文化，是通过社会生活表现出来的，如宗教、制度、风俗、艺术等；三是深层文化，也叫哲学文

①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5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⑤ [美] 艾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叶安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化，主要从一个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体现出来。”^①“命物之名”是日常的、基础的积累，对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表层文化；用语言的建设况谓制度、文化、艺术，评价人的名誉得失等即是“正名”，“毁誉”、“况谓”和“正名”并没有明确的区分。至于深层的有关“名”的讨论，可以从有名和无名说起。

《老子》云“始制有名”，指的是人为地制作思想，“朴散则为器”则表明人为名分，是为了确立区分。^②“朴”指的是未雕琢较为混沌的状态，而“器”指的是有名有形。道家是反对人为制作的，任何有形的切分，无论认识领域还是政治伦理都在道家的反对之列，老庄包括王弼在内都认为名就是“名——分”，老子的“绳绳不可名”即是对有形的区分的反对。道家追求“无形”“无名”，庄子的“混沌”、郭象的“冥极”、郭店楚简中的“太一”都是道的本体，诚如《老子》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此不难看出，“和”是“太一”的本质特征。“无名”意味着“无形无分”，在道家这里，“无名”与“名——分”是绝对对立的，而对于儒家，“名——分”也可以是自然的，不是绝对对立的。“名——分”和“无名”的关系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处世的互相依存的价值体系。“分”与“和、合”相对，“混沌”的“中和”性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当代中国有关文化观的论述的早期积累阶段和正名阶段，最终都回归到和合，回归中和之美，回归“人化”，因为“文化即人化”，“圣人法道，德合自然。其治世之方，殆亦可推知矣。道大无名，故君人之德，以中和为美”^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确立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方面，中华文化有其优长之处。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④当代中国有关文化观的话语建设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合”之美的延伸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话语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语言建设主要以传统文化的介入并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特色作为重要战略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实践中积累丰富的宣传经验。2019年7月1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为主题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告诫全体党员自我革命没有停歇的时候。这次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

①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② 参见赵奎英：《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③ 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之新义》，《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④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半山路更陡”。“自我革命”在某种意义上类似齐泽克提到的“共产主义”的“缝合”，共产主义“缝合”的是“漂浮的能指”^①，就像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女权主义辩证来看仍然是父权主义一样，意识形态工作和当代中国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同样起到了“缝合”的作用。拉康的所谓“one”即“缝合”整个场域，实现“同一”，实现“和合”。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混沌”“太一”“中和”的魅力。

从2020年初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和全世界的严峻考验。全球因疫情共同面临诸多难题，越是遭遇难题和困境，越是激发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包括信息建设和网络安全，有些国家的部分媒体刻意制造虚假的网络信息进行不当宣传，这就需要时刻警惕虚假的“名”和“命无之名”的影响和伤害。对“名”这一宝贵文化资源介入当代文化观的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视可以在内部正名以修身，受到鞭策和获得能量，外部警醒和辩证对待，推进宽容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开拓，有助于防止西方单边主义文化观的蔓延，为共同解决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双重问题提供多元化的参考和借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四、当代文化建设“介入”话语中的“名”“实”之辩

“名”本身并没有任何“介入”意义，这与道家认为“名”只是在“朴”或“无形”范围内区分、辩物，希望维持“不可名”和“无名”的自然观是一致的。自律是静观的、无对象的和摆脱认识概念的，但是介入充满了主动性。与“engagement”相对的就是“autonomous”，即自主的、自律的。“名”的褒贬、毁誉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意识形态性和时代性特征的反映，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越是自律的就越是介入的，二者并不冲突。以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来看，道家坚持自律性的“名”的自然观与儒家介入性的“名”的自然观看似相反，在应对当代社会的现代性矛盾时却是可以通约的。儒道有关“名”的分歧实际上早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介入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实现了通约，而通约的中介就是“象”，而且是现代社会中的“象”。

首先，“名”的自律与介入的辩证法是辨析“名”“实”关系的前提。道儒两家对“名分”和“实”所持的不同观点蕴含着中国古代对“介入”问题相悖的观点，如果没有“无”就不会有“有”，如果没有“有”，那么“无”的存在无法说清楚。“名”的自律性不同于艺术的自律性，作为一种观念形式与现实生活事物的联系更加紧密。老庄的自律性之“名”与儒家的介入性之“名”构成

^①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

辩证法的两极，缺一不可。随着时代发展，儒家的名分自然观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道家的无名自然观，而道家抱朴的混沌与太一，是完整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关键部分。如果只有儒家的“名”作为介入主体，中国的辩证法哲学、和合传统是不成立的。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和合（自律）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介入”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可以介入“实”，“实”也可以介入“名”，“名”的介入性特征促进了“实”的生成，“实”反过来也会促进“名”观念的强化。二者互相介入的过程，可以通过“象”这一中介来完成。胡适在“名”与“实”之间加入“象”，即“名——象——实”，名实之间存在自然联系的根据是“名”的意义和原来的意象一致，“‘名’的自然性为一切文明现象的自然性提供了基础”^①，自然性和意象性之间的联系这里不再赘述。那么，“名”的意象性特征被赋予之后，中国的语言、哲学、文学等都被赋予了意象性特征。胡适认为：“意象”在孔子的逻辑中是最重要的，“‘意象’是古代圣人设想并且试图用各种活动、器物和制度来表现的理想的形式。可以说意象产生了人类的所有事业、发明和制度”。^②从“名”到“意象”，再从“意象”到制度，从“名”到“实”和从“实”到“名”的过程是互证的过程，有“实”才能况谓“名”，有“名”才能证“实”。胡适身处近代中国社会中西交流碰撞的动荡变革时期，对于“象”这一中介的提法，符合当时对于孔子以及传统文化的矛盾亟待缓和的趋势，并且胡适以此思路解释“名”的问题在当时是一种接近主流的观点，这一时期对孔子“正名”，以此思路做出解释的还有冯友兰、萧公权和一些逻辑学家等，这些学者主要从西方的理念、概念方面理解“正名”。

其次，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虽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50～60年代经历的现代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时出现的社会矛盾，但在更短的时间经历了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和全球环境，中国正经历着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交叉矛盾，不仅有城市发展问题，也有乡村边缘化、父权与女权主义等问题，这就需要在充分利用自身优秀传统文化介入现代发展道路的同时，主动借鉴各国优秀文化和发展经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和“事”，“形名”的“形”对应经验形式，而“名”对“实（形和事）”有介入的力量。在古代，对于与“介入”看似相反的“无为”，儒、道、法各自有不同的理解，《论语·为政》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指的是“君道无为”，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无为”。道家强调遵循自然之“道”与“德”，儒家则强调以礼制和习俗规定的“德”为政，形成了宗教、伦理、政治相结合介入道德的“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将宗教性的人格追求、心灵完

① 赵奎英：《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② 胡适：《先秦名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善与政治性的秩序规范、行为法则混同、融合、统一、组织在一个系统里。”^①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延续“无为”的基础上，应在“泛道德主义”基础上找到新的平衡点。选择一条主动借鉴、学习、利用的积极介入之路，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介入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②中国古代的“名”或其他理论体系的介入，更多讲求的是交融和融合，而不是心怀不轨的内部的或任何外部势力的“教师爷”般的介入。

当代文化建设之“实”的介入。2018年9月到10月的《人民日报》专栏《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头版陆续刊登了13篇报道，13篇报道囊括了广东深圳、浙江安吉、福建宁德、重庆、福建福州、河南兰考、福建古田、海南三亚、河北正定、湖南十八洞村、宁夏闽宁镇、“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对象等。结合各项讲话之“名”与这些具体之“实”，体现了“名实（形和事）相符”的做法。传统故事、习近平话语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党内建设等的结合同样是“名实（形和事）相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当代代表性的话语的提出不只是“形名主义”，而是一方面为中国的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正名”，另一方面给中国民众带来政治自信以及事实上的文化自信。

五、结语

在中国的环境美学与各类思想中，无论传统文化的道儒体系，还是当代文化的话语体系，都强调天人合一、生生主义、和合大同、主客相融的自然生态意象。这一背景下的“介入”实际上就是“交融”“融通”“融合”。“名”这一范畴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先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名与正名、名本、形名三者之推演嬗代，实为我国古今学术变迁之极大枢纽”^③。谭戒甫预言了古今学术（文化建设）的交融和步骤，第一步是“正名”，第二步是“名”（话语体系）成为一种本体论贯彻实施，第三步“形名”可以借助胡适对孔子“意象”的阐释来理解，胡适用亚里士多德的“形相因”解释“意象”，“意象”是万物（各种活动、器物、制度）的理想形式。“形名”是超越了简单的符号和

① 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8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5页。

③ 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3页。

“象”的第一个意思——“天垂象”的代表“天下之赜的名”^①的阶段，也是话语体系的高阶表现。古代圣人在自然现象启示下心里形成的意象，当“名”与这些意象相一致时，名是“正”的，名正则万事正。“形名”即“正名”与“名本”的中间物。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利用先秦“名”的智慧为当代文化观的话语体系进行“正名”，这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类“意象”息息相关，进而能够实现各项事业“实”的超越。除此之外，“名”的“况谓”“毁誉”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批判”意义的，一如康德的“批判”义、马克思的“批判”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义等，只有“批判”与反思齐头并进，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维，实现介入与自律的健康发展。一种话语体系的“正名”与建立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而处在本体论地位的话语体系一般来讲是具有辩证意义的，或者是能够实现“批判”功能的。当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相对稳定阶段时，文化观话语体系建设显得极其必要。在这样的时代转型期，人们都在期待一种话语信仰，以及话语信仰下的阐释。同样，在一派繁花似锦的发展中，当代中国有关古今文化介入（交融）的话语体系建设有望和中华传统的“名”一样发挥本体精神的作用：一方面促使“古今学术”进行辩证地探讨，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给这一时代的人们创造一种信仰。

“Ming” and the Discourse Turn of “Engage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Li Yun

Abstract: The turn of engagement discour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an be analyz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epistemology, political ethics, and ontology. Based on the major points of “Ming’s debate”, “rectification of Ming”, “Ming’s intension”, “Ming and re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view is clarifi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engagement of the “Ming” ideology, which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ntolog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① 胡适：《先秦名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cultural view. The reconfirm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discourse system is also a further demonstration of achiev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Cultural View; Discourse Construction; Ming; Ming's Rectification; Engagement



动 态

论点摘编

一 学术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探索

陈先达 臧峰宇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之作为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既是一个理论原则，也是一个实践原则。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始终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也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学术自觉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从学术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探索可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哲学研究，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6期）

二 毛泽东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疆域的中国式拓展

王南湜

毛泽东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极其独特。这种独特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具有深厚中国传统哲学元素的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它与《资

本论》中作为理论体系建构方法的理论辩证法有所不同,但这种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却又可与马克思的理论辩证法互补而构成一种兼容中西思维方式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进而为中国哲学精神的当代重建奠定方法论基础,从而革命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疆域。这种拓展乃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事”的本体论的发挥、发展而为,因而是一种中国式的拓展。这一拓展之能够成功,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事”的本体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有着某种内在的亲合性,而这又进而意味着我们只有从“事”的本体论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方能对之达到更为深入的把握。

(摘自《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

三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程恩富 孙绍勇

走好前方的奋进路,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首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始终注重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次,让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强大生机活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统一起来,让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强大的生机活力。最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新征程上开创美好未来,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摘自《人民日报》2021年8月12日)

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辩证逻辑及其实践要求

杨荣刚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这条道路蕴含着极富哲学特质的辩证逻辑：在发展规律层面，既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走向，又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独特优势，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在发展要素层面，既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又注重局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体现了全面性与协调性的辩证统一；在发展过程层面，它是符合客观世界发展必然性规律的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体现了客观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在发展意义层面，既立足中国国情，又着眼于与世界现代化整体图景的交融互动，既回答了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又蕴含着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遍价值，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正确把握和认识这些内在逻辑关系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五 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

陈曙光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主导建构了服膺西方利益的人类文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既从道义上宣判了西方定义的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又从历史主义维度承认了其进步性。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为人类文明的重建提供了一线希望。但是，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人类文明的重建在实践上是艰难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立一种与世界大变局相适应的人类新文明，是全世界的唯一选择。重构人类文明的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是当今世界重建发展理性、治理理性、交往理性、安全理性的基本遵循。新的终将突破旧的，人类新文明终将自觉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

（摘自《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

六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中国之治的价值理念

——基于中西现代性观念对比的审视

廖胜华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由邓小平提出，最初含义是指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定义来确定目标，而要务实地降低标准，并解决诸如人口多等中国特有的问题。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其含义主要不再指向现代化的物质标准问题，而是指向现代化的道路性质、路径方向问题，强调人类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中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独特的现代性图景。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传统文化这三重逻辑塑造了特色鲜明的现代化的中国理念。在现代性的价值主体、价值旨归、政治形态等命题上，中国理念和西方理念具有明显差异，呈现重共同体价值与唯个人本位之别、达至全面发展的自由与保障消极自由之别、使命引领型责任政治与被动回应型责任政治之别，由此导致不同的现代化方案、治理逻辑和发展格局。

（摘自《学术研究》2021年第12期）

七 文明视野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哲学意蕴

韩 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对于探索全球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体现了以人民为本、关怀现实的精神。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不同文明的价值理解和价值实现路径，在包容开放的态度中寻求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且丰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深厚底蕴，使我们能够从文明的高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完善的方案。

(摘自《哲学研究》2021年第8期)

八 中国政治发展新道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

孙代尧

民主既是各国人民探索更好社会制度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政治向度，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懈探索民主真谛，不断开拓民主新路，创新民主理论，构建民主制度体系，丰富民主实践，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政治发展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国的民主理论创新和民主实践创造，超越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制度模式，确立了新的民主政治的坐标，蕴含着对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指向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正道。有必要明确提出建设“民主中国”的命题，构建“民主中国”理论话语体系，打破西方“民主”话语垄断。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九 “两会制”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政协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政治制度

江泽林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在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为党和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开展多种形态民主提供了理论源泉，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简称“两会制”）更加鲜明的民主价值。“两会制”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形态，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性质定位，是“两会制”民主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在“两会制”民主视域下，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独创性贡献维度，分析新时代人民政协定性赋能及其运行机制，对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将进一步增强“中国之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十 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内涵意蕴与弘扬路径

张士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并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是我们党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它发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守,规定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真理性的理论特质,形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凝结于系列建党活动的伟大实践,并且在真理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革命性与政治性以及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互成中不断衍生新内容、开辟新境界。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使这一理论成果得到深入严谨的研究阐发、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底蕴深厚的文化濡染以及切实有效的实践转化。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十一 中国共产党引领青年运动方向口号的百年演变

——基于五四纪念文本的历史考察

郭 祥

在信息社会,政治口号更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迅捷、无边界传播,突破了张贴、呼喊等传统宣传方式的时空局限,加之政治口号言简意赅的内容和简洁明了的话语特点,可使政治宣传者的政治理念和意图迅速“武装”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随即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注重引领青年运动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青年运动方向的口号与时代同频共振,经历了多次演变。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方式、话语体系的“标志性符号”以及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的表达方式,引领青年运动方向口号的百年演变,折射中国共产党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牺牲、创造的斗争历程，勾勒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演进的历史脉络，彰显“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人民至上”等中国共产党恒定不变的政治追求。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十二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何 萍

从起源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转出的。这一转出，以十月革命胜利与五四运动为契机，在思想层面上经过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个环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与中国道路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第二个环节是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第三个环节是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陈独秀在世界经济、政治变动的平台上，联系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三个环节上凝练出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展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摘自《学术月刊》2022年第1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王忍之题写刊名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集刊简介

本集刊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主办，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专业集刊。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中外文化发展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多领域文化问题（比如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文化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世界文化思潮等。

本集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外文化理论与实践，积极刊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坚持学术第一的标准，大力推荐富有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的关于中外马克思主义相关领域的文化研究成果。

我们将力争把本刊办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园地，并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注重前沿和热点问题研究，大力扶植青年学者，推出一系列有分量、有深度、能够引起理论反响与学术争鸣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积极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建言献策，并不断提升学术质量，扩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力，拓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ISBN 978-7-5607-7451-0



定价: 58.00元